

60428/4

序

近几年来，大批老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愉快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离休以后，他们又在另一条战线上开始辛勤地工作，撰写革命回忆录，力争在有生之年，为党、为后代多留下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

刘忠同志在1981年回福建探亲时，曾对我说：“离休后做了一件事，把自己参加革命的一生完整地写出来了，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有意义的财产”。也就是这本《从闽西到京西》。

刘忠同志是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的长篇军事斗争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系统地回顾了他从一个普通的泥水工人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经历。刘忠同志1929年入党，参加党领导的闽西农民暴动，同年加入红四军，历经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在抗大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任陈赓纵队参谋长，转战山西，参加解放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前夕率领六十二军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解放西康。1950年又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工作。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我与刘忠同志早在1930年就在一起工作，我们同是闽西子弟兵中的幸存者，今天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心里很高兴。刘忠同志自幼家贫，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征善战，是一员战将。今天，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动笔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文章读

起来真实、生动、朴实、亲切，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学习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因此，《从闽西到京西》的出版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这本书对我党、我军的历史研究工作也是有益的。

最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做这项工作，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回忆录。

杨成武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杨成武	(1)
第一章 踏上革命的征途		(1)
一、苦难的童年		(1)
二、才溪的土地革命		(2)
三、红四军学校学习		(8)
四、红十二军一〇三团		(9)
五、红四军三纵队十九大队		(12)
六、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		(18)
七、红军十一师三十三团		(28)
八、模范红五团		(41)
九、红一军团侦察科		(51)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烽火		(96)
一、在抗大的学习和工作		(96)
二、三八六旅		(111)
三、太岳第二军分区		(116)
第三章 决战前夕		(128)
一、上党战役中的三八六旅		(129)
二、切断同蒲路		(143)
三、停攻曲沃，忍痛撤兵		(146)
第四章 血与火的洗礼		(150)
一、参加四纵作战指挥		(150)
二、协同晋绥军保卫延安		(164)
三、率太岳部队参加攻打临汾		(173)
四、晋中战役		(182)
五、十五纵队榆次练兵		(188)

六、攻打太原外围据点.....	(190)
七、参加攻克太原.....	(197)
八、六十二军参加解放大西北.....	(200)
九、参加解放大西南.....	(207)
十、进军西康，解放西康.....	(213)
十一、改编国民党二十四军.....	(226)
十二、调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222)
后记.....	(224)
跋.....	(226)

第一章 踏上革命的征途

一、苦难的童年

我是福建上杭人，1906年（光绪3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才溪刘屋角，取名刘永灿，小名太平，是个穷家的独生子。我父亲刘庆喜，母亲林连秀，祖祖辈辈忠厚老实，人称是世代忠良之家。

才溪属上杭县西三区，处于汀江连水之间，地称九背十三坑，山青水秀，森林茂密。可是，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剥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我五岁那年，祖父病故，家里无钱安葬，把仅有的半亩秧田典当给本家地主刘佛喜。他的外号叫“翻生狗”，是个专吸穷人血汗的恶棍。

安葬祖父后，父亲得了重病，我妈只好把一些嫁妆首饰拿去押当，请医生看病、买药。借债利息重得很，十元大洋每月就得付一元利息，利上加利的剥削，如此三年，家里被弄得精光了。母亲只好上山砍柴，卖给豆腐店的“喜银细子”，换两块豆腐煮青菜充饥。我六、七岁时，就随着母亲上山挖苦菜、羊蹄子作为主要的食粮。这时仅有的半亩秧田也被“翻生狗”夺走了，还欠债一百多块光洋。

“富人过年，穷人过难”。从腊月二十五、六，直到大年三十日，债主天天上门逼债。我记得七岁那年，大年三十，父亲买了一块钱的猪肉，放在厨房里。太阳快落山时，恶霸地主王赠高怒气冲冲地闯进我家，父亲不敢见他，藏在小黑屋的草堆里。他

没见到我父亲，把那块肉拿走了。我们只好过个斋年。

我七至九岁读了三年私塾，三伯父、二舅父各出一年学费。以后就随父母种庄稼和上山打柴。后来去学做泥瓦匠。我十二岁时，个子比水桶高不了多少，挑水要把水担钩挽起来，水桶才能离开地面。一个工棚几十个工人吃饭，每天要做三餐，就我一人，南方用饭甑蒸饭，我因力气小无法把饭甑放上锅。就用一条绳索，把大饭甑吊起来，站在板凳上用肩把饭甑移放在锅内。有时因柴湿，不着火，光冒烟，耽误了开饭时间，被工头打骂，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两眼深陷，皮包骨头，双手都被霜雪冻烂了。妈妈见独子被折磨成这样，心如刀割，抱着我大哭一场，说：“儿呵！我们家太穷了，只好让儿吃这种苦。妈妈相信，儿会有出头之日的。”

三年学徒期满，接着还得帮工七、八年。开始每天只赚一角钱的工资，后三年每天可赚三毛钱。因年纪小、力气差，向房顶投递砖、瓦，稍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打伤……。这就是我童年、幼年时的生活。

二、才溪的土地革命

才溪的劳苦人民进行了三次起义。

才溪南靠广东东江，西近江西瑞金。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瑞金进入福建闽西，路过长汀、上杭出广东东江。那时我二十一岁，在离才溪四十五华里的官庄珠保乡大地主林日良家做工。一闻南昌起义部队来了，林日良全家都跑了，还叫我们帮他看家。他儿子叫春妹子，临走时拿出几支洋枪，要我们拿上。因为我们都没有拿过枪，不会使用，更主要的是不愿给地主恶霸看家，所以都不要枪。

地主逃走了，我们没有工做就跑到官庄去看起义部队。开始不敢走近，站在高地上远看，后来听说这是共产军，路过官庄没收了上杭大地主刘棠华的财产，分给了穷人，对穿破烂短衣的穷人特别客气，这真是闻所未闻，翻天覆地的事，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

起义部队进入闽西地区，大地主不建房屋了，才溪外出三千泥水匠，没有工做都回到家乡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才溪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领导组织农民协会的，是两个共产党员（当时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外面），一个叫包究生，一个叫张楷。他们在主席台上说：“同志们！天下是我们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有我们讲话的权利，请你们选出代表上台，来吧。”我们选出了几个工农出身的代表，可是一个也不敢上台，只有三个上杭中学毕业的学生上台去了。这次到会的工农群众有三、四千人。会场的四周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打倒蒋介石”“实行共产”等标语。包、张两位讲了话，宣布成立才溪农民协会。接着上台的知识青年拿着大本登记，写上报名入会人的姓名，并收两角钱会费就成为农民协会的会员。我们一伙青年议论着，最后各人拿出两角钱，报名入会。我父亲害怕得很，回到家里对我说，这能行吗？搞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我说我家祖祖辈辈都被豪绅地主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有什么可怕的呢？母亲听我说得有理，非常高兴，对着我父亲说：“儿子加入农民协会是要翻身，也是为穷人办事，你不入农民协会是怕事，不对的。”我父亲听了我和母亲的话后，也报名加入了农民协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才溪就有三千多穷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员。

“八一”起义部队在广东东江作战受挫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镇压革命力量，才溪的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包、张两个共产党

员被逮捕杀害，参加领导农民协会的知识分子，有的动摇，有的叛变。第一次才溪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春，闽西特委派李天富、罗化成二同志来才溪组织秘密农会。他们以算命测字的职业作掩护，白天穿着长袍，装模作样地给人算命测字，晚上就把工农群众聚集在祠堂、庙宇内，有时也在山野林地或没人住的破屋里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秘密农会，吸收先进可靠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经常参加李天富、罗化成二同志组织的会议，有时他俩住在我家里，常对我作个别谈话，使我渐渐地知道了党的主张和党在当前斗争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以及未来的崇高理想。一九二八年七月，他俩介绍我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经过一年的考验，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张赤男、林鹏二同志正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才溪水西坑林应三同志家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党旗下举起左手宣誓：“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同我一起加入党的有王奇才、王仲玉和林家顺同志。

一九二八年底的一天，土匪头子林祖光（外号大头四子）、王邦达（外号板子）联合红帮头子曹盛德（又叫曹来子），在庄背庙内开会准备起义。庄背庙内两个神象是兄弟两个，一个叫石古，一个叫石孟，统称为“福主公王”，据说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时全乡人民还信神信佛，逢年过节都到庙内烧香敬拜。区委林应三同志对我和王奇才说：“你俩利用亲族关系去做他们的工作，利用他们的行动，作第二次起义的准备。”

大头四子林祖光，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四舅”。我进庙一看，会场的四周警戒森严，进去的人都要有人作保，到会的六十三人称为六十三兄弟，每个人都用新取的名字登记入册，我刘忠这个名字就是这次取的。一切手续办妥后，就宣布开会，在

神像台前点了香烛，杀了七八只大公鸡，把鸡血洒在烧热了的六十三碗酒内，然后六十三人一起跪下，结拜为六十三兄弟。红帮的头头曹来子主持会议。他说：“我们六十三兄弟是同心同德、劫富救贫、有马同骑、有福同享、坚决打地主、不准他们贵卖粮食。我们明天就在天后宫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章程。请各兄弟端起酒碗，我们宣誓：吃了红花酒，寿年九十九，若背叛誓言，照鸡公头落。”大家端起酒碗一喝而尽，然后人人拿起杀鸡的刀，斩一下公鸡头，以表示不违背誓言。曹来子讲话中，还规定很严格的纪律，当时听着有点吓人。整整搞了三个多小时才散会。当晚我就到林应三同志那里，如实的作了汇报。

第二天早晨，从村头到村尾，贴满了标语和布告。地保打着大铜锣，从村头到村尾高喊：“今天上午全乡人民到天后宫门前开大会”。这次到会的工农有四千多人。王邦达的兄弟王允强，跳到讲台上大声地说：“父老兄弟们，今天开会宣布起义，我们真要革命了。现在请总指挥曹盛德讲话。”曹来子身穿纺绸大褂，头戴灰色礼帽，走上讲台提高嗓子讲：“大家推举兄弟当总指挥，兄弟的才学浅薄，还望众乡亲们多多帮助……”到会的工农群众一听到曹来子当暴动的总指挥就泄气了。王允强最后宣布：“昨晚庄背庙起义的兄弟马上到花厅下集合。”当时我真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到花厅下后，大头四子林祖光，就宣布要富家捐款、派粮。但豪绅地主从上杭城内搬来了一个营的兵，坐镇才溪。这时，红帮头子和土匪上了山，许多群众害怕，跑到外乡去了。豪绅地主恶霸更加耀武扬威，疯狂地镇压劳动人民。这次起义党未起领导作用，导致失败。

才溪区委为加强与上杭县委的联系，重新安排部署。派林鹏同志（区委委员）在上杭城内开洋货店作掩护，作为同县委联系的固定点；要我以卖茶叶为名作才溪区委和上杭县委的交通联

络，每月来往二至三次。我到城里就秘密去林鹏同志处取县委指示、文件，有时接受当面口头指示，回才溪就向区委林应三同志转递县委的文件和口头指示，这加强了上级党对才溪区委的领导，取得第三次起义的成功。

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才溪区委接到上杭县委的通知说：朱军长、毛党代表率红军第四军，开进福建，进占汀州，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旅。现红军正南下，向上杭、武平、龙岩、永定进军。五月初八日，红军部队已到达南阳（离才溪三十华里）。我们区委派人去接头，欢迎红军到才溪支持我们举行暴动。一纵队政治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才溪的劳苦工农们！本军另有任务，不能立即开去贵乡。你们自己有力量就可以举行暴动，如果力量不足，把握不大，可将豪绅地主的名单先调查登记好，以便将来暴动时一网打尽……。”区委接到此信就积极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五月初八到六月二十二这一个多月内，继续积极地发展党员并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红军第四军一纵队，开到了才溪。我们区委事先与红军取得了联系，这时区委发出紧急通知：立即举行暴动。一声令下全乡工农大众一齐动手，将地主恶霸的武器如洋枪、土枪、鸟枪、红缨枪和土炮等全部收缴了，把大多数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捉起来了，只跑了几个。地主的粮食、猪、牛等物资全部没收，分给了工农群众。当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季节，收割的粮食，破天荒的第一次归劳动群众所得，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有些农民也有顾虑，因为恶霸地主虽然捉起来了，可是没有杀掉，若放出来今后报复是吃不消的，因此有些农民不敢要分给他的粮食等物资。

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的帮助下，召开了才溪乡工农群众大会。工农群众沸腾起来了，颈上系了红布巾；红布带，手臂上套

着红五星的袖章，肩上背着红缨枪、土枪，腰间插着铁尺、短刀，敲锣打鼓的到才溪圩的马道坝参加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才溪乡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上杭县工农赤卫队第十三大队。公推王树炳为人民委员会主任，林祖光为上杭赤卫队第十三大队队长，林鹏为大队党代表，王邦达为副大队长。当场枪决了两个工农群众极为痛恨的恶霸地主“马嘴六哥”与“黄毛头”，将抄出的田契、借据在当场烧毁。革命热潮在才溪每个角落沸腾着。

上杭县民团团总大恶霸地主刘子畴，是才溪四坊乡下王村人。六月下旬，趁赤卫队十三大队开到南阳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之时，率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和民团，从上杭出发兵分三路袭击才溪。我当时在人委会担任财务科长，人委会主任王树炳是地主分子，他看到敌人进攻就动摇，不拿出办法来对付敌人。在这样情况下，我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到西山躲藏，一面派人去南阳通知赤卫队迅速开回，并告知红军部队派兵援助，歼灭进攻我们的敌人。刘子畴是地头鬼，对才溪情况很熟悉，还有地主豪绅带路回来。国民党部队一进才溪就抢劫掠夺，捉去一批人，烧了房子，抢走许多物资。他们不敢在才溪住宿，当天傍晚就撤到下王去了。我们赤卫军十三大队得到消息，当晚赶回才溪，红四军一纵队连夜派了一个连来援助十三大队，部分农民群众也参加了战斗，星夜出发，第二天早晨，发起进攻，不到一个小时就攻进刘子畴的老巢——下王。敌人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迅速地调回十三大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很快就把敌人大部歼灭了，仅刘子畴自己带一小部分兵力逃回上杭城。参加战斗的农民们把刘子畴的家产没收了，房子也烧了，又抓到刘子畴的亲兄弟，割下了他的头，在下王村游行示众。经过这次战斗，认识到对敌人须狠，你不杀恶霸地主，那恶霸地主就要杀你，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才溪人民坚决惩办了本乡的地主恶霸，又帮助周围地区的工

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和工农赤卫队，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旬，我被调任上杭赤卫军第十三大队的军需长。当时赤卫军十三大队的内部成分较复杂，必须整顿，区委决定对暴动时混进来的流氓地痞、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洗处理，使革命人民武装掌握在党和工农群众手里。这时，才溪人民革命委员会改选为才溪区苏维埃，共产党员王仲玉同志担任第一任主席，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轨道。半年内将全部土地分配给了劳动人民，巩固了革命政权，才溪成为当地革命的一个中心。

红军第四军一纵队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开到才溪，毛主席住在下才溪塘子角王田春的家。当时叫他毛委员、红四军党代表。张赤男同志说：毛党代表因身体不好，随一纵队行动，还要保守秘密。我们当时只叫他“老王”。

三、红四军学校学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古田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时，创办了一所红军学校。选调部队优秀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的优秀队员受训、深造，培养连排干部。区委研究决定选调十七人去红军学校受训，由我带队。因为大队三个土匪头子很坏，需要分别处理。乘此机会，动员特务中队长王允强报名参加学习，以便于整顿十三大队的领导。我是十三大队支部委员，在红军学校参加校的党委。到学校不久上杭县委来函，要我汇报王允强的反革命罪行。学校党委听我汇报后，按王允强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报闽西特委批准处以死刑，执行枪决了。

红军学校地址设在大池，这是龙岩管辖的地方。红校的校长

兼党委书记石迟丰。这期招生一百四十多人，设了三个区队，一区队长王崇礼，二区队长叶灿，三区队长谭希林。一九三〇年二月，校址移到龙岩城，闽西特委查出石迟丰勾结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其罪行执行枪决了。随后提谭希林同志当校长，又从四军调来曹福海同志当第三区队长。当时许多教官是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出身，军阀主义残余很严重，用各种形式打骂学员。如在操场上喊“立正”口令，即跑到你面前猛打你一拳，看你倒不倒；喊“正步走”一直向前往池塘内跳；若犯了校规就拿大竹板打学员的屁股、手掌；吃饭规定五分钟内必须吃完；每天晚点名，即使下大雨，值星官也要讲二十分钟的话，……这种种整学员的作法，完全是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一套恶劣作风。开士兵委员会时，学员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通过严厉批评后，教育方法有所改进。

我经过这样的严格的锻炼，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变成军人，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政治水平有了提高，学到了些军事知识，普通话也会讲一点了。在毕业时各项考试成绩均良好，特别是实弹射击，全校学生中我是第一名。校领导鉴定我可任排长职务。这时闽西的地方武装大大发展起来了，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我被派到红军第十二军一百零三团工作。

四、红十二军一〇三团

一〇三团是连城地方武装组成的，驻在新泉。一九三〇年三月毕业后，分配我在该团一连三排任排长。我初出茅庐，既是新任军官又是新战士，心里战战兢兢生怕当不好。第一连的武器装备，没有机关枪，步枪也很少，老套筒算最好的了，大多数战士扛的是红缨枪。

到职不几天，就作战斗动员准备攻打连城。我鼓着一股劲，

决心指挥本排打好这一仗。一个漆黑的夜里，从新泉出发向连城进军，走了一晚上，离连城十几里天亮了。队伍停止了前进，连城县委派人向团里报告：住城里的敌人，是被红军歼灭过的郭凤鸣部一个团，昨晚突然向长汀开走了，现城里仅有二百多民团驻守。我们团长曹福海、政委温凤山，得到这个情报就命令部队立即前进。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连城县城，民团逃跑了。这是因为敌人已知道我团要攻打连城，所以有了准备。

进占连城的县城后，团里没有把敌人的行动搞清楚，就轻易分散各连到各乡村去发动群众，实际上，已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敌郭凤鸣部，趁我军分散突然出现，会合民团地主武装四面包围。我们一连在城北十余里的地方，正在敲着锣号召群众开会的时候，敌人打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黑压压地从四面向我连进攻。情况十分紧急，连长命令我排迅速占领阵地，立即向进攻之敌射击，以掩护到会的群众脱险。第七班班长很勇敢，带着全班向敌人射击，打倒几个，把敌人顶住了。我看到会群众跑散了，连部和一、二排突出了重围，但我排被敌人包围得紧紧的，七班牺牲了一个战士，又有一个负了伤。敌人的子弹越来越密集。七班长说：“排长，我们同敌人拼，死也死在一起，决不当俘虏。”九班长负了伤，九班副向我提出：“排长，你带七、八班迅速冲出去，我率九班掩护你们，快下命令吧！”

敌人也不敢冲上我排占领的阵地，只在叫喊：“抓土匪呵！捉活的呵！缴枪不杀！赶快投降呵！”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令七班背枪的战士归七班长指挥，七班长立即发出射击口令，打了三个排子枪，把东南小高地敌人一个指挥官打倒了。我喊：“同志们！快冲呵！”七、八班战士比我跑得快，一口气猛冲，抢占了敌人小高地。杀！杀！明晃晃的梭标，显示出我红色战士的英勇。占领东南小高地后，掩护九班撤下来。我们冲出了敌人第一

个包围，就边打边走。可是看不见我们的部队，只看见山岗上、村庄里，到处插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股一股的敌人仍从我后面追来。在枪坏子弹少的情况下，只得组织神枪手向追击的敌人射击，我令背梭标的战士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杀。直到天黑才赶上大部队。

回到连里时，连长很高兴地问起战斗情况。连长告诉我说：一、二排边打边走，没有伤亡，就是党代表脱离了队伍，找他不见，很可能投降了敌人。第三天，连里接到团长、政委命令，我任第一连党代表，七班长提升为第三排排长，接任我的职务。

退出连城，部队返回到新泉，休整了几天后，奉命开到南阳集中。张赤男同志已把武平的一〇四团，上杭的一〇五团集中在南阳及其附近地区。赤男同志召开了三路军连以上的干部会，宣布闽西红军三路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二纵队。一〇四团的番号改为二纵队的第四支队，我们一连改为十大队，我为第十大队党代表。军首长指示：全军集中到永定有作战任务。第二天在南阳集市的一个大坝上，开了全纵队大会。张赤男同志讲了话，第三天出发，经过才溪、旧县、上杭开到永定，以便与军的主力会合。

我们十二军集中到永定，不几天就向广东东江进发，其任务是扩大苏区根据地，消灭广东国民党军在东江的部队，沟通闽、粤苏区的联系。进到广东，在高陂打第一仗，没有打好，又在大埔打第二仗，因为敌人的兵力、火力都比我们强，又没有打好。这时军的首长就命令部队撤兵到福建地区。开到武平打了国民党军守城的钟少奎部队，战果也很小，尔后就开到上杭的东三区白砂地区休整，准备接受新的作战行动任务。



五、红四军三纵队十九大队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二纵队，由张赤男同志率领，从白沙出发开往长汀，奉命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纵队。在长汀编队时，朱德总司令同我们全纵队讲了话。他脚穿草鞋，身穿短裤，手上拿了一把雨伞。他来到队前，纵队值星官发出立正口令向他报告敬礼后，他走上讲台讲话：“同志们！因为你们不太懂普通话，所以我今天用福建的客家话给你们讲，能听懂吗？”大家答“懂”。“告知同志们，党的前委决定你们纵队正式编为第四军三纵队，我宣布肖克同志任你们纵队司令官，张赤男同志任纵队党代表。这是非常光荣的，但你们的任务加重了，你们要好好的向一、二纵队老大哥学习。同志们！我们要大大消灭白军，大大扩大红军，发展革命根据地，巩固苏维埃政权。祝同志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奋勇前进！”总司令讲完话，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纵队首长肖克司令接着讲话。张赤男党代表讲话后，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要遵守。

那时，“左”倾机会主义的“立三路线”统治着党中央。在集中红军“夺取南昌，会师武汉”的错误指挥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取道江西的瑞金、兴国北上。一军团辖红军第三军、第四军、十二军，朱总司令为军团长，毛主席为党代表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我一〇三团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七支队，十大队改为十九大队，我任十九大队党代表并参加纵队的党委会。从此，我就成为正规红军的初级军官了。那时，福建部队的家乡观念很严重，十九大队在长汀编队时，一百六十人，到江西兴国，就逃跑了六十多人。三纵政治部通知各支队，沿途可吸收工农分子参军。这时大队即令各中队（排）

组织招募新兵的小组沿途扩军。一到宿营地，各中队就打着扩大红军的旗子，出去招募新兵。部队沿赣江东岸北上，到达永丰、吉水地区，招募江西的贫雇农，不久大队员又充实起来。福建战士逃跑的原因是：

第一，家乡观念严重。土地革命后，家里分到田有饭吃了，有的结了婚舍不得爱人，有的生了孩子，还有的老父母无人照料，老想家庭问题。

第二，不会讲普通话。部队指战员全是福建人，在福建活动时都讲福建话。一到江西招来一批江西兵，互相讲话听不懂，常常闹不团结。如福建战士说“江西虾蟆”，而江西战士说“福建土狗”。我们当干部的在本地区活动时队前讲话也讲福建话，现在队前讲话也要改进普通话了，不仅不习惯，还讲不好。

第三，生活习惯搞不在一起。福建战士不吃辣椒，菜里放了点辣椒连菜都不吃了，江西战士没有辣椒吃不下饭，菜里面必要放辣椒。为此经常吵架，有时就打了起来。每天派人采买，派福建战士买菜，就不买辣椒，专买青菜、南瓜煮肉；派江西战士买菜，就买辣椒炒肉。这样福建干部、战士都不吃了。我当时也不吃辣椒，因此思想上是同情福建战士，但行动上不能这样做，我是党代表，一面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号召福建战士学吃辣椒，教育江西战士要少吃辣椒；一方面自己做个模范，带头学吃辣椒。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大队长是旧军官出身，很有钱，是江西人，每到宿营地就叫通讯员买鸡、买肉，炒辣椒。开始一段时间，我一点也不敢吃，大队长就说：“党代表，不吃辣椒你可吃鸡、吃肉嘛！”听他这样一看，开始吃点肉，后来慢慢就敢吃辣椒了。

第四，怕打大仗，怕攻打县城。打吉水城时上级命令一、二纵队负责攻打，我们三纵是第二梯队。夜间接敌运动，我纵随

一、二纵队后面跟进。在前进中不知怎么一回事，前面的部队向我纵队打了个电筒发光，就把我全纵队打散了，直到天亮才把队伍收拢起来。肖克司令发了脾气，说：“这个队伍怎么能打仗呢？非整顿不行。”

打吉水城后，继续北上，占领了樟树镇。白天就地休息，准备晚上横渡赣江。下午突然从赣州开来一个汽艇，向九江开去，一纵队看守渡口的部队，架起机关枪打汽艇。这时樟树镇刮起一阵大风，我们二十大队守卫在街上的一个小战士，认为刮妖风了把枪丢了就跑。为执行军纪，部队到高安县时，集合全纵队宣布把这个丢枪的战士枪决。很多人都表示不满，有的战士流着眼泪说：“这是我们革命的下场，多么残忍呵！”

在樟树镇过赣江后，沿江边西岸走了一天，上级布置各大队到地主家去收集木板写标语牌，放在长江内，让其向南昌、九江流去。我们十九大队的司务长杨尚儒同志，是共产党员，做木匠出身。他背了三十多块银元的菜金，很负责地到地主家找着了许多木板，又找到木匠工具，就在地主家做标语牌。因出力劳动，天气又热，把所背的银洋放在那里，走时拿上标语板而忘记背银洋丢在地主家里。第二天出发走到路上，他才想起来，急忙向大队长和我报告；我们即派了通讯班长陪他回去找。可是走到地主家银洋找不着了，回来请求处分。我和大队长立即向支队长、政委写了文字报告。纵队党委开会研究给他处分时，纵队司令官提出：按军纪规定执行枪决。我说：“不能枪决杨尚儒同志，因为搞木板写标语是我派他去的，应该枪决我或两人都枪决。”纵队党委书记张赤男同志做结论时说：不该枪决，而把杨尚儒撤职当战士，党内受严重警告处分。这件事杨尚儒同志记得很深的。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相见时，还说：“不是你这个党代表硬顶，我一九三〇年就枪决了。”

一九三〇年七月下旬，红一军团经上高、万载进入湖南，在浏阳文家市打了一仗，把国民党军的戴斗垣旅全歼了。我大队缴了许多步枪，还缴了一挺轻机枪和两支驳壳枪。这仗一打，就把部队怕打大仗的情绪打消了。在攻打文家市的战前，我们纵队召开了大队长、党代表以上的军官会议。肖克司令官在会上传达了我们攻打文家市的任务和战斗部署，并宣布各大队的党代表因没有打大仗的经验，可在队伍后面跟进。纵队党代表张赤男同志接着讲话说：这仗一定要打好，我们以消灭国民党军阀戴斗垣部队来与三军团会师，坚决执行司令官宣布的战斗部署。党代表要同大队长一起前面指挥作战。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身为党代表，更不能怕死，谁做不到这点应开除党籍，严重的枪决。这次战斗中，我不敢走后头，而紧紧地同大队长一起指挥部队，同战士一起冲锋。

消灭戴斗垣部队后，继续向长沙进军，准备同三军团会师。这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进行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三军团打的，我们一军团没有参加）。一九三〇年八月初，在长沙以东地区一、三两军团胜利会师了。会师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朱德同志兼一军团司令；方面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兼一军团党代表。那时共有六个军，第一军团辖三军、四军、十二军；第三军团辖五军、八军、十六军。三军军长黄公略，四军军长林彪，军党代表罗荣桓，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五军军长由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同志兼，军党代表由三军团党代表滕代远同志兼，八军军长何长工，十六军军长孔何宠（叛变投敌不久就被枪杀了）。会合后，方面军立即部署第二次打长沙。

第一次攻打是晚上的偷袭。这次战斗没有打好，主要是一、三军团的部队发生了误会。因为三军团的部队着装是第一次打下长沙时缴到的敌人军装、军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仅仅在

左臂上带了红臂章。因夜间黑暗看不见带的红臂章，我一军团进攻部队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于是一遭遇就拼命的打。结果自己打了自己，把整个战斗部署打乱了，弹药消耗不少，双方都有伤亡。后辨别清楚了才各撤回原地休整，准备再次部署攻城。

第二次攻打是预先有准备的攻坚。长沙原有城墙，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动员人民群众把大部分城墙都拆掉了，敌人还没有修筑起来。可是敌人加深了外壕，并设有电网。这次攻打长沙，除了组织火力掩护部队攻城外，担任突击的部队还买了大水牛，在牛角上捆着两把大砍刀，水牛尾上吊了纸连炮，十条大水牛排一起组成“火牛阵”。指挥员发出了号令，一齐点着牛尾上的纸连炮冲电网，结果惊得大水牛不往电网冲，而到处乱跑一气，把突击部队搞乱了。这种战法又未成功，于是各部队又撤回休整，准备再一次进攻长沙。

纵队首长的决心很大，一定要攻下长沙，第三次进攻采用“连坐法”：如中队长不前进退下来，大队长可杀中队长；反之，如支队长不前进或退下来，大队长可杀支队长。上级可杀下级，下级也可杀上级，“只能前进，不准后退”，这就叫“连坐法”。纵队组织了战斗审查委员会，战斗结束后，开会审查处理在战斗中退下来的官长、士兵。这完全是用冒险主义的“人海战术”，结果是犯政治上的大错误。

一九三〇年八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用“偷袭”、“火牛阵”、“连坐法”的硬攻，都失败了。这是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攻打了半个多月的时间，部队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很大。这个时候，敌情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在河南、陕西等地作战。因为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蒋介石又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对付我军，停止了他们军阀之间的战争。蒋介石调大量的军

队，增援了长沙。红一方面军在朱总司令、毛党代表率领下，迅速退出湖南，回兵江西，决心攻打吉安。

撤出长沙附近地区后，我一军团部队路经株州、安源。那时国民党的飞机，沿途侦察我军的行动，部队看到山头上的飞机，就散开隐蔽，但军官不允许，骑在马上督队行军，向吉安急进。敌机飞低了，就命令士兵向它射击。敌机扔的炸弹很小，象迫击炮弹一样，确实也不太可怕。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攻打江西第二大城市吉安。一军团打了一天外围接近城沿，正在部署第二天攻城时，守吉安城之敌于当晚突围向赣州逃去了。我军占领吉安城后，提出扩大红军十万，号召地方游击队参加红军。但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做法，不作政治动员工作，以命令的形式强迫地方部队参加，把地方部队调来站队，用一、二、三报数的方法，三抽一，数三的就当红军。因为不是自觉自愿的参加，部队逃亡很多，并出现反动秘密组织“AB团”，对红军内部破坏捣乱，造成部队不巩固。“立三路线”完全破产了。这时开始提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部队立即西渡赣江，回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肃清“AB团”，准备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这时部队番号、名称和官、兵、夫的叫法作了更改。如军辖的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大队改为连。我们四军三纵队改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原纵队司令官改叫师长。我十九大队改为十二师三十四团第一连，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原叫军官改称干部，士兵改称战士，即称指挥员、战斗员、政工人员等，如火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等等。

部队回到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永丰、宁都、兴国各地。这时我被调到师直属队伍任直属党委书记。因为“AB团”常开秘密会议，与我们党开小组会一样，所以一九三〇年冬，公开

了部队的党团员活动，以免混淆不清。

六、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

一九三〇年秋，原江西红军第二十军的二七八团的团长是“A B团”的头子，他带部队由永新县开往吉安时，公开叛变投敌。但他仅带走一部分部队，还有六个整连由该团的党代表率领东渡赣江，十月下旬进到宁都，经前委决定，编入红军第四军，为十二师的三十六团。调四军军部参谋处长姜振海同志任团长，调我任该团政治委员。编队以后，战士们的情绪不很好，每个连只有十几支老套筒、单响柳，大多数都背梭标（红缨枪），所以人家称三十六团为“梭标团”。在这种情况下，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首要问题。那时我们党小组开会，“A B团”也开秘密会，弄得一般战士摸不清头脑。也有“A B团”分子乘机把我们的党员拉去开会作反革命的宣传。散布说：“当红军无出路，国军力量大，蒋委员长统治了全国，打仗的时候我们跑去当国军好……”为了使战士们分清敌我，暴露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党的前委决定在红军中公开党的组织，于是，暗藏的“A B团”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狡猾与隐蔽。

十二师肖克师长、张赤男政委为三十六团肃清暗藏的“A B团”分子，提高战斗力，从三十四团、三十五团抽调一批党员骨干来加强我团党的领导，我们又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进行党员教育，通过党的骨干力量，使各连队的党员能起积极作用，因而很快就把“A B团”反革命分子肃清了，部队逐渐巩固了。特别是干部以身作则，深入到战士中去，所以指战员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们的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吃在一锅，睡在一起，战士有什么思想问题，干部都能及时知道，及时解决。在这段时间内，“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是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前练兵

我团政治工作打下基础后，便集中兵力练兵，准备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因为三十六团没有打过大仗，战士们大多数都害怕打大仗，不少的干部也没有信心，所以在战前必须进行大练兵。练兵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使用好手中掌握的武器，发挥梭标的杀敌作用。当前必须做好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实施练兵中，我们强调梭标在战斗中的作用，向敌冲锋便于白刃格斗，敌人最害怕我们的梭标。我们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原来也是背着梭标与敌作战打几次仗后，他们的武器，都换成缴来的汉阳造步枪、重轻机关枪和迫击炮。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送来。这是真理，不是笑话。”

我同姜团长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带着队伍到野外去，先让通讯员把一面大红旗插在山顶上，然后命令各连在统一的号令下端着梭标抢山头，从四面向山顶冲锋，争夺红旗。这样一面训练战士英勇杀敌，一面锻炼爬陡坡、抢山头。经过一段紧张训练，战士们渐渐地喜爱梭标了，他们自编了歌唱着：“梭标长，梭标长，梭标头上闪金光，梭标戳入敌心脏，刺杀敌人见阎王。”

我们团又从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借来了步枪，每个战士发了三粒子弹进行实弹的射击。战士们第一次使用步枪，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同时我团还组织了重机枪训练班，准备缴获敌人的机枪后马上会使用。这段练兵时间虽不很长，但成绩却很显著，鼓起了全团指战员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参加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〇年冬，蒋介石在结束了蒋、冯、阎的军阀混战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我中央苏区进攻，企图“围剿”歼灭红军。我红军第一方面军部队，集结在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天下着毛毛细雨，田埂又窄又滑，我团沿田埂向西北方向走。全团指战员战斗情绪很高，决心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一路上鸦雀无声，天一片漆黑，每人头上扎一条白手巾，便于后面战士联络。走了一晚上，部队在龙冈村外集结，团长从师部回来，传达了作战部署。我团是师的第二梯队，在三十四团、三十五团用火力压制敌人后，把第一次打大仗的三十六团派去向敌冲锋，能充分发挥“梭标团”白刃格斗杀敌的作用。

十二月二十八日，天刚拂晓，三十四、三十五团在前面打响了。听着猛烈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挥动着手中的梭标，急着冲锋杀敌。突然听到师部的号音，我团立即运动前进，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我团连长、指导员身先士卒，战士们端着梭标飞快前冲。“冲呀！”“杀呀！”一股作气夺占了敌人阵地，缴获了守敌的武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师，当了我们的俘虏兵，这一仗打破了战士们害怕打大仗的心理，战斗勇气更加旺盛起来了。

攻占敌人的主要阵地后，冲进了敌人的后方，缴获了许多弹药、物资和一架无线电台。那时，敌人使用的电台不是马达，而是充电机。战士们不知道是电台充电机，以为装银洋的保险柜，里面是银洋，因此用铁杆拼命地砸，有的干部看着战士砸，也没有制止。还缴了许多肉罐头，战士们以为是油墨，连长指导员就叫通讯员送到团部印刷所去了。缴了很多国民党的钞票，叫法币，战士们说，这是反动派的钱，我们不用，把它烧掉了。

龙冈这一仗缴获的枪支，有汉阳造，也有苏式步枪，连有轻机枪班，团成立了机枪连，配重机枪六挺，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我团的战斗力。战士都背上了步枪。可是有的战士还说步枪不如梭标好。不肯把梭标杆子去掉，梭标捆在背包内保存。说这是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主要武器，是背着它来参加红军的，不能忘本。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赞，被我第十师的部队活捉了。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工农子弟，有的是抓壮丁抓去的。他们不愿为国民党军官卖命，加上我们的喊话国民党士兵有所感动。我们喊着：“国民党军的士兵弟兄们！你们不要给军阀当炮灰！我们都是阶级的兄弟，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夫一律平等！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过来参加红军！……”俘虏过来后，我们说：“你们放下了武器就不是敌人了，而是阶级的兄弟。”由于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就成了勇敢的红军战士。记得有个青年士兵叫胡炎林，俘过来后就补充到团部当通讯员，接着打东韶时，他很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在战场喊话，他就喊过来几个国民党军的士兵。一九三一年的一月一日，在东韶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第二仗，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谭道源部。这仗把敌人大部消灭后，各路敌人都撤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地结束了。三十六团经过反“围剿”的战斗锻炼，也成为工农红军的野战部队之一了。

参加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

敌人第一次的“围剿”被粉碎后，我三十六团进到宜黄、乐安、永丰一带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训练部队，总结经验，侦察敌人的行动，准备粉碎敌人向我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时，上级调肖克同志任四军参谋处长，耿凯同志调任我

们师长。

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兵力达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次“围剿”非嫡系部队多，从北方调来的有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还有王金钰、郭华宗、郝梦龄等师都是北方调来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山地作战的经验，地形也不熟悉。没有同我红军作过战，对红军有恐惧心理，我们向战士们动员说：“北方兵，个子大，目标大，不会爬山，容易把他歼灭”。战士们的士气很高，都磨拳擦掌准备打北方兵。敌人分兵三路向我苏区进攻，其作战办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象乌龟爬沙一样，一步一步地向我苏区推进。敌人的兵力虽大我们四倍以上，但毛主席制定的我们红军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我们是打速战速决的歼灭战，选择敌人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股后再歼另一股，这就是红军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有把握地歼灭敌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我军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东韶消灭谭道源师的战斗结束后，我团随师主力北进，经腾田、牛田到乐安之石塘、增田一带训练部队，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并发动群众开展扩大与巩固苏区的工作。这段训练的时间近四个月，我团军事练兵抓得很紧，训练成绩很显著，部队的政治情绪很高。在训练的同时，各连和团直机关明确分配到各村庄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参加群众的生产劳动。我们部队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我团离开当地时，大多数群众都恋恋不舍，有许多群众流着眼泪送行很远才回村去。

“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歼灭敌人”，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旬，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三路同时并进，其左路王金钰师已进到富田一带，

如继续向兴国县推进，必须占领九寸岭阵地，以掩护其主力向兴国进军。我军为诱敌深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力即开到宁都、兴国地区隐蔽集中。五月十三日，我团进到兴国的东固隐蔽集结，师长、政委命令我团如敌继续前进占领了九寸岭阵地时，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攻夺九寸岭阵地，尔后师主力向富田之敌进攻。我们接受了作战任务，团长率各连连长去察看地形，我布置战时政治工作，各连指导员回去作深入的政治动员和作各项战斗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敌王金钰师已向兴国县推进，先头部队进到了老营盘，并控制了九寸岭阵地，掩护其主力行进。师首长令我团当晚向九寸岭隐蔽前进。占领进攻出发地。攻打九寸岭是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第一仗。十六日拂晓，我团先以重机枪连的六挺重机枪，猛烈向九寸岭之敌射击，一、三连立即前进，向九寸岭之敌发起冲锋，二、四连为梯队跟着团部前进。在半小时之内，一、三连攻占了九寸岭阵地，消灭了九寸岭阵地的敌人，接着我团随师主力迅速向富田攻击。这时我四军各师均先后赶到富田。全军总攻富田，敌无力抵抗，大部被歼，一部分向吉安方向逃窜。我军跟踪，一直追到水南。第二仗打的是公秉藩师，该敌对红军十分恐惧，稍打一下就向后逃跑了。接着我军转向白沙，打第三仗。全军三面包围攻击白沙之敌郭华宗师，把该敌全部歼灭。

我团从十六日拂晓九寸岭打起，打了三仗，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大行李、炊事班都落在很远很远。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都吃光了。我团进攻水南发现敌人的仓库，里面堆满了面粉。因为王金钰、郭华宗都是北方人，要吃面。但我团指战员大都是南方人不吃面，也不会做面食。可是北方战士，尤其是我团机枪连战士，大半都是北方人，一见敌人粮仓内堆了那样多面粉，高兴得

跳了起来。机枪连长陈冬生同志令战士尽力地背。到了休息时，各班擀面的擀面，烤饼的烤饼，吃得饱饱的。其他各连和团部人员都是南方人，有面不会吃，饿得要命，只好向群众买南瓜、白薯，煮来充饥。机枪连烤的饼还送给我们吃。

部队休息不到两个小时，接到师部命令，立即出发东进。经过沙溪、洛口向广昌开进，两天急行军到达广昌，打孙连仲二十六路军，这是第四仗。广昌战斗仅歼灭二十六路军的一部份，其大部敌人向南丰撤走了，我军已进占广昌城。这时师部又来了命令，部队继续向福建建宁前进，打国民党福建军阀刘和鼎师。我们又走了几天，在建宁打第五仗。刘和鼎师在建宁稍抵抗了一下，即退出建宁城。向顺昌、南平方向逃窜了。仅歼敌一小部，我军占领了建宁城。我团奉命进到泰宁地带开展扩大苏区工作。至此，将敌人第二次“围剿”，彻底地粉碎了。

第二次的反“围剿”，我军在十五天中打了五仗，从江西的富田攻到福建的建宁，走了七百多里。全军歼敌两个整师，打垮敌人三个师，缴各种枪支二万余。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集中我主力，打击敌人的弱点，而取得的伟大胜利。

参加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我中央苏区急进。左路总指挥朱绍良驻南丰，中路总指挥何应钦，与蒋介石同驻南昌，右路总指挥陈铭枢驻吉安。总兵力三十万，主力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和蒋鼎文等五个师，兵力非常充足，每师九个团共约十万人，他们吹牛说：“陈、罗剿匪，马到成功”。其次主力是蒋光鼐、蔡廷楷、韩得勤和孙连仲共约六万人。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长驱直入、压迫红军于赣江以东而歼灭之”。

我团在建宁战斗结束后，没有好好休整，立即进到泰宁地区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工作。一九三一年六月下旬，师部命令我团随主力即日起程，从福建开回江西赣南苏区，准备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部队日夜兼程西进，绕道千里，在一周之内赶到兴国县境隐蔽集中。师首长传达毛主席的作战方针：“避敌主力，选择敌之弱点突破，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并布置了本师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在这次会上，师长宣布我团团长姜振海同志调任师参谋处长，林发同志调我团任团长，立即到职。并提机枪连长陈冬生同志任副团长，这样变动就加强了我团的作战指挥能力。

我团接受作战任务的第二天，从兴国向富田开进，为师的前卫，进到老营盘，我军的行动就被敌机侦察发觉了。于是陈诚、罗卓英两师，飞快地赶上逼近我军。根据敌情变化，不能继续向富田开进了，上级令即回兴国县西部之高兴圩隐蔽集中，待命行动。这时整个红军仅有高兴圩周围的几十平方里地区了，各路的敌人都向我军逼近。朱总司令、毛主席命令全军白天隐蔽在树林内，不管指挥员、战斗员、炊事员等人都自己挖一个隐蔽敌机的战壕坑，不许烧火冒烟，夜间煮饭，各人自带吃一天，反光的东西需用树枝、树叶遮盖好，每人都用树条做个防空帽等。全军在这个地区隐蔽集结了一天。毛主席在隐蔽的树林内，召开了团长、政委参加的会议，如实讲了敌人各路向我进军的情况，明确指出，“每个指战员要遵守规定，特别是今晚，我全军要在敌人的空隙间通过，要静悄悄地进军，不能有音响，不能有发光，沿途不能留有行迹，指挥员、政治委员要以身作则亲自检查。”开完会，我们就赶快回去布置动员和作更具体的规定。如手电筒由各班的班长亲自摘下灯泡，炊事班的油桶、煮饭的锅，由各连司务长负责检查捆紧，在行进中，任何一员都不准咳嗽，不准叫喊，

不准掉队。各连长、指导员必须负责连与连间联络等等。因为一个晚上全军要在蒋光鼐、蔡廷楷、蒋鼎文和韩德勤四敌军之间，仅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通过，一点纰漏也不能出的，全军指战员当时那种紧张心情，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师的首长令我团为前卫团，第一天夜晚，很顺利地在敌空隙间通过，转到兴国县东部连塘。第二天拂晓，与敌上官云相的前哨部队接触，我主力进入战斗后，我团直插敌人的纵深，全军以绝对优势于敌的兵力，全歼上官云相师，接着全军部队迅速向南丰急进，第三天攻打南丰县南部良村敌郝梦龄师。我团为师的本队，把该敌全歼后，俘虏敌官兵集合在良村及其周围。当天上午十时左右。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猛炸良村及其周围的地区，敌机以为是我军部队，结果把大批的俘虏炸死炸伤。我军战斗结束后，迅速离开了良村地区隐蔽起来了，毫无损失。毛炳文以为我军主力离他很远。在兴国、南丰地区作战一时到不了黄陂。但他得知上官云相、郝梦龄被歼，他也不敢前进，于是停在黄陂做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守备。我全军以三天行进赶到黄陂，军首长决定先以我十二师突破敌人阵地。尔后全军投入战斗，配合友军一举歼灭毛炳文师。

我团进到了黄陂村西北敌人守备前沿之外隐蔽集结。耿凯师长、张赤勇政委来了，令我团担任主要突击，三十四团助攻，三十五团为师的第二梯队。他俩站在一个小高地上勘察，把我们三个团的团长、政委找去，作具体部署。令全师的司号员集中到师指挥所，迫击炮连占领阵地，指定了射击目标，明确各团重机枪的任务。师发出号令后，同时向指定目标射击，以掩护我团突破敌人阵地。我们回团指挥所，下令全团指战员卸下背包，上好刺刀，手榴弹盖子打开，一切都准备好。我团的战斗部署：一、二连为第一梯队，团部和三、四连随后前进，要不顾一切代价地

向敌人猛冲，一定要夺占敌人的阵地。陈冬生副团长是机枪能手，他亲自安排机枪射手的瞄准目标。

不一会，师部打了三个红色信号弹，全师的重机枪、迫击炮向敌阵地突然射击，师的指挥所三十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冲锋号。我团在全师炮火掩护下，勇猛冲击。一连很顺利，伤亡很小就占领了敌人阵地，二连攻敌碉堡，碰了硬钉子，碉堡是攻占了，但伤亡较大，连长牺牲了，我跟着二连前进，右腿负了伤。因为后方医院也不安全，所以师首长命令坐担架随团行动。黄陂这一仗，把敌毛炳文全师歼灭了。以上三战我军皆胜，俘虏敌人很多，缴枪一万余支。

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黄陂全歼毛炳文，蒋介石手忙脚乱，令所有向西南开进之部队，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军作战，采用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妄图消灭我军。但我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英明指挥下，乃于蒋光鼐、蔡廷楷、韩德勤、陈诚和罗卓英各军之间，在仅有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了。敌人向东时，而我则向西去，由东面又回到西面之兴国县境内集结。我团在兴国县以东的江背、大坑休整。以后敌发觉了我军再向西进时，我军已休息半个月了。敌人精疲力尽，无能为力了。他们自己说“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又说“朱、毛红军真难打，有钻山阵、麻雀阵，再打下去全都要完蛋”。于是蒋介石只好下令退却了。

敌军退却，我军跟踪猛追，在白沙全歼敌韩德勤师，在老营盘歼灭蒋鼎文一个旅，在兴国以北的竹高岭，与蒋光鼐、蔡廷楷两师打成了对峙，让其逃去了。但在竹高岭打蒋光鼐、蔡廷楷，我军伤亡也很大。如我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该师剩下人员编为一个团，为十一师的三十一团。我们十二师伤亡较少，三个团合并为两个团，四军的十一、十二

师，合并为十一师。军委另调来一个地方部队，编为军第十二师。耿凯师长亦负重伤送医院治疗，调来周昆任十一师师长，张赤男同志任十一师政委。我三十六团改为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林发，副团长陈冬生，我任政委。

国民党军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率三十万大军对我中央苏区“围剿”，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英明正确的指挥下，我们又彻底把它粉碎了。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旬打起，到九月中旬才结束。全军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召开大会庆祝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这时，周恩来副主席，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他留着很长很美的大胡子，穿着普通的灰色中山服，戴一顶大礼帽，非常威武。在他讲话前，毛主席介绍了周副主席的革命斗争史；朱总司令讲话时，代表全军指战员对周副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周副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全军指战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七 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

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把蒋介石的头打晕了，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我中央苏区进入一段较稳定的发展时期。红军主力转到宁都、石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扫清存于根据地内的反动白点，以巩固中央苏区，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围剿”。

攻下洪石寨巩固根据地

我们三十六团改为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后，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奉命开往石城以北之小松地区休整，师部住驿前。该地有个天然的险要洪石寨，石城县境的恶霸、地主豪绅及反动民团武装，都在寨内，并加修碉堡固守起来。师的首长令我团经短期休整后

攻下洪石寨。经过了地形的侦察和当地群众报告：洪石寨内有一千多地主恶霸，反动武装民团二百余人，地形十分险要，太平天国时洪秀全派兵打几次。始终没有打下来。当地的工农群众十分希望红军打下洪石寨，但又很担心红军打不下来，走开后他们受不了，会被地主恶霸残杀。林发团长对群众说：“老乡们！你们不要担心，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三十万兵，红军都把他打垮了，这个洪石寨算什么？你们放心好了，我们红军一定把洪石寨打下来，为你们除害。”

十月下旬，林发团长亲自指挥攻打了一仗，因地形太险要，部队爬了上去，也有些伤亡，只好撤回部队。但发现和查明了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和进攻上寨的死角，于是积极地准备再次攻打。十一月初旬第二次攻打时，我已伤痊愈，同团长一起指挥，并调来师的迫击炮连。一天拂晓，团长发出攻击号令。先以火力压制敌人掩护突击的第一连架起云梯，爬上了悬崖，突击队战士将手榴弹塞进碉堡内，炸死了里面的敌人。一连的突击排占领碉堡后，重机枪、迫击炮猛射，掩护第一连攻占小寨。但大寨仍有敌人守着。我们重新组织火力，掩护二、三连攻击大寨。经两个小时战斗，占领了大寨，全歼洪石寨内的敌人。地主豪绅、恶霸头头，还有石城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反动民团官兵，全部被俘，无一漏网。除缴获枪弹外，粮食等物资也很多，交给了石城县苏维埃人民政府接收处理。县人民政府通知全县的工农群众上洪石寨领取分配的粮食等物资。全县工农群众热烈慰劳我军。打下洪石寨，石城县工作有很大开展。周昆师长、张赤男政委也上洪石寨察看了一遍。他们说：这个洪石寨的天然地形真险要，确不易打，三十三团打下来了，证明战斗力强。师长政委通令嘉奖我团。

全军肃清苏区中白点的工作，使中央根据地巩固扩大了，把

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这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主席。十二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队，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团。

三

打南康县城 赤男同志牺牲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红四军由宁都、石城进到于都及其附近地区。这时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我十一师单独行动于赣州以南之信丰、南康和南雄之间地区。二月七日，在南康县西南的新镇打广东陈济棠的部队，歼灭一个营。但我最大的损失是政委张赤男同志不幸牺牲。我师在该地区活动半个月，主要是配合三军团攻打赣州，牵制广东的军阀部队。二月下旬，军命令我十一师开会昌、于都地区。本团住会昌县以北的西江地区。到达该区后，师政治部开了张赤男同志的追悼大会。张赤男同志是闽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到部队工作后，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政治水平高，作战很勇敢，对同志很热爱，个人生活很简朴，作风非常正派。张赤男同志的英勇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前委决定三十二团政委刘亚楼同志，担任第十一师政委，师直党委书记杨成武同志，调任三十二团政委。

打出外线 开辟闽南

在会昌时，我们一面抓紧练兵，一面帮助当地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师部通知我们到军部开会。林发团长因病，我和陈冬生副校长出席。会场设在一个姓宋的宗祠内。我们一进会场，就看见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庆祝新的军团部成立，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打到外线去，开辟新苏区！”

等标语。突然会场里肃静下来，接着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入了会场。他们穿着一身半新的灰布军装，朱总司令的胡子剃光了，毛主席的头发也是刚理过的，显得精神焕发。他们满面笑容地同大家一起鼓掌。

朱总司令主持会，他首先宣布前委决定：“本来第一军团的领导机关是由方面军机关兼的，现又成立第五军团，因此方面军机关不再兼任了。前委决定成立第一军团的领导机关，第四军军长林彪任第一军团长，调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一军团政治委员，四军政委罗荣桓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军长由十师师长王良升任，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任四军政治委员。”朱总司令接着说：“为了利用两次战役间的空隙，发展新苏区，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大批补给物资，前委决定一军团三军、四军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打出外线，开辟闽南。毛泽东同志亲自率东路军行动。前委决定我留在苏区，准备粉碎敌人我再次‘围剿’。三军团在赣西、湘南地区开展工作。”

毛主席讲话了。他说，闽南行动是逼近厦门，畅通海外。当前日寇势力已达厦门，常有日本军舰游弋海上，并有登陆向我内陆侵犯的企图。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的侵略阴谋是一个直接的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对国外，都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毛主席还说，我军主力如果西进，有赣江梗阻，不便于发展；向东打出去，一来有闽西老区作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地区。毛主席着重说，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在巩固苏区的基础上，集中我主力向白区推进，是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但也有人害怕红军主力走远了，敌人就会来占我们的老家，因此反对集中兵力向白区进军。其实他们看不见苏区人民力量的强大，不懂得敌人正是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去。敌人总是跟着红军主力走的。我们主力在白区打的

胜仗越多越大，就越能保卫和扩大苏区的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精辟透彻的形势分析，使我头脑清楚地认识到此次东征的重大意义及其必胜的条件，从而坚定了我的胜利信念。

接受派遣 回到才溪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师部通知我立即去接受任务。周昆师长一见面就说：“刘忠同志，东进的命令来了，你看看吧。我们是前卫师。部队后天出发，进军的路线是从会昌入闽，经上杭、龙岩、直下漳州。你是上杭才溪人，过去做泥匠工时走过几个县，闽西几县的土话都会讲，我们研究要你先行。任务是：第一、与各地党政机关接头，动员为东征部队准备粮草，并布置封锁消息；第二、探察进军路线和查明龙岩、漳州驻军情况；第三、动员地方组织支援前线的运输队、担架队；第四、号召赤卫军参战并扩大部分兵员。”师长讲话后，刘亚楼政委接着说：“林发同志因病留在后方休养，陈冬生副团长代行团长职务。时间很紧，你回团把工作安排一下，交代好了立即出发。”

我向陈冬生副团长交代了一下，就带了几个通讯员连夜急走。第二天黄昏赶到了我的家乡——才溪。三年多没回过家乡，回来一看大变样了，简直认不出来！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正筹备办才溪中学，赤卫队在紧张训练，少先队、儿童团非常活跃。我到区委会见了书记林应^三同志，把红军入闽东征的任务向他谈了。一听说刘忠回来了，干部、群众都来到扶良社的区委会办公室，问这问那，我一一回答。接着又问朱军长、毛代表情况。我说，毛主席亲自率领东征的红军来了。干部、群众一齐热烈地鼓掌。

当晚，应三同志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我在会上讲了部队东征的行动情况，要区委动员支前、参战的各项工作。区委立即研究决定，作了具体布置。才溪人民连夜准备支前、参战。第二天，

我继续向白沙、适中前进，沿途同当地党政机关谈红军东路军行动情况，并动员支前、参战，一直布置到我苏区根据地的边沿地区。

我完成先遣任务返回部队的时候，正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那天红军第四军胜利攻占了龙岩城，一举歼灭福建军阀张贞的一个团，打开了向漳州前进的道路。

龙山打敌机 夺取天宝山

打下龙岩后，大军当即离开苏区向东南挺进。经合溪、芝田、水潮、龙山，直逼漳州西侧的天宝山。由于我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及部队神速的进军，我团进到距离漳州不过百里的龙山，敌人还不知我先头部队已到达，敌人从漳州派出飞机，经龙山飞往龙岩方向，侦察我军的行动。陈冬生副团长原是国民党的机枪连长，是一个机枪好射手。他下令在龙山顶上架好机枪，自己在山顶观察，并亲自射击，把敌机驾驶员打伤。后来听说敌驾驶员飞回漳州机场后抢救无效死去了。

天宝山，紧靠漳州城，是闽南有数的大山之一。前有龙江，背倚漳州城，山高势险，石壁陡峭，还有风霜岭、杨梅岭、十二岭峰峰耸立，岭岭相连，构成了漳州城的天然屏障。敌人发觉我军矛头指向漳、厦，于是慌忙调来杨逢年旅固守天宝山。杨逢年以大尖山、十二岭为中心，构筑了防御工事，凭险据守。

要攻占漳州城，必须先夺天宝山，要夺天宝山，必须抢过龙江。攻夺天宝山的任务便落到我团的头上。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拂晓，我团奉命先头出发。春夏之交的南方山区，气候变化很大，下半夜还是月朗星稀，待拂晓出发时就下起雨来了。部队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山间小道前进。翻过一座大山，到达龙江边上。一看河水没有涨，对岸没有敌军守备，于是命令部队立即

徒步涉水过河。我和陈冬生副团长，带着两个步兵连和团部刚刚渡过去，上游的山洪突然冲下，河水猛涨，把我团隔成了两半。因距敌不远时间紧迫，只好设法游水过河。会游泳的战士、民工、游击队员，组织起来跳下水，一人带一人，往返了几趟，使我团全部人马很快地渡过龙江。

固守天宝山之敌以为天下大雨，河水猛涨，我军不会到达龙江，所以疏忽了警戒。我师直各团部队当天下午三时，全渡过了龙江。师长、政委立即找我们开会。三十一、三十二团的团长、政委也同时到达师部，周昆师长指着军用地图，谈固守天宝山之敌的分布和工事构筑情况，接着区分各团的作战任务。命令三十一团提前三小时行动，绕到敌后去攻歼大尖山守敌，令我团担任正面主攻天宝山，明十八日拂晓，以突然动作在板溪与盘桓岭之间打开缺口突破，攻击得手后，迅速直插天宝城，截断敌人退路。令三十二团为师第二梯队，在师直后跟进。师长规定了师统一发起攻击的时间和通信联络的信号。刘亚楼政委特别指出我三十三团的作战任务是关系着全军进展问题，着重说：“你们要以最顽强的战斗精神攻夺天宝山，一定要插进天宝断敌退路，这是攻占漳州关键的一仗。”

半夜一点钟，部队吃饱了饭，一切都准备停当，便向着攻击目标进发了。夜里漆黑一团，我们静悄悄地向天宝山敌人前沿阵地盘桓岭隐蔽前进。三点半，我一、二连和重机枪连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到距敌人一百多公尺的山岩下隐蔽起来。陈冬生副团长布置好了兵力、火力。我蹲在机枪连的位置望着敌方，但天不亮，看不见，我们焦急地等着三十一团的枪声和师发出攻击的信号。时间好难挨呵！一分钟，两分钟……慢慢地看见东面显出了白色，眼前敌人的防御工事、帐篷也隐约地看见了。突然听到三十一团的枪声，师攻击号令发出了。我立即站起来喊：“打！”重轻机枪

一齐开火，又喊：“一连冲锋！”一连长身先士卒，带着队伍向前猛冲，一下子消灭了守阵地的敌人，抢占了天宝山敌人第一个阵地。我和陈副团长率领全团部队跟着一连，不顾敌人的火力封锁，向敌纵深插入。当我团攻占天宝山第二个阵地，绕过大尖山的山腰，插向天宝城前进的时候，回头望着大尖山，三十一团已冲上了山顶，正象赶鸭子一样，把敌人压到山下缴枪了。

打退救援兵 进占漳州城

天宝城内，是敌人的后方辎重队及掩护辎重的部队。我团进占天宝城之后，即向通漳州的公路派出部队警戒。部队刚出城，只见漳州敌大队人马以几辆汽车为前导，向天宝城开来。这是陈国辉旅，由张贞派出来增援的。我们迅速指挥部队沿香蕉地隐蔽前进，在敌人侧翼一顿猛打，把敌人打得乱窜，不敢前进，敌即后退到茶埔扼守阵地抵抗。我们便令二连长率一个排沿河坎隐蔽，绕道插到敌后，向茶埔敌人侧后攻击。退守茶埔的守敌，因怕后路被我军切断，慌忙向漳州退去了。我东征红军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向漳州前进。

我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在东征军主力配合下，全部歼灭了守天宝山各个阵地的敌人，派来增援的敌军，又被我团打得狼狈而逃，天险的天宝山落入我军之手，吓得漳州守敌恐慌万状，连夜逃向泉州、厦门。

漳州是福建第二大城市，我们师根据王良军长、罗瑞卿政委的指示，召开了干部会，严肃地宣布了进漳州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举行入城典礼，我团走在最前头，全团司号员集中作为前导，团直后面五个步兵连和机枪连，排成四路纵队。快要进城门的时候，值星员一声令下，军号齐奏，红旗飘扬，部队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当兵就要当红

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整齐雄壮地向着漳州大街上前进。街道两旁挂着欢迎红军的红旗，挤满了群众。他们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我团住在漳州城内国民党的闽南医院。城内秩序很好。商店照常营业。街道上除宣传队和调查的工作组外，很少有军人在街上往来，偶尔见到也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我军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在街头巷尾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和抗日的主张。

漳州解放的第十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军用修好的飞机在漳州上空散发传单。“五一”那天军团政治部召开了有一万多名群众参加的群众大会。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闽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号召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聂荣臻政委还利用这个讲坛向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

我军在漳州召开了干部大会，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红军只会关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打胜仗，可以叫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嘛！从江西几百里跑来，一下子打到了这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简直是成了“天兵天将”，（大家齐笑）还说：从现在起，要分散出去发动群众，广泛地宣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工农群众以开辟新的苏区，这是我东征军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团奉命挺进石尾，角尾地区，向厦门、泉州方向警戒，以掩护全军清剿零散土匪，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这里正是九龙江的入海口，濒临海边。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日本军舰往来巡哨。夜间敌舰上的探照灯不时射到我团的宿营地。

进漳后，听说被我团打中的那架飞机仍在机场。我和陈副

团长带了一个班进到机场一看，果然在，高兴极了，我赶快爬上机舱内。后立即报告了师首长，派了部队看守。军团后勤部找到了修理机工，很快把飞机修好了。“五一”节那天，飞上了天空，散发了传单。从第二次打长沙到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敌人的飞机老在我们头上转来转去，就不知道飞机怎样构造的，这次上飞机一看，才知道了飞机的构造、驾驶和座舱，使我又增加了一些军事常识。

进漳州城后，军团政治部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到漳州电影院，看了一次《唐伯虎点秋香》的无声电影（用字说明意思的）。我看后内心真高兴，回来就同连的干部吹了一顿。听我一说，他们就要求看，我把此事报告了师的政治部。军政治部宣传部给我十一师放一场露天电影，全师的指战员都看。趁此机会宣传队先演几个节目，然后才放电影。那天我没有去，部队由团值星员带去的，我团值星员不同意宣传队演出，若不马上放电影就要把队伍带回不看。军政治部宣传部主持者没有办法，只好不演节目，立即放电影并立即报告了罗瑞卿政委。罗政委把我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责备我说：“你三十三团骄傲什么？打了胜仗就了不起，有什么可骄，你要好好地整顿部队纪律。要纠正这种骄傲现象。”

进入漳州城，缴了敌人一辆小汽车（旅行车可乘五人），送给军团部去了。我们十一师师部驻在石码。一天师长政委来我团前沿观察厦门、泉州敌人的情况，就要了这辆小汽车坐到我们团部所在地角尾（角尾到石码约四十公里）。师长、政委察看后，叫我同他们乘坐这辆小汽车去师部开会。于是我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当时我心里是多么的愉快呵！

我常将三个“第一次”当作故事同战士们讲，当时是土包子开洋荤呵。

胜利回兵苏区 参加水口战役

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开辟闽南，极大地震惊了卖国反共的国民党头子蒋介石。他急忙将曾在上海抵抗日本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调至福建闽南，对付我军；又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进攻我苏区南部，并调集其中央军主力部队，准备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根据敌情变化，毛主席考虑：我军东征的战略目的已达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决定我军回兵苏区。六月初，我军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兵苏区，我们恰恰回到了我的家乡——才溪及其附近，集结了一周，准备打击广东军阀陈济棠。东路军的指挥机关住才溪，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到才溪。六月中旬在才溪的大坪岗上（现在的才溪中学），召开全军的誓师大会后，即向江西的寻乌、安远地区进发。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红军东路军到达目的地隐蔽集结，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我们回到江西苏区时，三军团部队在苏区北部的南城、宜黄、乐安和永丰一线钳制蒋介石的主力。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五军团的第十三军、十四军及地方部队打击向我苏区南部进攻之敌陈济棠。五军团的部队是国民党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部队编成的。因起义时间才半年多一点，还没有学到红军作战的一套战术，仍用他原来的战法，防御是他的特长，敌人攻不动他占领的阵地，但进攻敌人却只能击溃而不能歼敌。我们第四军赶到，协同五军团作战。水口战役中，我团是师的第一梯队，开进了五军团部队控制的阵地上，看见五军团队伍出击敌人时，一班一排的，把衣服脱下，捆在腰上，拿上大刀向前冲，与敌白刃格斗。这样敌人确被砍死很多，但自己部队的伤亡也很大。我们一军团加入战斗了，奉命向敌人反击。我团在敌人侧翼进入战斗，向敌猛冲，连夺敌人三个阵地，把敌人打垮了，可是

没有捉到几个俘虏，广东兵真能跑。我们副团长陈冬生同志，在这次战斗英勇地牺牲了。第二天，我全军出击时，敌人有计划地撤离了，退出了中央苏区。

水口战役结束后，我军开到于都、兴国、宁都地区整训。这次练兵的效果好，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二月，进攻我苏区之敌，分三路向广昌进攻，其主力在东路。西路的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气势汹汹地急进，迫近我军主力集中的地区。由于我军严密封锁消息，加之苏区的人民实行了坚壁清野，敌人无法得知我军的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我军的作战意图，因此敌人就盲目前进。

敌五十二师李明部，从宜黄出发经黄陂、东陂向广昌开进，路经大拢坪的森林地带时，天突然下起大雾，对面不见人，飞机不能飞，这种天气对我军作战十分有利。我一军团于二月十四日，隐蔽集结在大拢坪以东的森林内伏击敌人。因是山地，敌人只能一路纵队开进。敌尖兵连搜索前进时，我有意让其通过。待其师部到达大拢坪时，四军三个师同时出击，把敌人两头切断，拦腰猛打，一下打得敌人乱了起来，根本无法招架。我十一师是拦腰打敌人，直插大拢坪，把敌五十二师的指挥机关打垮，师长李明当场被打死，其余人员除死伤外全部被俘。这仗从十五日上午九时打起，十二时全歼。我一军团指挥部进到大拢坪，各部队正在集中缴获的战利品，处理清查俘虏官兵和搜集打散了的敌兵。部队集结起来了，待命继续战斗。

敌五十九师陈时骥部，也从宜黄向广昌进军，在五十二师的右边行动，遭到我三军团部队的猛攻，消灭其一部，大部被困于大王山。陈时骥想突围，但大雾弥漫，难以辨别方向。他的部队

被打乱，失去了战斗力，只得请求李明支援。他尚不知五十二师李明毙命，部队被歼，派了他身边可靠的亲信马弁送信至大拢坪，向李明求援。马弁把这个信送到我们军团司令部了。拆开一看，其信的内容写着：“李明兄：弟无能失利，被困于大王山无法突围，请求兄速援。”军团首长看信后，立即命令我们十一师消灭该敌。三十二团为前卫，前卫连化装敌人五十二师部队（把缴到五十二师的服装军帽穿戴了起来），让陈时骥派来送信的马弁前面带路。陈时骥久等马弁未回，援兵不到，就化装成司书只身逃走了。马弁便带我部队进到大王山地区。我仍协同三军团将敌五十九师全部消灭了。此时，陈时骥的马弁才知道他带的是红军，顿时吓呆了。我们战士说：“消灭五十九师，有你一份功劳，你也解放了，不要发呆嘛！”

陈时骥从大王山逃走之后，因大雾弥漫，辨别不出东南西北而停止行走。猛听着大拢坪附近，有无线电充电机的响声，以为是敌五十二师的电台，便摸到电台附近探头探脑地看。军团无线车队一个炊事员到小河挑水，忽然看见柴草里有人动，大声喊：“谁？出来，缴枪不杀。”放哨战士听到，立即跑去把陈时骥俘虏了，送到军团政治部。陈时骥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满脸麻子。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做了一顶纸高帽，准备第二天队伍向草台岗前进时，给他戴上让部队看，以鼓舞士气。陈时骥知道要给他戴高帽，于是写了信要求说：“我知大军要鼓舞部队士气，让我戴上高帽同贵军见面，但要求高帽改成长条，其形式不同，作用是一样。”军团政治部接受了他的要求，就改了一个长条挂在他身上。写的是：“活捉的白军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第二天我全军向草台岗行进时，军团政工人员给陈时骥挂上长条，要他站在路旁的高地上。战士们看着他的狼狈样高兴极了，有的说：“他喝了兵血才这样肥。”有的说：“呀！花机关

枪，麻子白军师长。”有的说：“你为什么不打日本，来打我红军？”我们政工人员说：“同志们！我们多打胜仗，多捉白军师长，坚决消灭进攻我们苏区的敌人！打倒蒋介石卖国贼！……”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昂。

我们一军团全军以两天的行程东进到南丰以南地区集结，协同三军团消灭国民党军，蒋介石之嫡系第十一师，本由陈诚兼任师长现调肖乾为师长，他率该师向广昌推进，已进至草台岗，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命令一、三军团全力歼灭该敌。草台岗歼灭蒋介石嫡系国民军十一师，是第四次反“围剿”的第二仗。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拂晓，双方进入战斗。该敌不愧为蒋介石嫡系，所谓“陈罗剿匪马到成功”，就指十一、十四师顽强。我团攻敌一个连控制的阵地，一连三次才占领敌阵地，并且伤亡很大。我一、三军团从拂晓开始，整整打了一天，直到黄昏才把敌全师歼灭，肖乾在战场毙命。这次战斗对国民党部队影响很大，蒋介石下令各路撤兵。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了。

八、模范红五团

调红大学习 红五团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全军集结在广昌、宁都及其以西的地区整训。这时，军团调我去红军大学学习。我高兴极了，立即把团里的工作交代给林发团长及政治处刘光宇同志。第二天，背上行李包袱出发，徒步行程三天到了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红军大学的校部，设在瑞金城内，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同志。他令我在红大上干队学习，并任上干队的支部书记。调到上干队学习的是师、团两级的干部。一起学习的有曹里怀、刘华香、袁得胜等。

学习的课程，军事上主要是研究营、团战术为主，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思想，还有军事技术和军事常识等课程；政治上学习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和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政治工作人员在各个方面，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等。那时我二十七岁，年纪轻，脑力好，学习成绩很突出，常常得到表扬。

前方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我学习还不到三个月时间，没有毕业，军委即电令调我回部队工作，任红五团政治委员，立即回前方到职。红大党委决定由刘华香同志兼任红大上干队支部书记。

王明路线统治党 红军进行大整编

一九三三年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了党的中央。毛主席的兵权被剥夺了，朱总司令也名存实亡，大权被苏联派来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篡夺。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者说：

“李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他有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富经验，能指挥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红军要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因此要进行正规化的整编。”红一方面军原来一、三、五、九军团的编制是小师、小团，教条主义者把地方游击队、赤卫军编入正规部队，扩为大师、大团，又将中央苏区的地方军，统一编为六、七、八军团。他们说：“现在中国革命是苏维埃道路，还是殖民地道路的两条道路决战的问题。红军的作战任务是要到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去打仗。要巩固、扩大苏区，就要消灭敌人在苏区门外，不让苏区丧失一寸土地。”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统治下，军的指挥机关撤销了。如红军一军团下属的三、四、十二军的军直属机关取消了，军团直接指挥师。如第一军团辖第一、二、三师。当时第一师师长罗炳辉、政委谭政，第二师师长

徐彦刚、政委胡亚林；第三师师长黄永胜、政委邓华。我们十一师编为第二师的五团（称为模范红五团）。吴高群同志任红五团的团长，我任政治委员。原来的小团没有营一级，团直接指挥五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现在的大团是设三个营，每个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师直属队设警通连、侦察连、迫击炮连，全团编制一千八百多人。这就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进行红军大整编，准备同武装到了牙齿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这完全违背毛主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指导思想，其结果就不可能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六月下旬，我从瑞金红军大学学习调回部队工作。一军团第二师驻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师长、政委见面时问了我在红大学习的情况，接着就交代了五团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整理训练做好编队后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派通讯员送我到五团。吴高群团长、张兴政治处主任及参谋、政工干部等热情地欢迎我，同时集合全团作了介绍，接着召开团党委会和全团排以上的干部大会，进一步推进整理训练部队工作。

原十一师刘亚楼政委，现当二师的政治部主任。七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他打了电话要我同吴高群团长去军团政治部开会。问我见过外国人没有？我说，打下龙岩时，见过印度人同美国佬看公园的。他说，这次见的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一个德国同志，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上校团长，斯大林同志派来帮助中国革命战争。我听他一说，内心特别兴奋，心想，今后更有胜利的把握了。我和团长吴高群同志骑上马，带上警卫员，直接到了头陂。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了会议，他首先欢迎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同志。他讲话时王智涛同志作翻译。我第一次听到把中国话翻成外国语，又把外国文翻成中国话，土包子听了觉得很希奇。李德这

个人个子大，红头发，蓝眼睛，大鼻子。李德先表示谢意，接着就讲军事问题。他说：红军要打到白区去，消灭敌人于苏区的门外。然后指手划脚地说保卫苏区的战略、战术是用构筑碉堡守备，以“短促突击”的战法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王志涛同志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听了莫名其妙，许多同志特别是军事指挥人员，你望着我，我看着你，不好表态。当时的军团长林彪讲话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过去我们也只会打游击战，现在我们要会打大规模的运动战，今后就要学会打正规的进攻战，同时也要会打正规的防御战。听他这样一看，认为有道理。回团时一路谈论，这是个新问题。

乌江歼敌八十师 五团参加运动大会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驻吉水之敌国民党军第八十师，突然前出到苏区边沿，占领我乌江镇。我地方部队新编第二十一军，正同敌人战斗着。军团首长命令二师迅速增援歼灭该敌。占领乌江镇之敌，因我地方部队打了两天啃他不动，就麻痹大意起来。我师增援上去了。敌人满不在乎，徐彦刚师长命令四、五团立即进入战斗，猛攻乌江镇，六团为第二梯队，我团接令后，以二个箭头同时攻入乌江镇敌人的师部，打死敌师长，缴长短枪千余支，无线电台一架，俘敌官兵二千余人，在三小时内战斗结束，全歼敌第八十师。我团缴获俘虏多，部队伤亡少，但错误地把俘虏的皮带、水壳、绑带没收了，军团聂荣臻政委严厉批评了我一顿。徐师长战前说：“你们五团打好这一仗，把武器装备好服装整齐的去参加‘八一’运动大会。”为此，我们就违犯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这是明知故犯的，我毫不推托责任，这时，徐彦刚师长已调，另有重用，陈光同志任我第二师师长。

一九三三年的“八一”，中央苏区红军，在一方面军政治部主

持下，召开了“八一”运动大会。周恩来总政委亲自指导，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址设在腾田、由各军团选派一个团参加运动大会。如一军团一师第二团、二师第五团（即我团）、五军团十三师第三十七团，三军团在北线南城、宜黄地区担任对抚州之敌警戒，没有选派团参加。这次大会规定的项目三十几个，军事上有行军、宿营、防空演习、投弹、刺杀、实弹射击、爬障碍物等；政治上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现场听营教导员、连指导员讲课和政治测验；文化上有青年战士演讲、唱歌、文化测验；体育上有单杠、双杠、赛跑、跳高、跳远等。运动会场上是三天时间，有许多项目是在运动会以前部队行军、宿营中演习的。方面军派了检查团，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在运动会前一周就随我团行动。他经常出题目考验我们，包括我们团的干部对部队管理教育、作战指挥、战时政治工作等测验，做得非常的认真、细致。

在授奖大会上，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讲话后，宣布我团是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的红五团。主持会的主席叫我到台前，接受模范红五团的团旗。我立即跑到台前向周总政委敬礼，从他手上接过红旗绕场一周，把团旗交给掌旗员举旗站在队前。接着颁发各项比赛的奖旗奖品，这大部分都为我团所得。全团指战员的情绪特别高昂。周恩来总政委说：“模范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但你们不能骄傲，要一直当模范，当到把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到中国革命战争最后胜利了，你们还要当模范。这就是我对你们红五团的赠言。”我团党委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光荣，但责任很重，必须兢兢业业把仗打好，各项工作做好，党委号召全团党团员、全体指战员贯彻始终，人人都不愧为模范红五团一员。

参加五次反“围剿”的红五团

九月上旬，上级命令吴高群同志到七军团任师长，提二营营

长朱瑞秋任团长。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法，向我中央苏区由北而南地推进，从抚州及其沿线出击，首先进占了我黎川。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命令我军恢复黎川，实行“拒敌于根据地之外作战”的诺言，坚决消灭敌人在敌占区。为此我全军主力向敌占区开进，去打黎川以北敌人的坚固阵地。我团开到白区攻打抚州东南的浒湾。战斗开始还顺利，一连攻占了敌人几个阵地，但攻敌主阵地时，工事坚固，守备顽强，火力封锁很严密，不易突破，加以敌从翼侧向我团出击，于是我团迅速退出了战斗。我团在敌占区打的第二仗是金溪之硝石战斗。敌之防御阵地非常坚固。打了一天一晚毫无进展，消耗伤亡不小。教条主义指挥者又命令再去攻打资溪敌人的坚固阵地。这仗是四、六两团打的，我团为二梯队，没有加入战斗。此仗不胜，我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地位。教条主义的指挥者不得不命令全军部队由敌占区转回到苏区的南城、南丰、宜黄、乐安、永丰一线构筑工事，转为防御。我团不分昼夜在阵地上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整整搞了一周，部队累得精疲力竭，真是“劳民伤财”。

工事、碉堡构筑好了，敌人也挺进到距我阵地前沿四、五百公尺处来了。敌人首先用德国的普伏式山炮、野炮摧毁我军构筑的阵地，接着就以重轻机枪、迫击炮猛烈射击，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冲击。敌人攻到我阵地前沿时，教条主义的指挥者，命令部队按照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法，部队即从敌侧方出击一下，这种战法有时可消灭敌人一个班、一个排，有时一个敌人也抓不住，而出击的部队被敌猛烈的火力杀伤，敌大部队乘势前进夺占我们防御阵地。这时我军只好撤离阵地，节节抗退的向后转移，选择新的阵地布防，再构筑工事防御，对抗进攻的敌人。这样的打法，直打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五团坚守大雄关 誓与阵地共存亡

一九三四年一月，红军主力被迫后退，转移到樟村、大雄关、新丰、冠山一线，构筑碉堡、防御工事守备，等待敌人进攻。大雄关地形险要，加以做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敌人一连攻了两天，没有攻上来，我们的口号是“与阵地共存亡”。第三天敌人增强兵力、火力插入大雄关的南侧，猛攻我团的指挥阵地。朱瑞秋团长负重伤，张兴政治处主任中弹牺牲，剩下仅我和总支部书记王集成同志二人在前线指挥。其樟村、新丰防御的友军已撤退，于是我团也奉命撤出大雄关向南转移。这时师长、政委派了师的作战科长熊伯涛同志来代理团长。我团开到广昌以北之甘竹，一面整顿部队，一面构筑工事、碉堡。敌人攻击高胡脑时，三军团部队以侧翼向敌出击，歼灭进攻的敌人约一团兵力，这时我一军团政治部提出：学习三军团部高胡脑的防御战经验，以消灭进攻我苏区的敌人。

敌人以堡垒主义的战法，步步向我苏区推进。一九三四年二月，已进占樟村、大雄关、冠山一线，并继续向南推进。我一军团部队，转移到广昌以北的傅坊、甘竹、石马、水南线。到达上述地区，仍以单纯防御的挨打战法，拼命地构筑工事、碉堡等待敌人的进攻。我团是在甘竹的丘林地带防御工事，把山头底下挖空，上面砍大松木头架起，部队守备就在木头架起的工事内以待敌人来攻。敌人仍用德国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猛轰。真惨，我二营五连一排，配属重机枪班、全被埋压在工事内，一个也没有出来。苏区缩小，部队伤亡完全是错误的战略指导造成的。这时熊伯涛同志调回师作战科，军团命令调陈正湘同志（一团一营长）任我团副团长，代理团长。

广昌的大会战 新桥侧击敌人

教条主义的指导者决心进行广昌大会战，即与敌决一死战。把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隐蔽集结于长桥、洛口、新安和广昌城郊。李德直接在前线指挥。我团的任务是担任掩护全军集中迟阻敌人前进，从甘竹起，与进攻之敌接触。敌人步步推进，我团节节抗退，一连打了五天，敌才进占广昌城及东西线。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李德命令方面军主力向敌人反击。整整打了二天二晚，根本没有打出个名堂，弹药消耗很多，部队伤亡很大。我团代理团长陈正湘同志负重伤不能继续指挥作战，军团又派曾桂同志来当团长。因为减员数目大，把地方部队一个小团补充给我团。刚刚整编好，不到十天时间，没有整训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急急忙忙又要参加战斗。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敌人进占广昌后，继续向宁都推进。我团隐蔽集结在敌人推进的右侧。根据师首长命令，我团进到新桥以东地区，我团从敌侧翼出击。因刚刚补充到各连的战士，不敢向敌冲锋，急得新到职的曾桂团长怒气冲冲的。曾桂团长先身士卒的向前冲，勇敢杀敌，用大刀砍死十余个敌人，结果中弹牺牲了。我亲自指挥部队侧击敌人，不到一小时，腰部负伤。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退出战斗，向福建建宁地区转移，离敌稍远点，休整一下再作战。我腰部负伤不重，没有住医院，因团的领导仅剩下总支部书记王集成同志，我不能离开部队，只好坐上担架随部队行动。还好，到四月中旬，我的伤痊愈了，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时上级一时调不来团长，就命令我兼任团长职务。

建宁战斗失利受党内严重警告

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蒋介石的嫡系两个师，配合福建军阀

部队刘和鼎，向我建宁城进攻。我二师奉命控制建宁以西的猪麻寨阵地。四、六两团在猪麻寨及周围地区隐蔽集结、构筑工事坚守防御。我团奉师首长命令前出猪麻寨四五华里的森林地带，选择了防御阵地，构筑坚固工事。这时军团派来一个副团长，但还未到团就被敌机炸伤，送去住医院了。

在我团阵地的正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六个团的兵力，与我对峙了七天，仅有前哨小部队接触，经常不断地向我阵地打冷炮。第六天，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来我团各营的阵地察看，我团左侧是地方第二十一师，战斗力弱，若敌向它进攻，是无力顶住的，这样敌人易于插到我团侧后；右侧仅有师侦察连，力量太单薄，若敌进攻也无法抵抗，特别是森林地带敌很易隐蔽到我团后面包围我们。陈光师长说：这个情况我们已考虑到，若敌进攻时，只要你团能守住阵地，四、六两团向敌出击，即可大量消灭进攻的敌人。你团守住阵地是消灭敌人的关键所在。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晚，我团三营八连的连长，是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他叛变投敌，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师长指示，立即作战斗准备，估计敌人可能向我进攻。果然十九日上午八点，一营营长报告敌向地方部队攻击，我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抵抗，把部队撤走了，敌人正向我团前进。一会儿师侦察连指导员亲自跑来报告我说：敌以两路向猪麻寨方向前进，另一路向我们阵地攻击前进。到九点时，敌人炮火猛烈地向我团阵地轰炸，四架战斗机飞得非常低向我扫射，我命令各营坚决守住阵地。到十点，敌人正面都没有向我团阵地攻击，师指挥所的电话不通了，回头一看，敌人快要攻上猪麻寨了，四团、六团和师指挥所已撤走，我团被敌紧紧地包围了。我命令一营抗击正面进攻之敌，二营、三营和团特务连组织敢死队，向敌人猛冲，打开一条路突围，尔后交替掩护，一营撤出阵地。我自己前头指挥冲击，总支

部书记王集成大声的喊：“同志们！在战斗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呀！我们是模范的红五团指战员，在战场上牺牲最光荣，逃跑最可耻！勇敢地冲呀！”战斗十分紧张，一连一连的交替掩护。伤亡虽大，可是很有次序的冲出了敌包围。敌人占领了猪麻寨，停止前进了。我团退到建宁城郊时，接师部参谋来传达师首长命令，部队向江西石城转移，令我团在后卫掩护。我们当晚离开建宁城。四月二十日转到江西地界。继续向石城撤。部队开到石城时，就派赵云龙同志来接任我的职务。朱瑞秋同志的伤愈了，回五团当团长。我因部队损失很大，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处分于一九四二年，反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我在一二九师工作，向师党委打了报告，经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党委会讨论，批准取消了我的处分），在行政上没有给我处分，即调任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后来派我去崇岗区担任二师的扩红突击队队长。

崇

五次围剿未粉碎 王明路线所造成

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粉碎，完全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王明路线所造成。第一阶段是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者提出拒敌于根据地之外，“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即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说不让敌人进入苏区打烂坛坛罐罐，其结果是坛坛罐罐全被打光，整个中央苏区根据地完全丢掉。第二阶段是保守主义。教条主义者说：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散防御，从事短促突击。敌人向我中央苏区进攻是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战法，用以对付我军节节抵抗的战术。第三阶段是逃跑主义。教条主义的指挥弄得红军不可收拾，中央苏区无法立足，临到退却逃跑时，才不得不又请毛主席出来领导，指挥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作大战略转移，

造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九、红一军团侦察科

到军团司令部 见左权参谋长

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旬，军团首长命令我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侦察工作是一种战斗技术工作，是首长的耳目，指挥员的正确决心是来源于准确的侦察。想到这里，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能力有限，内心顾虑重重。但既然命令已下，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吧！第二天背上行李到军团司令部去报到。

左权同志是我们军团参谋长，那时只有二十五、六岁，长方脸，个子不高，穿一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一双半新不旧的粗布鞋，显得严肃朴实。他见我来到，叫我坐下，叫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侦察任务重要，我们侦察部队很多，经常分散接敌侦察敌情，有时又要集中指挥使用，以迷惑、钳制和麻痹敌人，所以我们军团司令部必须成立侦察科。刘忠同志，你当团政委很长的时间，又兼过团长，政治上可靠，打仗很勇敢，我相信你能够完成军团首长给你的侦察任务，当好侦察科长。”说完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坚决执行命令。在参谋长直接领导下，努力学习，边学边干。但因文化程度低，参谋业务不熟悉，要参谋长经常指教。”左参谋长叫王礼管理科长来，给我派一个警卫员，配一匹马，又叫陈士渠教育科长给我找侦察工作有关书籍。并责成他帮助我建立好侦察科，还叫聂鹤亭作战科长把原属作战科管的侦察资料和侦察参谋人员及便衣侦察队等，交给我接收，作为成立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的基础。

从作战科调来侦察参谋毛孝清、苏孝顺和李廷赞同志。军团

司令部的便衣侦察队三十多人交给我们科，这些侦察员经过挑选，政治质量好，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本领。我们侦察科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整理综合敌情材料报告军团首长，通报全军，测绘作战要图，找向导带路，调查行军路线，捕捉俘虏，讯问俘虏了解敌人的行动企图，指挥军团的侦察部队集中行动作战役侦察，有时佯动，有时深入敌后迷惑与钳制敌人等。军团的各师设有侦察连，每个步兵设有侦察排，担任师、团的直接侦察任务。但有时军团侦察科集中指挥各师、团侦察部队，以掩护我全军主力的行动。

我首先学习侦察手册和各种资料。左权参谋长指示我：根据侦察了解的敌情，除经常向军团首长当面汇报外，每半个月印发出一次敌情综合的文字通报。另外，根据不同的情况应有计划的不定期的发出专题的敌情通报。我文化水平低，头一次起草敌情通报时，不知从何写起，费了很大的劲，总算写出个不象样的稿子来。左参谋长看后，在我起草的稿上，改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小字，全篇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没有改掉，着通讯员送还给我。参谋长真耐心，办事认真、细致，我又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按左参谋长的规定，我还是每半个月写一个综合的敌情通报稿子，给左参谋长审阅、修改。一次又一次的写，渐渐地也就摸到了门路，左参谋长的修改，也就渐渐地减少了。一天，左参谋长对我说：“刘忠同志，你进步了，现在你写的敌情综合通报，不要更多的修改了，你第一次写的稿子还在吗？自己拿来对照看看，对比一下，就知道自己大有进步了。”说完，他高兴的笑了。

温方战斗侦察 领取长征路线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旬，进占福建建宁之敌，已南下宁化、清流向长汀前进。左权参谋长令我率军团便衣侦察队和二师侦察连，带电台一部，立即出发摸清敌人行动情况。我率队经长汀向

宁化、清流方向前进，深入敌纵深去侦察。进到温方附近捕捉到一名俘虏，查明了敌人先头一个旅进占温方，后续部队尚在清流未行动。我立即将此情况，以电台联络报告了军团首长。七月十四日，军团各师部队隐蔽接近温方，十五日拂晓，配合福建地方部队发起温方战斗，采取四面包围敌人的战法，不到三个小时，全歼敌二个团。第三天，我一军团部队隐蔽地转移到长汀以西地区，集结休整待命。我回到军团司令部，左参谋长表扬了我，鼓励我继续努力，准备担负更加繁重的侦察任务。

一九三四年七月下旬，军团首长命令我同军团保卫局谢志群侦察部长，率军团便衣队和保卫局的便衣班，去方面军司令部接受长征行军路线图和行动方案。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找我和谢志群同志作当面交代：“交给你们两个同志的军事要图是绝对保密的，沿途要特别谨慎小心。回到军团部亲自交给军团首长，这是革命战争胜负的关键，千万不可粗心大意。”我和谢志群同志保证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遵照首长指示，在任何情况下不丢失，人在图在，坚决执行总参谋长指示。”我们转回部队时，军团部队已从福建长汀向江西于都地区转移了。八月的上旬，我回到军团司令部，把长征路线军事要图亲自交给了左权参谋长。

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我奉军团首长命令率军团的各师、团侦察部队附迫击炮排、工兵班和电台北上，深入敌占区，钳制、迷惑敌人，使敌迟缓时间向兴国、瑞金、于都等苏区根据地进攻。经过几天军事训练、政治动员，于八月下旬出发，深入敌占区，经高兴圩、老营盘，富田、水南等地，直向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敌占区游击活动。上述地区都是苏区的根据地，群众

看到红军回来非常高兴，立即向我们报告敌人活动的情况，赤卫队配合我们去袭击敌人的碉堡。近一个月里，我们袭击了敌人少数碉堡，夺取了敌人一些运输物资，从俘虏的敌人交通人员口中讯问了敌情，延迟了敌人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县进攻的时间。这些工作使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作了准备。

渡 赣 江 侦 察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我所率的全军团侦察部队，奉命回到兴国地区休整并准备接受新的侦察任务。我向军团首长汇报在敌占区活动的战斗和工作情况。首长听后表示满意。命我所率的侦察部队于十月上旬进到赣南，渡过赣江，在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之间的地区侦察活动。任务是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堡垒构筑情况，并弄清这一带的地形、路线，绘制成略图，于十月十日前，准时送军团司令部。此任务是左权参谋长亲自授意的，他说，这次侦察部队的行动，比上次活动更加重要。我内心明白，这是大的战略转移的侦察。

我回到龙口镇，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行动准备工作。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兵分两路，在信丰县的南北插入，分别执行侦察的任务是：一师侦察连负责南雄，二师侦察连负责崇义，十五师（少共国际师）的侦察连和各团侦察排，我自己直接指挥，弄清南康、信丰的敌情、地形，并令第六团侦察排接近赣州方向侦察活动。我的指挥所和联络点在油山。各连、排和军团便衣队所侦得的情况，于十月七日前送到指挥所汇集整理，以求能速报军团左权参谋长。

在苏区人民的掩护下，侦察部队把所需了解的敌情、地形、路线均按时弄清楚了。我派侦察参谋毛孝清同志于九日率三个便衣队员直送军团司令部并向左权参谋长作当面汇报。十月十日毛

孝清同志回来对我说，左参谋长要我十三日亲自到信丰以东的繁田村，当面报告所侦得的情况。侦察部队转到韩坊、古陂、安西一带活动，向当面的敌人保持接触。我按照左参谋长指示作布置执行。左参谋长面示我：“十四日拂晓，一师侦察连占领古陂、安西敌阵地，作火力侦察；二师侦察连向占领韩坊阵地之敌作二火力侦察，以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各团侦察排待部队到后归建，此任务妥善安排完后，你即回军团司令部”。

进占城口镇 控制九峰山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黄昏前，第一军团在信丰县南北，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一师为左翼，攻占敌古陂阵地后，直插信丰以南之正坪，向南雄方向前进，佯攻南雄，二师为右翼，攻占敌韩坊阵地后，直插新城，向崇义方向前进，军团直属队与十五师，在二师的后面跟进。占我信丰之敌是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我军一进攻他就退到南雄；占我崇义之敌是国民党江西的保安团，我军一进攻即向赣州逃去。我红一方面军连夜急行军西进，渡过赣江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左权参谋长令我率军团便衣队和保卫局的便衣侦察班，化装国民党部队，迅速占领城口镇，控制九峰山，以掩护全方面军通过粤、汉铁路。这是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个时候，“围剿”我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发现我军向西突围，因此调动频繁，加强粤、汉铁路沿线的守备，并利用铁路交通运兵，妄图堵击我军西进。我军日夜兼程向西挺进，敌人没有来得及堵击，顺利越过粤、汉铁路，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我奉左参谋长命令，化装成国民党部队进到城口镇。当地的人民很平静，商店照常营业，不知道我军的行动。到饭店吃饭后，继续前进占领乐昌县以东的九峰山时，还没有敌人控制九峰山，这座大山非常重要。我控制后，立即绘制了略图派参谋送给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指示坚决控制九峰山，以掩护全方面军通过粤、汉铁路。若被敌人切断，即要我率未通过铁路的部队设法绕道通过铁路，向全州方向渡过湘江。我们在九峰山蹲了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出现。但我们的部队却走得疲劳不堪，恰恰又下大雨，黄泥路滑得不能走，不时摔跤，一个个象泥猴一般，简直不象个军队的样子。

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左参谋长说：“你带领化装成国民党军的部队，走在全军前面，经兰山、道县，相机占领各个县城，并查清湘江各个渡口的情况和全州、桂林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以便全军渡过湘江。”在敌占区，化装成国民党部队，沿途行军都非常顺利。我们进兰山县城，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县长带县政府的官员和民团都跑了，老百姓也有点恐慌情绪。我们伪装国民党军队说话：“众百姓不要慌，朱毛红军还很远，我们中央军很快就会开来保护你们。……”群众听了有的信，有的半信半疑，更多群众怕国民党军队来。既派粮、捐款，又抓兵、拉伕怎么受得了呵！我把兰山县情况，告诉了前卫部队，“兰山无敌，迅速前进”。前卫部队快进到兰山县时，我们假装害怕的样子，立即向道县前进。兰山到道县，是两天的行程，因左参谋长交代要迅速查明全州、桂林和湘江沿线的守敌，所以拼命向前赶路。我们到达道县时，国民党的县长和民团都没有走，还出城来迎接。县长说：欢迎官长、弟兄们到县府。我们进城去，就把县长和民团团总扣起来了。一会前卫部队到，把民团的枪支缴了。军团司令部到达道县，军团长、政委令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二师的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令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用李棠萼参谋长所带的电台向军团首长报告。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黄昏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

渡过赣江，通过粤、汉铁路，突破敌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基本上都顺利。但部队庞大笨重，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因而走不动、跑不快。一三军团前面开路，五、九军团后面掩护，八军团随中央机关殿后。全军进到湖南的道县时，已到十一月的中旬了。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发觉我军向西作战大转移，就迅速调其嫡系部队几十万大兵，前堵后追，两面侧击，我军面对强敌，打得很艰苦。

渡湘江后的全州战斗

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全军抢渡湘江。我奉左参谋长的命令，率五团的侦察排和军团便衣队，插到全州北，钳制敌主力。插入敌纵深，与敌单独作战，被敌包围，五天后才突出重围归建。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在五团的先头出发。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直到全州城附近侦察。二十一日上午，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这时，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未渡湘江。我向他面告：全州城无国民党正规军，建议五团速渡湘江，进占全州城。李棠萼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批准才过湘江，占全州。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他不同意，于是立即电告军团。军团首长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回电，令立即“渡过湘江，进占全州”。我率的侦察部队已过湘江，李棠萼参谋长命我进全州城，他率五团渡湘江跟进。我率侦察队迅速前进，下午四时到全州城郊，结果失去时机了，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全军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我必须控制有利的地形和插入敌纵深钳制敌人。我立即率侦察部队绕道插到全州北以钳制敌人，五团占领阵地，监视全州正面之敌。当时，情况

十分紧急，国民党中央军大部队已陆续向全州推进，广西国民党军队从桂林北进，直向全州夹击我军。天上有大批的飞机轰炸、扫射。经过一天紧张战斗，到晚上全军基本过了湘江，但后面担任掩护的部队就无法再渡，在湘江以东战斗，最后一部被敌打散，一部被敌歼灭。

我一方面军掩护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然后迅速西进，通过湖南苗族自治区的油炸坪，向贵州前进。国民党军队，紧随我军尾追，把西山的几个重要隘口都堵住了。我率军团便衣队和五团侦察排，二十一日晚上，隐蔽向全州以西的才湾前进，再向全州北插。当晚进至庙头。二十二日，在庙头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天钳制敌人，二十三日返回全州以西的资源附近受敌人包围了一天，派出便衣化装夺占了梧桐要隘口子。二十四日晚通过隘口后，连夜向西急走脱离了敌人，二十五日，追上了我军后卫部队，直到二十七日才回到军团司令部。左权参谋长一见我非常高兴说：“刘忠同志回来了，真不简单，我们以为被敌人吃掉了。”我向左参谋长汇报被敌包围和突围的情况。左参谋长说：“若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但因蒋介石的大兵已到全州地区，广西军从桂林北进，加以我军的长途行军作战，疲倦不堪。这是主要原因，不能归罪李棠萼同志个人。现全军主力基本上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是中央和军委指挥机关都很安全，这是最大的胜利。我军长征的第一阶段，证明王明路线彻底破产。”

我得到左参谋长面示，随军团司令部行军西进到贵州的黎平县。军团司令部在县衙内，休息了一天，这正是一九三五年的元旦。好不容易的在长征途中过个好年。一进贵州各军团均占领了些县城。如从江、锦屏、兰田等县均为我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占了。贵州王家烈的部队不敢对抗，一打即溃，一触即跑，真是个

豆腐军。

袭占施秉 强渡乌江

在黎平过元旦后，全军向遵义开进。首先必须抢渡乌江。但乌江东岸剑阁、施秉、黄平和余庆等县城有王家烈的部队守备。贵州的路是乱石、黄泥路。那几天又下着毛毛雨，更加难走。我率军团便衣队走在部队的前面，每天都走一百二、三十里，一连走了四天，通过剑阁，到施秉以东三十里的一个村庄宿营。我刚躺下想休息一下，通讯员就来叫。我跟着通讯员到了左参谋长那里，左参谋长命令道：“你率侦察部队连夜出发，占领东山，查清施秉敌情速报。并相机占领施秉城。”我说部队很疲劳，可否休息二小时出发。左参谋长很严肃地说：“不行，马上出发。这有关全军行动。抢渡乌江，进占遵义，只好辛苦你们，回去立即出发。”

天黑得伸手不见掌，雨又不停地着，路十分难走，但夜行军不许发出光亮，只得摸着前进。我们从晚上八点出发，摸到午夜二点半，才到施秉城的东山。此山住有两家老百姓，老乡说：“施秉城是王家烈的一个营，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打不得仗的。”我将情况报告了左参谋长，趁天没亮立即出发摸到施秉城边，夺占了敌人的前哨，敌人没预料到我军突然袭击，听到枪声就乱成一团，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天快要亮时，敌人向乌江方向逃走了。这次夜袭施秉城的胜利，保证了我军向乌江迅速进军。

部队继续向乌江前进，二师第四团是前卫团。我率军团便衣队走在四团的前面，经过紫荆关时，余庆县境敌人都跑过乌江了，一直到乌江东岸，发现敌人在乌江西岸守备。乌江地形很险要，对岸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渡船都被敌沉于西岸，过不

去怎么办呢？我向左参谋长报告了这种情况。一会，二师师长、政委和军团的首长都到岸边来了。他们详细看察了对岸敌人的设防和江内水的流速情况，决定令四团强渡，动员部队和军团工兵连迅速扎竹排架浮桥。恰好乌江东岸龙溪一带有个竹林。人多手快，很快就扎起了竹排。军团工兵连负责架浮桥，工兵带的钢丝扭成钢绳。竹排扎好了开始架浮桥时，二师组织全师的机关枪火力，军团也把平射炮调到江岸掩护四团强渡。四团组织了水手排，由第二连连长毛振华指挥，泅水先偷渡过去。直到了敌人的碉堡附近，还没被敌发觉。二连长毛振华按规定发出了信号，二师长见后，令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同志向敌发起火力袭击，以掩护二连长率的水手排冲锋，夺占敌人的阵地。二连长派人找了一只船迅速摆渡过来，渡过四团的第一营去占领阵地，掩护架桥。并向遵义方向前进，控制了团溪、茅坪。

浮桥整整架了一天半。红四团过去后，二师和一师部队先后过了桥，向遵义前进。王家烈守遵义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跑了。我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第一次进占遵义城。蒋介石估计我军要与二方面军会合，把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调到湘西的藏江，洪江地区设防。乘此间隙，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我军在遵义城及其附近休整了十一天，后来敌人发觉我军不与二方面军会合，才令薛、周两纵队开进贵州，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督战。

我们侦察科在休整期间，总结了长征三个多月以来的侦察经验，研究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特点，以利于下一步顺利完成侦察任务。王家烈部队有三个特点：第一、官兵大都抽大烟，打仗时组织敢死队，赏给大烟土，要士兵给他卖命当炮灰，第二、当官的都是他的家族子弟、亲戚朋友。什么大侄子、小舅子等用作亲信。当兵的都是抓来的穷老百姓，所以不愿为他卖命。第三、全

省的长途电线都可窃听电话，这是我们到了遵义后才发现的。一天，便衣侦察员李兴才，到电话队拿了一个听筒，五米电话线，爬上电杆，接上电线，用一根铁丝插到土内，拿起听筒一听，正好有人讲话。于是他赶快跑来告诉我。我跑去一听，是敌人在互相说我家的情况。我立即告知各师的侦察参谋，注意窃听敌人的电话。在贵州活动的几个月，这种办法起到了很好的侦察效果，准确地了解到敌人的行动意图。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从遵义出发向桐梓前进，准备从泸州、宜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查明了王家烈有一个师在桐梓。我率便衣侦察队到娄山关脚下时，叫侦察员安上电话窃听敌情。娄山关有二个险要隘口，王家烈部队一个团守一个。开始我家接近未攻时，听他们互相在电话上联系很镇静，都表示很有把握扼守。一边说，共军部队接近到阵地前沿不敢攻。另一边说，我的阵地前沿也发现共军，没有向我攻击。双方都说要加强联系，互相支持，坚决死守。这时军团首长也亲自听着敌人电话上的讲话。于是命令二师组织火力猛攻主要隘口。攻了一阵就听不到他们在电话上联系了。另一个隘口的敌人我们未攻他，老在电话上“喂喂”的叫喊，电话打不通就动摇起来。军团首长命令一师攻击该隘口，稍微一打敌人就跑了。我一、二师占领娄山关隘口，迅速向桐梓攻击前进。桐梓之敌因娄山关失守，一枪未放就跑了，我家胜利占领了桐梓城。

二进遵义城 斩敌二万余

我家占领桐梓后，左权参谋长令我率便衣队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向长江方向前进，侦察泸州、宜宾一线的敌情和长江以北是否到有我四方面军的部队。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渡过赤水河进到泸州以南的纳溪，把长江北岸的情况调查清了。查明国民党

军阀潘文华率领三十六个团兵力，于一月中旬沿长江北岸修筑工事，在长江的北面没有我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长江以南地区有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师长郭勋奇已占松坎，土城一线构筑碉堡、工事以防我军北渡长江。这时，部队主力已到习水县，过了赤水河，进到叙永、古兰一带。一月二十八日，我一军团由古兰转到土城，攻打川军刘湘的模范师，这仗整整打了一天没有打好。撤出战斗回头又东渡赤水河，经过三台又撤回桐梓。川军模范师在后尾追，因而我军改变行动计划西出威信，在云南边境一带活动了十几天，将川军模范师甩得远远，然后折回桐梓，再次攻占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我军第二次进遵义城。

遵义城，有老城和新城，相隔不到半里。我三军团一举攻下了老城，但新城还是王家烈的部队守着，他们依托城墙和构筑的工事顽抗。三月五日，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从贵阳出发闯过乌江，急急地赶来，企图拦击围歼我军于遵义並解救守敌之围。敌人的来势非常凶猛，一个纵队直攻紧靠老城的插旗山。我三军团一边监视据守在新城内的敌人，一边同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陈赓、宋任穷同志率领的红军学校干部团也参加了战斗。

我们一军团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出动，沿着遵义城东南的山脚，迅速绕到敌侧翼一个山梁的森林内，隐蔽集结待机，准备出击来犯的薛岳另一个纵队。我随着军团首长在军团前面的指挥所，观察着敌人拼命向我三军团控制的插旗山攻击。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万分严重呵！被包围在新城的敌人，看援兵一到突然活跃起来，薛岳的一个纵队，攻占了插旗山的好几个山头，快接近制高点，十几架敌机擦着山头轮番轰炸、扫射，以掩护其步兵攻夺插旗山，进占遵义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都在遵义城郊，三军团部队正在与敌浴血抗击，陈赓宋任穷同志的干部团也使用上去了，若是他们抗击不利或守新城的敌人出来夹击的

话，多么危险呵！敌人猛扑插旗山，城内城外的炮火响成一片，三军团部队控制的阵地岌岌可危，我急得非说话不可了，跑到军团长跟前建议：“把我一、二师调转头，越过公路，从敌侧后冲击，三军团部队正面反击，即可歼灭进攻之敌。”军团长说：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的后续部队，你速去传达命令，告诉一师二师首长，敌二梯队正向前面山上运动，趁敌立足未稳，向正运动之敌，进行猛烈的攻击。”我一听军团长说完，飞快地往前跑，先找着一师李聚奎师长，接着找到二师刘亚楼政委，传达了军团长命令，他们遵照军团长命令立即指挥部队向正面敌人猛烈攻击。我一、二师的红色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冲击力量，向迎面敌人猛攻，敌人来不及对抗后撤了。就在几分几秒的时间里，整个战况突然起了变化，敌人的飞机，敌人的炮火，敌人的战斗部署全部陷于混乱的状态，这下我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了，向前面看，我一军团部队势如破竹般的向正面之敌攻击，向侧后看，攻我三军团之敌溃败下来乱如黄蜂。这时我心想如果照我的建议打，可能真有危险，现在的战况骤然变得使我全军转危为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薛岳、周浑元两纵队打败了。

一会儿，军团首长到前面来了，军团长问我前面一、二师的战况后，在白纸本上撕下两片纸，用红兰铅笔画了二个红尖头，标示出一、二师的符号，又画了一条兰横线显示乌江，再画一条红直线当作公路，然后写一“追”字，还指出各师向西的集合地点，最后令两名通讯员尽快送给一、二师首长。各师遵照命令向敌猛追，只听部队里到处喊着：“追呀！猛追呀！不顾一切疲劳，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呀！”我红色战士忘记饥饿，忘记疲劳，忘记黑夜的降临，一鼓作气追到乌江边。敌薛岳、周浑元纵队，被追得东奔西窜，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有的葬身于乌江内，我军完全胜利了。击溃和消灭薛岳、周浑元纵队二十个

团。这是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这是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

四渡赤水 再渡乌江

我军击溃歼灭敌薛岳、周浑元纵队后，迅速转向遵义西南的碧溪、枫香坝、白腊坎集中。十几架敌机来回寻找我军动向。为把蒋介石主力调到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英明指挥下，我军两路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三渡赤水，一路经茅台渡赤水向宜宾方向前进；一路经鲁班场渡赤水向云南的威信、盐津方向前进。蒋介石估计我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指挥所有部队向该地区前进，昆明龙云的部队也向威信、盐津调动。妄图在赤水河西合围歼灭我军。敌人真听调动，把敌调到该地区了，而我军于三月二十二日，静悄悄的四渡赤水，回到金沙、安顺的乌江北岸，在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在息烽以西的九庄，再渡乌江。

此时，把蒋介石各路部队调到了长江以南岸江北岸，我军再渡乌江占领了贵阳以北的息烽、修文两县城，扬言攻取贵阳。蒋介石还在贵阳坐镇，吓得他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我全军在贵阳以东的龙里县穿过，经平坝、安顺、龙场，到云南地区，占领云南的宣威、会泽等县城。我军大部队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进到金沙江东岸。我先遣队找到渡船和船夫，偷渡过江控制了绞车渡的两岸渡口。前卫团进到江岸，搜集到了七只渡船，请了当地的船夫摆渡。我全军指战员就用这七只渡船，花了五昼夜的时间，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我们把所有敌人都甩得很远很远了。

在全军渡金沙江之前，部队进到宣威时，左权参谋长命令

我率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向昆明佯攻。以钳制、迷惑敌人，掩护全军渡过金沙江。我率的侦察部队是最后才渡金沙江的。过江后，上级命令我把七只渡船全都沉于西岸的河底。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向四川会理县前进，在城郊回到军团司令部，一师侦察连归建了，我红色指战员歌唱着：“金沙江的流水哗啦响，常胜的红军胜利渡过江。蒋介石统治的四川军阀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弄得没有主张。”我全军指战员，唱着胜利歌，迈着英勇步伐向着大渡河奋勇前进！

奇袭小相岭 进占越西城

胜利渡过金沙江后，我军占领了四川的宁南、德昌。中央军委即令一部兵力佯攻西昌，其主力迅速北进，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这是长征途中重要的一关。国民党反动派说：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妄想歼灭我军于大渡河南岸。我们一进到德昌，就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去接受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以五团第三营，二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右路纵队，左权参谋长为纵队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为政委，先行出发，经越西城、晒经关，抢占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我军积极准备渡河材料，并佯言我军要进攻雅安，以钳制、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防御之敌。我军大部队为左路纵队，以刘伯承总参谋长为先遣纵队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经冕宁县直向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前进。上级令第一团担任抢夺船只在安顺场抢渡的任务。第四团随一师跟进，一团到安顺场时，四团迅速沿大渡河南岸急进，抢夺泸定桥。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三、五、九军团均随四团后，在泸定桥通过铁索桥，渡过大渡河。

我率军团便衣侦察队，随左权参谋长行动，走在部队的最前

面，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进到泸沽。从此到越西，必须经过小相岭的险要隘口，我部队进到距此二十华里的小村庄内宿营。我们找当地群众问路、带路，开始怎么说都不肯，经做大量宣传后，老乡们才说：小相岭过不去，路被四川军挖断了，並树起吊桥，那边有一排兵守着。我同老乡谈了很久，又送他大烟土，他就说：“我是采药的，如果这位长官带少数人随我翻山绕到小相岭后面，把川军打掉，放下吊桥，那大军就能通过了。”我立即向左参谋长、刘政委汇报，并要求完成此任务。左参谋长刘政委同意了，并指示：“要隐蔽、沉着、机智、勇敢”。

五月十八日拂晓，我令便衣侦察副队长范昌标，率第一班十人，由老乡带着翻山钻沟，攀登峭壁，于上午十一时绕到从越西到小相岭的大路上。老乡指明了敌排哨位置。部队隐蔽起来，范昌标副队长来到前面，看清敌人未发觉我们，正在哨棚内打牌，仅有一个哨兵守着吊桥。我命令立即行动，范昌标一马当先指挥二个战士捕捉守桥哨兵，班长陈胜忠带队冲进敌哨棚，喊道：“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先缴枪支，后捉俘虏，叫敌排长放下吊桥。这时，越西打来电话，我没让他接，怕暴露我军行动。越西城的守敌是刘文辉的一个营，因哨棚未接电话，就放弃越西城，通过彝民区向富林逃去。越西县长和机关人员都随着走了，小相岭俘虏的敌排长被我争取过来了。我选了十名战士穿起国民党军队服装插入该排内，准备下一步夺隘口时用。

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率部队从吊桥上通过，到了小相岭。我们立即向越西城前进，于下午二时进占了越西城。越西人民群众对红军不害怕，表示欢迎，有的还拿着“欢迎红军”的纸旗子，商店照常营业。我率便衣侦察队一进城就到县衙，彝务科还有人看管。我问彝务科长，为什么不走？他说：“我在管犯人，因关在监狱内的都是野人，不能离开。”我叫他带我去看

看，他着人带我到监牢门口，一看里面关着六百多彝民，扣上铁脚圈子，他们讲的土话我不懂，里面会讲汉话的就说，他们是彝族兄弟，因受大汉族压迫是轮流派来坐监狱作抵押的。这些彝人没有穿衣服，仅有一块遮羞，有的背上披着一块布，头上扎了黑布巾，胡子、头发长得很长，一双眼睛又圆又大。我们看后即报告左参谋长、刘政委。左参谋长说，他们是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我们要解放他们。于是叫了彝务科长来，问他：为什么关押彝民？他说这些人放出来会杀害汉人。左参谋长说：“我到你县衙去，叫他们选派代表出来，我接见他”。我同左参谋长到了县衙，左参谋长对彝民代表讲：“我们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各民族平等，工农红军是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的，是来解放你们的。请你们告诉彝族兄弟，红军释放你们，仅遵守一条，汉族、彝族的穷人都是阶级兄弟，都是民族兄弟，都是受压迫的劳苦人民。要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压迫你们的大汉族主义。你们看好吗？”代表满口答应说：“彝族人民坚决拥护这个主张，若释放我们，一定照办。”下午四时彝务科开牢门释放了他们。他们把铁脚圈打开，一窝蜂而出，兴高彩烈地跑回了他们的家乡。

通过彝民区 夺占晒经关

因抢渡大渡河的任务紧急，同时要追歼向大渡河逃跑之敌，我们于下午六时继续行军，离开越西城，北进三十里。当晚在接近彝民区宿营。晚上十二时左右，哨兵带来一个彝民头目叫黑骨头，到我住处见我，我接待了他，问他的来意，他说：“红军释放了我们关在监牢的弟兄，来表示感谢。为了报恩，明日护送大军过我彝族区，并引路赶上国民党退走的军队，协同红军歼灭

他。”左参谋长、刘政委刚休息没有即告他们，因时间距天明不到五小时，我就接受了这位彝族头目的意见，请他很快回去安排，并向他表示敬意。

十九日拂晓，我告诉了左、刘二位首长，他们挺高兴。部队集合出发时，刘亚楼政委在队前讲话说：今天通过彝民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部队通过彝民区域时，沿途彝民表示欢迎，许多年青的背了梭标、大刀，跟着部队一同前进，有的帮我们炊事员挑担子、背铜锅，彝民头目随着我们一起走。走到甘洛就赶上了从越西逃跑的国民党军队，我红五团第三营发起战斗向敌猛追。彝民群众非常勇敢和我一起追敌，把敌人全歼了。敌人的营、连长和县长均被彝民们用梭标刺死了或用大刀砍下了头，把死尸的衣服剥去了。部队缴了敌人士兵的枪，送给彝民一部分。彝民把俘虏兵的衣服、裤子脱了精光，但他们不杀士兵。那天战斗结束后，下了阵大雨，二、三百被脱光衣服的国民党士兵象落水鸡，不敢在彝民区歇停，紧跟我军行动。左参谋长、刘政委告五团三营营长梁兴初同志收留这些士兵，设法抽我们战士的衣服给他们穿，这是对阶级弟兄关照的问题。

十九日下午，战斗结束后继续北进，当晚就在彝民地区宿营。据俘虏说：此地离大树堡还有六十多华里，须经过晒经关。大渡河渡口北岸是富林镇，驻扎有刘文辉的一个旅，其南岸的大树堡^住驻有该旅派出的一个营。由晒经关到大树堡，仅有一条暴露的路，通过一个要隘。这要隘上放了一个排哨，不解决这个排哨，就不能通过这个要隘，左参谋长、刘政委听汇报后，决定把在小相岭俘虏来的排长及十几个愿当红军的士兵和插进去的我七名战士，组成一个尖刀排由我带上，伪装成越西退出的川军。我向晒经关前进。晒经关很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传说，唐僧取经回长安时，老乌龟渡他过大渡河，把经翻在河里弄

湿了，到这里晒经，就叫晒经关。大树堡的敌人派了一个班控制此地。我们未到晒经关，就遇到富林敌人派来的便衣队十余人，他们一见，以为我们是川军。我们不能说话，就由小相岭俘虏来的排长给他们讲四川话，他们就带我们向大树堡前进。一枪未放就夺占了晒经关和大树堡两个隘口。我们占领了大树岸渡口，歼敌一个连。其营部和另二个连已渡到北岸富林去了，还抢夺得两只渡船。左参谋长、刘政委到了大树堡，立即察看渡河点，并令积极收集木材造船，佯言北渡攻取雅安（当时西康省会）。这个佯攻动作做得非常好，连我们自己的队伍，也认为真要在这里渡河，为此，北岸富林敌人，调兵加强守备，生怕红军强渡。

四川军阀刘文辉吓坏了，慌忙调兵到富林镇防御，这就使安顺场、泸定桥北岸守备的敌人减少了注意力，有利于一团在安顺场抢渡成功，有利于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

通过泸定桥 进到宝兴县

在大树堡，我们同对岸富林防御之敌对峙了三天。主要是钳制敌人，以能使我军在安顺场顺利的强渡并能使我军主力迅速抢占泸定桥，通过大渡河。我一团渡过大渡河，四团抢夺了泸定桥后，军委五月二十四日，电令左参谋长、刘政委率队归建，在泸定桥通过大渡河。沿大渡河南岸没有道路直通泸定桥，同时对岸有敌人，易暴露行动企图。因此，我们于五月二十五日，返回晒经关，仍通过彝民区，绕道翻山到安顺场，走大渡河南岸我主力行进的道路向泸定桥前进。我们于六月三日，过了泸定桥，六月七日在天全回到军团司令部，刘亚楼政委率五团三营归建。

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英明指挥下，全军指战员英勇机智，一方面军胜利渡过了大渡河，占领了天全、芦山，向雅安逼近佯攻，以使部队能休息两天，准备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

合。据得悉，四方面军部队已在灌县一带，占领了灌县以北的汶川、通化、理县，正向懋功前进接应我一方面军。军团首长令我率便衣侦察队先行出发，率领一师侦察连向宝兴前进，相机占领宝兴县。调查过雪山的道路情况，宝兴县没有敌人，国民党的县长和民团都跑了。我们进到宝兴城很快把情况查明了，将所得的情况报告了军团首长。军团首长令我率一师侦察连、军团便衣队通过夹金山（大雪山）向懋功县前进，与四方面军部队接头。六月中旬的一天，气候很好，我率侦察部队奉命与四方面军部队接头。早饭后，从宝兴出发北进，远远看见大雪山，我们一直向一条深沟里急进。山沟里的小河不很宽，流速特急，老百姓用树杆架起一座小吊桥，人可过去，但骡马不行，必须在河里过水。糟糕得很，我骑的骡子不过小河，几个人用绳子在河对岸拉，在河这边赶打，无论怎么赶都不过。我因赶路，没办法只好留下警卫员同饲养员在后边，设法把它赶过小河，我带上部队走了。结果警卫员、饲养员没有办法，怎么赶它硬不过这急流的小河，他俩就把骡子放了，把鞍子、马笼头背过大雪山。他们一见我，就哭着告我说：首长，实在没有办法，我俩才这样做的，你能原谅我们吧！我安慰他两个说：你们二人为这骡子尽了最大的责任，你们太辛苦了，骡子丢了再找一个就是了。这二个同志是我到军团侦察科工作时由管理科派来的，饲养员姓高（叫他老高忘记了名字），警卫员李兴才，都是江西吉安人。老高到草地就调去当战士扛枪了，李兴才直跟到陕北，成立骑兵团时调他去当骑兵班长。抗日战争时还有联系，我到晋察冀军区时，他请假来看我，后来就不知道了。

翻过夹金山 会师懋功

我带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

日黄昏，进到夹金山下。各班、排搭了临时草棚，住宿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就开始上夹金山，即过第一个大雪山。因空气稀薄，人喘不过气来，又冷又饿，脚抬不起，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二十日上午十一点钟后，才爬上夹金山顶。上不易下更难。因为积雪滑得无法站稳脚，只好一班一组手拉手地慢慢下，弄得不好整班组跌到雪窝里去了，又慢慢从雪窝里钻出来。到山脚下，前进二、三里有个村庄叫达维。在这村里到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的部队。八十九师的柴师长带了一个营来迎接我一方面军。柴师长一见我们很高兴，热情地说：“奉军首长命令，到此来迎接中央红军老大哥，你们辛苦了。”我说：“谢谢师长热情接待。我是刘忠，一军团侦察科长，奉军团首长命令带侦察部队先过夹金山来同四方面军同志联系，今天看到柴师长很高兴。我们一军团部队，明日开始过夹金山。”柴师长说：“我们军委政委李先念同志到了懋功县，他在那里等着欢迎一方面军的首长，我先回去告诉他。”因为达维房子很少，柴师长就带他的部队到懋功去了。我率的侦察部队，六月二十日晚，就在达维宿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军团部队已翻过第一个大雪山（夹金山），后面继续过大雪山的行军秩序是三军团。中央和军委机关、九军团、五军团，均在夹金山一条道路上过的。一军团到达懋功时，四方面军三十军李先念政委请我们军团首长吃了一顿饭，我也参加了。我在懋功县第一次见李先念同志，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藏青色的军装，戴了一顶大盖的八角红军帽，显得精神特别振作。过夹金山后，我一军团的部队继续向北推进，经两河口、卓克基、进到马尔康和刷经喇嘛寺，再翻一个大雪山，就进到了草地的边沿。

进黑水、芦花到毛儿盖

为了顺利通过草地，战胜大自然，二师是前卫师，进到了黑水。林彪军团长，军团罗瑞卿保卫局长，还有王秉璋作战副科长随二师的先头团（六团）进到芦花，进行通过草地的各项准备工作。我率军团便衣侦察队随着他们一起行动。芦花是藏民区，我军进村，藏民都跑上山了，一个人也找不着。军团首长令王秉璋副科长率六团一营出去找几个向导来调查行军路线，他出去活动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找着。藏民躲在森林的高山上看着我们，藏民有武器，大刀磨得很亮，土枪打得很难，我们部队前进一段，藏民就瞄准打几土枪，打伤我们几个就后退。我们部队撤退时，藏民就举起雪亮的大刀向部队杀来。藏民怕机枪，冲杀到部队跟前机枪一响就向后跑了。王秉璋向林、罗首长汇报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就叫我去，一定设法找几个藏民来，罗局长亲自对我作具体指示，要我把六团的侦察排摆在正面吸引藏民，我亲自带便衣队隐蔽绕到藏民后面去，不能打伤藏民，结果很顺利地抓住了三个藏民，其中一个会讲汉话，两位首长很满意。藏民被带到林、罗首长那里，开始很害怕，因不懂我党我军的政策，有戒心。经过罗局长亲自作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于是这三个藏民讲了草地周围的各种情况，并答应带路。

翻过大雪山，部队的粮食供给是极大的困难。一天，我向军团长、保卫局长汇报部队吃饭有问题，没有老百姓，有钱买不着，找着粮食就吃，这是我军纪律问题。罗局长就说：“粮食是困难，红军的纪律是个问题，但为了保持中国革命这个种子，不能不这样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来对藏民同胞好好赔偿。”军团长接着说：“通过大草地要十几天，全无人烟，现在还有藏民，进入草地后，就无处找粮食。你们侦察任务，要加

一项，侦察能吃的草叶、草根，大草地遍野都是草，你们要认真仔细寻找，能找出几百种几千种能吃的草，这是解决通过草地的关键问题。”罗局长又说：“军团长讲得很明确，你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一件工作，要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

从此起，我每天都领着人去尝野菜、挖草根、煮草叶。在这茫茫无边的大草地里，找不到粮食，可草有的是。我们要让这些草为中国革命服务，给工农红军提供几千几万吨的粮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能克服与战胜这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确确实实是一种最光荣伟大的重要任务呵！

草地长着各种各样的草。但有的草在嘴里嚼着很难咽下喉，有的草吃了要中毒。我们二师六团有些连队就是吃了一种牛舌头似的大叶草，中了毒很危险。有的毒草会毒死人的，所以我们找到的“野葱”、“野蒜”、“茴茴菜”，或是“野芹菜”、“豌豆苗”，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各种“野草”，都要亲自试试品尝。若找着能吃的野草，送给军团卫生部鉴定后，向各单位介绍或用文字通报全军。长征红军指战员到底吃过多少种野草，是无法计算的，反正所有过草地的工农红军都吃了草。野草在嘴里嚼时的那种味道，咽下喉时的那种艰难，从胃里反出去时的那种感觉，我想大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上旬，蒋介石派胡宗南部队一个师，占领了草地边沿的松潘县。并派出一个营进驻毛儿盖，企图阻止我军通过草地北上抗日。七月二十日，我随林、罗首长由找来的三个向导引路，率前卫团（六团）从芦花出发，翻过大雪山，经过茂鲁子向毛儿盖前进。沿途都有藏民隐蔽在草林内打枪，专打骑马的人，并打得非常准。如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因骑在马上被打死。有的藏民爬在山顶上，我们部队在山下行进时，他在山顶

上翻石头下来打我们部队。这时又要派少数部队占领阵地用机关枪打一梭子弹来掩护行进，真不好对付。从芦花到毛儿盖一百二十华里，整整走了四天。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也同我们一起进到毛儿盖附近。我二师第六团，协同他们包围了占领毛儿盖的敌人，但没有怎么攻击该敌，过不几天，一、四方面军主力，都到了毛儿盖附近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占领毛儿盖的敌人动摇了，害怕被歼，于是企图逃窜松潘。

歼灭毛儿盖逃窜松潘之敌

中央军委命令以两路北进，通过草地。左路军以朱德总司令、张国焘（当时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率一方面的五、九军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经阿坝出草地；右路军以毛主席、周副主席率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经班佑出草地，徐向前同志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为政委、叶剑英同志为前敌参谋长。右路军是在松潘以西的毛儿盖之间地区通过，进入大草地。

我率侦察连和便衣侦察队走在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的前卫团前面，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进到毛儿盖通松潘的分水岭，查清进入大草地的路线。从毛儿盖逃窜之敌，不知我军已进到分水岭，被我派出的便衣侦察队捕捉。我即讯问敌俘并将情况报告左权参谋长和三十军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他们命令我指挥前卫团和军团侦察部队迅速坚决地歼灭该敌。七月二十日下午开始战斗，打了不到三小时，全歼该逃窜之敌。除缴敌人全部武器、弹药外，还搞到许多炒面、干粮。当时来讲是十分宝贵的。这是我军进入大草地前的第一个胜利。首长考虑：松潘的敌人可能会出来接应毛儿盖逃回之敌，于是立即派出一个团向松潘方向

前进，并佯言我军进攻松潘，以迷惑敌人，掩护右路军北上，胜利进军大草地。

通过大草地 突破腊子口

七月二十一日，一军团进到了分水岭。左参谋长同军团首长说我指挥毛儿盖之战打得很好。军团长对我说：“明天就向草地进军，把三个向导交你照管，要认真负责、不能发生意外。”聂荣臻政委加重语气说：“刘忠同志，你原是模范红五团政委，对这三个向导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好地关心照顾他们，使他们能带我军顺利通过大草地，这是你当前的主要工作。”这三个人是从芦花带来的，通过草地全靠他们带路，缺一不得，一个是本地藏民，他知道路线，但不懂汉语。另一个是山东移居芦花的回民，他会翻译藏语，那时称他“通司”，但他不知道路线。再一个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从草地出腊子口到甘肃他都走过，他既知道路又懂点藏语，是四川汉族人，这是最起作用的一个，但是他不积极，对红军有一种抵触情绪。军团左参谋长关心他们沿途生活，给他们每人一匹马，发足够的酥油、糌粑、干肉、咸盐等。还给每人一条毛毯，可以说，这三位向导的生活算比较好的了。

过草地前，把各师侦察连合并为军团侦察连。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向大草地进军。我带这三个向导，军团侦察连和便衣侦察队走右路军的最前头。草地不是一般草原，而是水草地。烂泥很深，草长有二米高，前面走的部队，要把草扒开，压下去开辟路，后面部队才能走。部队踩着水草，铁锈一般的泥水把脚上半截都染成深黄色，用淡水洗半月都洗不掉。有的地区骡马不能走，弄不好陷进去起不来，必须绕道才能把骡马拉过草地。

草地气候多变，当时正是夏天，但仍一天变化几次。早晨是

濛濛的雾天。天气好时，中午十一点至十四点内很暖和，用望远镜可看到野牛、野马、野驴、野鹿等动物成群地跑。十五点后，开始变冷，有时突然下米头雪，有时下冰雹，到晚上就冻得要命。部队穿的衣服很单薄，吃草营养又不足，所以身体差的很难渡过这一关。军团侦察连有个体弱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不能走了。起初，连长指导员告排长派战士架着走，最后确实走不动，只好留下，多给他点干粮，告他休息一下跟随后面部队走。可是这个战士再也没有归队。象这种情况部队里更多，有的就死在草地，回想起来确实很沉痛，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关，就是爬雪山，过草地。

我们从分水岭起，整整走了十二天，八月四日到了班佑。这里就有用牛粪做的牛屎房了，但极少，部队仍露营。这些牛屎房是作战指挥所和军团首长住宿。我带三个向导也住上一个牛屎房。整个部队走得疲劳不堪了，这时发生张国焘叛变。右路军到班佑时，左路军进到阿坝，张国焘发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令他们率队南下重返草地，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此电文叶剑英参谋长首先接看，他拿上电文偷偷跑回一方面军找毛主席。毛主席一看电文，立即令一、三军团部队掩护中央、军委机关出发北上。陈昌浩得知要派部队追一、三军团南下，若反抗就打。徐向前同志说，没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但陈昌浩仍派了部队来追我们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司令员率队后卫掩护，他看见来追的部队，即令后卫队架起机关枪占领了阵地。说：“你们谁敢来就打谁，部队冲上来就用机枪扫射。”毛主席亲自向四方面军奉命追击的同志说：“同志们！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的主张是正确的路线，张国焘命令你们南下是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错误的，你们暂南下吧，但相信共产党员是要跟中央正确路线的，不久你们会北上来找中央

的。”张国焘叛党，另立中央，是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带四方面军全部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又返回头过草地南下了。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受他批斗，指挥权力名存实亡。毛主席、周副主席率中央领导指挥机关和一、三军团部队，坚决迅速地继续北上。预定到陕甘宁苏区与刘志丹同志会合，坚决执行党中央抗日的主张。

中央、军委机关，一、三军团部队，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从班佑单独继续北上，我仍带军团侦察连和便衣侦察队走在最前头，紧紧依靠这三位向导。我拿着指南针掌握着方向，他们三个边走边谈找出一定的记号，有时看见一块奇怪的大石头，有时找出一个野牛的头角骷髅。只有找着这些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记号，经过他们研究对证，才能定出前进的路线来。一天，在草地边沿遇着一条江河，向导愣了。望着水流，急得很，不知是什么江、河，过不去？怎样过？我们正发愁，军团首长来了。左权参谋长对着地图和向导坐商核对了好半天，才弄明白是白龙江上游。军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陡涉过去，继续迅速前进。往前忽然走到一个很深的山峡里，迎面是陡峭石壁悬崖，前前后后找不着路径，向导当时晕头转向，我叫他们不着急，慢慢研究。他们七转八绕，在一个深谷里突然发现一座木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看，山谷深不见底，桥面很多圆木头从两边石崖上层层标出横搭过去的，使人望之生畏。我们部队就从这个悬空的木桥上过去。以后才查清楚，这就是石门。如果没有找到这座桥，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才能够过去。再向前走了一天，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二十九日，就到包座的喇嘛寺，完全走出大草地了。

这是甘肃省管辖的地区。军阀鲁大昌派出一旅兵力守腊子口，妄图堵击我军。腊子口的地形非常险要，加之守备之敌构筑了许多碉堡、工事，更加难以攻打。左权参谋长立即令我把便衣

侦察队化装为国民党中央军，向腊子口侦察前进，查清守备敌人的情况，相机占领隘口，前卫团紧随我一定的距离跟进。我化装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四师中校情报科长，军团保卫局便衣王班长（名字忘了），化装为少校联络参谋。把人们经历编出对好，千万不能出纰漏。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早晨，我们大摇大摆地向腊子口前进。下午二点左右，进到离腊子口大约十五华里，就遇上守敌派出的便探。我化装的联络参谋问他：你干什么的？他说是做买卖的商人。追问：“你不是商人，是腊子口长官派出来的，说老实话吧，我是中央军二十四师联络参谋来同你们联络的，我姓王，这是中校情报科刘科长（指我）。”敌人便探信为真说：“呵！你是中央军，失敬了，我是奉旅长命令来迎接你们的，请长官走吧！”于是他带着我们向腊子口前进。进到敌前哨，敌哨兵问那里来的？敌便探答：“是中央军来同旅长联络的”。敌哨兵放我们进了。前卫团一进，敌人发觉了，向我部队开枪射击。二师四团长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一面命令部队展开，一面立即报告师首长。这时，二师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都到了四团指挥所，不一会军团首长也前来了。天将黄昏了，军团首长命令连夜进攻，坚决夺占敌守备的桥梁。腊子口两边悬崖，中间一条河不宽，但水流速太急，人徒步过不去。只有过桥才能通过。但桥两头敌人构筑了坚固碉堡守备，火力配备很强，无法攻克。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整整打了一晚上，四团的突击排乘骡马渡过河去了，他们爬石崖大山绕到敌人的后面，于三十一日拂晓前，在敌人的后面打响了。该排占在山顶上，居高临下地向山下的敌人猛打，把敌人打乱了，胜利地夺占了桥头碉堡，这时敌人狼狈不堪，拼命向后跑，除被俘虏一部分外，其余均跑到岷县去了，我军跟着溃退之敌尾追，天险的腊子口被我英勇善战的红四团打开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率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一、

三军团部队在当天就出了腊子口，进到岷县的哈达铺。部队分向岷县、宕昌派出了警戒以掩护全军在哈达铺地区休整了三天。

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下旬，胜利渡过天险的大渡河后，就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茫茫无边的大草地，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胜利突破天险腊子口。这个时期，不仅与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与大自然作斗争，还要同我军内部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但红一方面军终于战胜史无前例的困难，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持北上抗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营以上的干部大会。周副主席主持大会，是在哈达铺一个打谷场里开的。大家一见面，情绪很不好，同乡同事，交头接耳地说起这个在什么地方负伤了，那个在什么时候牺牲了。回想中央苏区出发时十万人，现在仅剩下几千人，确有些悲观。有的讲怪话，说这是革命的下场；有的同志愁眉苦脸，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和军团首长出来了。毛主席说：同志们！由于我一、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掩护中央、中央军委机关通过了草地，打出了腊子口，今天的会首先要庆祝这个伟大胜利。当前任务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要靠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们呀！你们不要看我们人少了，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种子。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率兵南下，是错误的路线，相信共产党员是会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不久他们会回来的。现在我们要到陕北苏区与十五军团、二十八军会合，部队要整编一下，把一、三军团改为陕、甘支队，组成一、二、四、五、十三大队。干部和机关人员有的要背上长枪去充实战斗连队，中央委任彭德怀同志为陕甘支队的支队长。我为政治委员（大意）。听毛主席一讲，大家的情绪又好了。认为同志们的流血牺牲是光荣而有重大的价值，

烈士们未完成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

彭老总接着说：同志们！我讲讲继续作战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步兵）作战，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骑兵）作战了。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是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骑兵并不可怕，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下马就大大地削弱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在打骑兵的同时，还要经常准备打敌人的步兵。当面敌人有东北军、西北军，蒋介石还会很快利用铁路交通运兵来堵击我进军。我们要力争迅速的同陕北红军胜利的会师（大意）。

夜袭隆德县 日过六盘山

我们跨过了雪山草地，进入了陇东高原。蒋介石为阻止长征的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急忙调遣他的嫡系胡宗南部以及西北军及东北军的步兵和骑兵。主力在西（安）、兰（州）公路及平（凉）、宁（夏）公路沿线，凭借六盘山天险，摆成层层的封锁网，企图阻拦我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网，对红军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但这里的敌人有好几路是善于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作战的骑兵。在这不熟悉的地区，又遇上不熟悉的敌人，不免给我军带来一定的困难。这是长征的最后一段，我们必须克服与战胜它。

红军的一、三军团暂改为陕甘支队，已整顿好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由哈达铺出发东进到理川。当时也没有陕甘宁地区的军用地图，行军路线完全依靠找当地群众调查。左权参谋长告诉我侦察科，每到宿营地，至少要找二十个以上的向导，并立即调查前进方向一百五十里的路线网。从哈达铺出发，毛主席、彭总

均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毛主席在这段行军中，亲自掌握前进的路线和敌情，一到宿营地就找我去亲自作交代。九月八日宿营闾井时，毛主席交代我左边查清漳县、陇西敌驻军，右边查清礼县、天水敌军情况，而主要是调查祁山、马坊间直通会宁、静宁，即通过西（安）、兰（州）公路的平行路线，沿途的人家、道路、沟渠和河流等情况，要详细查清，于当晚十二时将调查的路线图送给主席和彭总。从此，每到宿营地就到毛主席、彭总那里接受调查路线、敌情的任务、通过西、兰公路后，九月十五日，进到马营宿营，继续向会宁、静宁前进。因为太累了。就叫苏孝顺副科长到毛主席那里去接受任务。毛主席见苏就问：你是谁？苏说，我是苏孝顺，侦察科副科长。科长要我来接受主席指示调查敌情、路线。主席说，科长呢？苏说在。主席说，你还是叫他来吧？苏跑回来告我，主席还是要你去。我立即就去了。主席说，刘忠同志，路线是当前部队进行的关键问题，我要亲自交代你负责，怕出庇漏。于是主席又亲自交代我调查的路线和敌情，并限于晚十二时前交卷。晚十二时前后，即要下命令给各个大队，规定行军路线和警戒敌人的方向。有时是彭总交代我调查的路线和敌情，但毛主席在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从马营继续前进，进到黄土高原的平原地区。这里有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活动，不便于白天行军，只好改为夜间行军。我军从会宁与静宁间的界石通过。九月二十六日晚，我率侦察连和便衣侦察班进到隆德县城郊，即遇到胡宗南的二十四师前卫团。该敌也是当日黄昏开到隆德的，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在通六盘山方向放了一个连哨，该连哨派出一个班堵住通六盘山的路口。我们不知道有敌人，便衣班长陈胜忠带着他那个班走前头，碰着敌哨兵叫口令，他不答应，一个猛扑就把敌人的前哨班消灭了。我问俘虏是哪个部队。俘虏说，

二十四师，天黑前才开到。侦察连长刘云彪听说是刚开到，带上部队直冲敌人的连哨阵地，一冲敌人就垮了，占领了敌人的连哨阵地。我将情况迅速报告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命令部队绕道直向六盘山前进，并报告毛主席、彭总。这一晚上真热闹，敌二十四师的官老爷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慌里慌张的占领阵地，架起机关枪、迫击炮乱打，手榴弹和步枪声响了一晚上，结果自己打了自己。我陕甘支队整个部队都绕到了六盘山脚下。

国民党毛炳文部二十四师进到了隆德、静宁，马洪宾的步骑兵也进到静宁附近。我们前进路上的平凉、固原等地有东北军、西北军占领封锁。通过平（凉）、宁（夏）的公路，首先要通过有名的天险的六盘山。在这紧张情况下，军团长走在前卫部队位置，亲自掌握情况以利及时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我带着军团便衣侦察队、侦察连走在部队前头，向六盘山搜索前进。由于我军行动敏捷，敌人没有来得及占据控制要隘，我部队以急行军顺利地控制和通过了六盘山。

青石嘴战斗 斩灭敌骑兵

过了六盘山，我带便衣队向青石嘴前进。进到青石嘴以南二里多的山坡上时，前面的侦察员抓住敌人两个便衣侦探。他们一看是红军，吓得浑身发抖，经过宣传解释，打消了顾虑，给我讲了敌人真实情况。他们供出：青石嘴镇上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十九团。四个连，五百多人，五百多匹马，骡马大车二十多辆。刚从平凉开来还不到两个钟头，团长派他们到六盘山去同友军联络。

我们正在盘问俘虏，军团长到前面来了。他亲自询问俘虏，并要我到前面确实查清敌情和地形，同时叫作战参谋张雄去报告彭总、毛主席，并通知各大队长前来接受作战任务。我领着一个便探俘虏带着侦察队向前走了半里地，到了一个为丛林笼罩的山坡

上，俘虏指着对面山脚的镇子说：那就是青石嘴。不一会，军团长也到了我站着观察的山坡上，他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地形和道路。我连忙布置好警戒，一边望着山下的情况。时间到上午十点左右，太阳照射着青石嘴镇上，那里的情况用肉眼都看得很清楚。敌人正在起火做饭，家家的房顶上都升起了滚滚的炊烟，马都下了鞍子，按马的颜色一队一队的拴在村外，红的一排、白的一排挺好看的；骡马大车也卸下仰起车辕，分散在村内村外。三三两两的敌人来回走动着，有的在铡草，有的在打水，有的在喂马……。几个大队长都来到前面。作战参谋张雄告诉军团长说：毛主席、彭总命令迅速歼灭该敌，以利于全军通过平、宁公路。军团长立即下战斗命令，以突然袭击的战斗动作消灭敌骑兵团。通过平、宁公路，速向陕北苏区前进。杨得志同志指挥一、二大队正面进攻，直扑青石嘴；张鼎山同志率五大队从左翼绕向敌侧后，迅速抢占对面的山头，以防海原方面的敌人增援，堵住敌人向该方面逃跑；陈赓同志的十三大队从右翼插出断绝敌人的退路；同时负责对平凉方向警戒，防敌增援；四大队作全军的预备队并担任后卫的掩护。战斗信号由杨得志同志那面发出，部队动作要快要猛。这时聂荣臻政委、左权参谋长等到了军团指挥所。各部队立即按命令迅速、隐蔽地向敌人紧张地活动起来。

突然看见杨得志同志那里发出信号，前面的机枪声响了，步枪声、手榴弹声也响起了。几乎同时，青石嘴周围的山上，到处冒出火星和烟雾，镇上的敌人顷刻间乱成一窝蜂。几十分钟后，青石嘴镇上的枪声和手榴弹声慢慢稀疏起来，远远看去，只见红军战士们拉着一匹一匹的高头大马，押着一队一队的俘虏骑兵，神气十足地向村外走，歼敌骑兵的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时聂荣臻政委以兴奋的口气对我说：“刘忠同志，这次缴了几百匹马，首先把军团侦察连编为骑兵侦察连，以这个连为基础，军团将要建

设骑兵团。你快到前面去通知各单位，把俘虏里边的钉掌工人，修理鞍具的工人，还有马术教官和马医官，——清查出来，对他们好好做政治思想工作，争取他们到红军里来，为建设红色骑兵服务。”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骑兵部队里有这样多的名堂，立即向青石嘴镇上跑去，把聂政委指示传达到各大队。果然，建设骑兵部队不简单，首先，战士不愿当骑兵，因为马的目标大，敌机来了不好隐蔽，喂马麻烦，不会铡草，不会喂马，更不会骑马，所以侦察连的战士大多数不愿当骑兵。军团首长十分关心，专门要我负责。建设好骑兵，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一支红色骑兵连建设起来了。

吴起镇会师 长征告结束

青石嘴战斗后，是长征中最后一段的行军。这时把主要的敌人甩到后面去了，通过庆阳、环县的公路，就快接近到陕北苏区了。十月七日进到三岔地区时，休息了二天，准备通过庆（阳）、环（县）之间在曲子镇附近进入陕北苏区。我们派出便衣队查明了庆阳、环县一线的敌情、地形和陕北苏区的情况。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晚，进到曲子镇打了一仗，把马洪逵一个骑兵连打跑了，当地的民团消灭了，占领了曲子镇。这时，我战斗部队主力转向后进，中央、军委机关开向前面，四大队为前卫，向陕北苏区吴起镇前进。于十月十三日，中央机关胜利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刘志丹、徐海东同志派部队前来接引中央和军委机关进到保安县（现志丹县）。

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由陕北红军接掩后，看察了吴起镇附近的地形有利于打骑兵，有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我军后卫还有敌骑兵追击着。毛主席、彭总命令在吴起镇打个胜仗，作为来同陕甘

宁苏区人民的见面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暂改的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击溃了军阀马洪逵和东北军的六、七个骑兵团，歼灭其一部。从此，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掩护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史无前例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阳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征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二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泥坑里去。”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总结。

直罗镇战役 粉碎敌“围剿”

长征一结束，新的局面开始了。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北苏区“围剿”，妄图围歼我军。先说一下陕北红军的情况。一九三五年八月，原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

同志指挥领导下，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合，成立了第十五军团。我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从中央苏区长征，经十二个月的苦战，掩护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和第十五军团会合后，把陕甘支队番号取消，恢复为第一军团辖第一、第二、第四师。这时的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二十八军为第一方面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左权参谋长令我带骑兵侦察连到直罗镇附近去侦察，搞清直罗镇周围敌占阵地、工事构筑和地形路线情况。我第一次使用骑兵侦察，一点把握也没有，进到距直罗镇十二华里的羊泉就下了马，仍用老办法化装便衣分成两路，由当地老乡带我们前去侦察。当天黄昏，回到军团司令部，向左参谋长汇报了侦察的情况。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苏区，第一次与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协同作战，打得好不好，对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次进占我直罗镇的敌人是东北军，他们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了，不愿打内战，而要求打日本、打回老家去，是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逼迫着来打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俘虏大批敌官兵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卖国政策。陕北苏区的人民也积极支持红军歼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我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十五军团从左边进攻，陕北红军从右边进攻，军团在正面突破敌人的阵地。十五军团攻入了直罗镇，敌一〇九师师长率队退出直罗镇向我一军团指挥所阵地冲击，企图突围。毛主席、军团首长都在这个指挥阵地上，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师部前面一步兵营向我军团指挥所冲上来了，警卫连此时还在山后。聂政委叫我：“刘忠，你率警卫排、侦察队赶快把敌人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我率

队立即向敌人冲去，把敌打退在山下，有二个警卫员负伤，聂政委的警卫员牺牲了，终于守住军团指挥所的阵地。一会军团警卫连上来了，二师的预备队调上来，向敌人发起进攻，把敌人消灭了，俘虏了敌一〇九师的牛师长。上午十一时，全歼一〇九师。

部队继续前进，在黑水寺附近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这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因气候变化，雪很大。毛主席对军团首长说：下令停止追击敌人，可安排宿营。此战役很顺利宣告结束。军团司令部回头走了一段，找了房子宿营，无线电台架了线，毛主席向周副主席、彭总和十五军团、陕北红军发出电报后，就同林、聂、左等首长坐下来，很自然的随便谈起话来。警卫员抱来木柴烧了一堆火，我同毛主席、军团首长围坐一起烤火，听他们谈话。毛主席谈了几个问题，大意如下：第一，这仗打好了，消灭敌人一个多师，他们暂不会来进攻苏区了。俘虏来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不要虐待他们，要好好的优待，对他们宣传我党抗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党主张，就可大胆放回去。东三省日本人占领了，他们无家可归，愿意打日本，不愿当亡国奴。第二，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了的时候，我们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我们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切爱国人士共同的、公开的主张了，蒋介石卖国政策极大地被孤立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红军在适当时机要东渡黄河，到山西去活动他几个月，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打击阎锡山投降日本的气焰，争取阎锡山部队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要扩军筹款，争取各阶层人士拥护我党抗日的主张，我们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除汉奸卖国贼外，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前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第三，预计明年开春东渡黄河，如行动顺利，可能明

年夏季部队转回苏区。那时为迎接新的大好形势的到来，要大量培训干部，创办红军大学。抽调大量的高中级干部进行训练，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第四，在革命新的形势下到明年秋、冬二、四方面军很可能北上，到那时要准备去迎接他们等等。毛主席的这段谈话为以后部队的行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既灵，又准”。

直罗镇战役后，部队转到甘泉以东的临真、云岩镇一带休整。这时俘虏过来的东北军军官，大部份被争取过来了，有的密订了条件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十二月份，毛主席、周副主席、彭总令第四师开进到敌占的韩城地区活动。主要任务是：送一批俘虏军官出境，同时对东北军、敌占区的人民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我率领骑兵侦察连随四师行动，一直插到澄城以南地区活动。这次行动骑兵侦察连得到锻炼，活动将近一个月后返回陕北苏区，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东渡黄河 扩大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一月冬，黄河水开始结冰。陕北苏区从壶口、延水关、河口、吴堡，直至北面的佳县以北控制了约四百华里的黄河西岸。我于中旬，率骑兵侦察连开始侦察黄河各渡口。从壶口直到佳县，于下旬才侦察完。这时我对骑兵的使用较熟练了，但还不知道河水结冰后，可行人走马，第一次从张家滩过延河时，到了河边不敢过去。对岸群众从冰上过来说：冰已冻好，人马都能过去。我们还不敢把马拉到冰上走，老乡们即帮我们推土，奠了一条路叫我们拉马上冰过河。骑兵指战员特别感谢老乡，并误认为凡是河水结了冰，人马都能走，在过清涧河时，有的战士骑马在白冰上走，结果踏破了冰，人跌马翻到水里去了。以后才知道白冰还没有冻稳。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军委令一军团在延水关以北及清涧河口选择渡河点，积极准备秘密的造船和训练水手，于开冻后东渡。为此，军团组织了司、政、后的先遣人员，由左参谋长亲率前往侦察，具体确定渡河点，告军团首长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因是在第一次侦察的基础上有选择的侦察，所以较快，在一周内查清确定在无定河口横渡黄河。我们积极准备，如秘密制造渡船，训练船工、水手等，部队亦作东渡黄河的训练工作。

黄河的冰三月中旬完全开冻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命令红军主力于三处同时东渡黄河到山西开展工作。一军团在清涧东的无定河口东渡，十五军团在绥德以东的吴堡东渡；陕北红军第二十八军在佳县地区东渡。各路强渡黄河均很顺利。我一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黄昏，以猛烈的炮火掩护第一师一团的突击队，非常顺利地横渡过去了。我率领侦察队即向石楼前进侦察。阎军固守石楼之敌毫无准备，红一团团长陈正湘同志率该团一营胜利占领了石楼县城。我军主力横渡整夜，于十五日全部渡过黄河。十六日打第一仗，在交口歼灭阎锡山军守交口的一个营。十八日打第二仗，关上战斗，歼阎敌一个团，一个山炮连，缴获山炮四门。二十三日打大麦郊是第三仗，敌人抵抗了一阵即逃窜了，我红一师部队尾追到兑镇。这时阎锡山令从汾阳、孝义开来一个军、附属山炮团与我军战于兑镇。两军对峙时，我军团骑兵侦察连已进到双池，军团首长令我率该连东进。我于三月二十六日，在灵石以南的张家庄东渡汾河。汾河水浅，骑马渡河顺利过去了。进到同蒲线占领了灵石以南的南关镇，同蒲铁路南段的火车不敢开动了。我们虚张声势地说，要攻占各个县城。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率骑兵侦察连，单独活动于汾河以东同蒲线南段晋南地区。如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翼

城、新绛、稷山、河津等十县广大地区，钳制了大量阎锡山部队，以使我军主力在晋西北、晋西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资料，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我们还吸收了几十个工农分子参加红军，解决了一部分马匹，建立了军团骑兵第二连。我军团主力沿汾河以西向南活动，占领了汾西、大宁、襄陵等县城，军团司令部已进到万安镇。五月初阎锡山集中大量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控制了黄河东岸的永和关、永和县直至河津，在吕梁山蒲县地区与敌打了一仗后于五月下旬，在吉县的壶口，西渡黄河回陕北苏区。我率骑兵在河津的禹门口西渡，到陕北苏区宜川地区归建。红军东渡黄河任务，到此胜利结束。

成立“红大”迎接二、四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回到陕北苏区后，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从部队中抽调大批高中级干部到红大受训，把我党我军干部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一步，进一步理解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地位；在军事上，加强对高中级干部的战略思想、战术运用和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林彪到红大当校长，左权同志代理一军团长职务，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保卫局长罗瑞卿也调红大学习。师级干部调刘亚楼、杨成武、苏振华等同志到红大受训。科、团级干部抽调更多去受训。

从山西回到陕北苏区，军团在大教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主要内容：一，总结在山西作战和开展工作的经验；二，调大批干部去红大受训，反对领导同志因本位主义看不清形势发展的错误认识。我当场报名参加红大受训。但军团领导决定调作战科长聂鹤亭、教育科长孙毅、通讯科长刘鹏去红大受训，把我留下在司令部工作。当时军团首长考虑骑兵建设需我负责，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军团骑兵团，抽调优秀战士和马匹充实骑兵。一九

三六年七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辖四个骑兵连。刘亚彪任团长，戴澍生任政委。骑兵团成立后，军团指示，我负责把它建设好。七、八、九三个月，我主要是随骑兵团行动，进行骑兵训练。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毛主席、党中央接到朱总司令、贺老总和任弼时同志的电报：二、四方面军已会合于四川西北的甘孜、炉霍地区，决定立即通过草地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觉悟过来了，坚决拥护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逼张国焘取消了他的傍中央，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怀抱，要求中央出兵陕西西南，甘肃南部钳制敌人，接应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主力红军立即出动，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军南下，通过六盘山，进到天水、甘谷、陇西一带钳制、打击国民党部队和西北地方的军阀部队，迎接我二、四方面军北上。

中央军委令我为特别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一军团的骑兵团，附电台先行出发。经环县、曲子镇间进到三营，前出甘肃的静宁、会宁向岷县前进。其任务是查明各地敌之布防和骑兵活动情况，并与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接头，将所得情况及时电报军委。我受令后于十月十日率骑兵团出发，十五日进到华池，二十日，在环县、曲子镇之间通过，二十六日进到三营地区。在该地区活动两天，侦察敌情，查明了平凉、固原、海原和六盘山周围敌人布防和骑兵活动情况，以电报了中央军委和左、聂首长。军委电令我于十一月三日插到六盘山南的庄浪、清水一带，查明宝鸡、天水、甘谷等敌人布防情况。我查明上述地区敌情电告军委后，军委电令我速到通渭、静宁一带地区活动，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到岷县，正向会宁方向前进。我经通渭、静宁地区于十一月九日进到会宁附近。这时，四方面军的总部已到会宁，我到会

宁城内面见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向他俩问好。朱总司令非常高兴，一见面就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情况和一方面军部队的情况。我简明扼要向总司令汇报了情况。朱总司令说：当前情况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要迅速向陕北苏区前进。他要我谈谈敌情、地形和道路情况。我即将标示好了的敌情、地形、路线图给总司令一份并当面向总司令作了汇报。

这时，徐海东军团长、程子华政委率十五军团已进到陇西地区，陈赓师长、杨勇政委率第一师部队已到静宁地区，掩护二、四方面军向陕甘宁苏区开进。张国焘还在捣乱，密令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其口号所谓打通国际路线。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已渡过黄河向青海进军。结果全部被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打垮，仅剩一小部分跑到新疆。其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一军还未渡黄河被我们接应到了，同二方面军部队一同向陕北苏区开进。十一月十一日，该部队已由会宁、静宁地区出发，向固原、海原方向前进，十五日，东北军的骑兵第六师进到固原、黑城镇拦击我军。十七日，该敌骑兵十六团已进到半各城，被我第一师和骑兵团围歼缴械。可是该团的团长姓董（名字忘了），与我们有秘密统战关系，他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陈赓师长、杨勇政委和我同董见面，商妥将所俘的人马，缴的枪支全部退回，以利扩大统战工作。他回到西安后，特务分子向蒋介石报告董某与共军有勾结，蒋介石勒令张学良枪决该团长。此时的张学良不敢违抗蒋介石，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信枪决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部队，先后到达宁夏海原以东地区的三营、毛井、予旺、李旺堡一带大会师。一方面军在李旺堡召开了欢迎大会。大会是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主持的。他很高兴地致欢迎词，庆祝三个方面军会

师的伟大胜利。接着朱总司令、贺老总、任弼时政委和徐海东军团长、左权代军团长均讲简短有力的话。到会的全体指战员情绪非常高，高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部队休整了一下，准备再战。

山城堡战斗 红军最后一仗

敌胡宗南部队已从西安北上，向庆阳前进，企图堵截我军，协同宁夏马洪速部围歼我军于海原地区。胡宗南的第二十四师已进到庆阳以北的环县，其先头旅于十二月六日，进到山城堡。我率骑兵部队查明敌人后，立即报告了左代军团长，聂荣臻政委。我遵照军团首长命令，立即率骑兵团第一连出发，进到山城堡地区，准确准时地查明了敌人行动布置和周围的地形，回军团司令部当面报告左代军团长、聂荣臻政委。

中央军委毛主席命令，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部进到山城堡的先头旅。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为主力，四方面军三十一军配合作战。其第四军监视洪德、环县之敌，十五军团围困庆阳，第二方面军的部队监视海原、固原之敌。这是我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于大西北的第一仗，必须以消灭胡宗南部队来庆贺我们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我一军团歼敌的作战部署是：以一师、四师由南而北向山城堡敌人平行攻击，于十二月六日黄昏后七时发起战斗；以二师从左侧插到山城堡北面，包围切断歼灭敌人；以军团骑兵在山城堡东北地区活动，向定边警戒；在山城堡的东面有友邻三十一军配合进攻。军团指挥所随一师跟进。各师和骑兵团按军团首长命令，于黄昏后准时向山城堡之敌发起进攻。该敌守备也相当顽强，整整打了一个晚上，到七日拂晓前才被全歼。环县的敌人即向庆阳后撤，我四方面军部队进占环县。庆阳敌人被我十五军团围攻，因害怕被歼即向西安撤走。我彭总率十五军团进占

了庆阳城。至此，山城堡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胡宗南一个旅，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合大西北的第一个胜仗，也是红军在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西安事变 结束十年内战

一军团于十二月十日进到惠安堡、甜水地区。中央军委令一方面军在定边、盐边进攻马鸿逵的步、骑兵，以掩护二、四方面军顺利进入陕北苏区。我奉军团首长命令率骑兵团先行出发，侦察定边、盐边敌人的情况。十二日早晨，集合骑兵团将要出发时，军团接到中央军委急电：“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我军停止北打马鸿逵，立即准备南下支援张、杨。令刘忠率骑兵团立即到庆阳彭总处接受任务，向西安挺进。”我听此消息内心特别高兴。认为中央统一战线真灵。张学良、杨虎城有本事，抓住了我们打了十年都没有抓住的刽子手。现在好了，该召开大会公审这个头号反革命蒋介石了。左代军团长、聂荣臻政委令我率骑兵团执行军委命令，迅速南下。我立即起程经环县于十三日早晨赶到庆阳。彭总给我面示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名义写了沿途进军的公函及彭总亲自签署的给张学良、杨虎城接头的介绍信。我十五日进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与友军接上头。沿途南下经合水、宁县、旬邑、淳化等县，民团武装部队欢迎我红色骑兵，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也出来欢迎，有的县长并请我和骑兵团长、政委吃饭以表示友好。

我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立即南下，于十二月十八日，先后进到西安以北集结在乾县、永寿、泾阳、淳化、耀县、三原、富平、云阳镇等地区，做张学良、杨虎城起义军的后盾，配合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东北军、西北军，对付国民党军的亲日投降派，以防破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住云

阳镇，一军团司令部住三原附近的东里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中央机关由瓦窑堡搬往延安。红军大学由保安搬到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红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抽调大批高中级干部到此学习。一军团选调高中级干部六十余名到抗大学习，陈赓、杨得志同志带队，我亦被选调参加。我们从三原出发向延安步行，以十天的行程于一月下旬到达。从此开始了抗大的学习生活。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烽火

西安事变使中国的政局发生大变化，由十年内战转入到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为此而作的种种努力，当时绝大部分指战员主张杀蒋，因为他屠杀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党中央决定放蒋，指出：“杀一个蒋介石，会出现更多的蒋介石，抗战不能实现，内战不会停止，目前要集中力量打击汉奸卖国贼、亲日的投降派。因此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如蒋介石今后要变卦继续反共，我们就‘反蒋抗日’。”听党中央这样明确指出，我思想上又通了。

一、在抗大的学习和工作

抗大一队学习 十二队任队长

我们到抗大时学校已上课五、六周了，因各个部队到延安的路程有远有近，不能同时到校，所以一面开课学习，一面继续编队。抗大第一期一至八队均是红军高中级干部，第一队是高级军事、政治队，陈赓同志任队长。在这个队里的学员都是三个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如何长工、张际春、胡耀邦、杨得志、周纯全、洪学智等同志。一队共编十二个学习组，我被选为第四组的学习组长。在四组的同学是：杨得志、文年生、张元寿、黄志勇、罗华明、武竟天、宋连（女）等同志。周子昆同志是一队军事教员，张如心同志是政治教员。但主要课程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讲“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

题”、“军事辩证法”，朱总司令讲“党的建设”，主要是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直接讲到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具体事例；张闻天同志讲“中国革命史”，凯丰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博古同志讲“统一战线”，并说这是战略问题。张皓同志听了不同意说统一战线是战略问题，他说是策略问题。这就引起一队各组热烈争论。这个问题发展到全校各队讨论，直到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也参加讨论。以一队为主开了几天的讨论大会，旁听的人很多，毛主席也参加大会讨论。大家要求毛主席作结论，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忙作结论，全国正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工作中作出正确的结论来好。不久，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就明确了统一战线是战略问题。到了四月初，转到学习、讨论党的建设问题。朱总司令讲党的建设，是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讲起。接着就讲一、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调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即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使我党我军受到的大损失。最后集中的讲张国焘路线是枪杆子主义、军阀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反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个问题一队开展讨论后，发展到全校各队讨论，以后也发展到中央机关人员参加讨论。陈昌浩、张琴秋同志到抗大全体学员中作检查。他们检查后，就开展了批判、斗争，发生了过“左”、过火，特别是涉及面过宽、过广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承认山头、反对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这个问题没有掌握好，发生了偏差，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受不了，一小部分人组织回鄂豫皖苏区去秘密行动。中央公安部门发觉后，扣起十几个高级干部作审查，造成紧张的空气。最后，毛主席亲自出来做工作。提

出：“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面谈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踊跃到延安进抗大学习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三中全会讨论国策问题。我党中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电给它，原文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眷属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个电文公布全国，从四月份起，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和国民党军队都派大批人员来延安抗大学习。这是我党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条国策和四项保证所起的作用，它掀起了全国抗日的高潮。

党中央、中央军委为吸收各地人员来抗大学习，决定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第四大队，专门接收来自全国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抗日干部。令调聂鹤亭同志为抗大第四大队长、董必武同志为政治委员。四大队辖九队、十队、十一队、十二队、十三队、十四

队和直属女生队。我于四月下旬，被调任为第十二队队长。当时自己政治、文化水平低，怕领导不好知识分子学生队伍。因此不愿在学校工作，中央组织部王观澜同志找我谈话：“要用红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传统作风教育这大批知识青年。在新的形势下，做学校工作，培养大批的抗日军政干部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我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作，努力克服困难。

抗大学员队的组织非常精干。队部没有设指导员、副队长，仅设一个管理员管行政生活。还有司务长，上士、文书、通讯员各一名，炊事班十二人。十二队学员一百六十多人，编为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四个学习组，区队长从学员中挑选担任。四大队各队的党、团支部组织不公开，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派来学习的秘密党、团员，毕业后要回国民党管辖区域去做地下组织工作。各地区派来学习的党、团员，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辖，队里发展的党、团员不过小组生活，只同某个支委委员作单线联系，这样就能保持党、团员毕业后，分配出去做统一战线的秘密党、团工作。学习课程内容：（一）统一战线；（二）游击战术；（三）中国革命史；（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时间：予科两个月，本科四个月，即经过予科学习后，挑选部分条件好的学员到本科学习，本科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基层担任干部工作。如连副指导员、团宣传、文化干事等职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芦沟桥事件，即“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抗战。八月二十五日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我十二队是五月开学的，“七七”事变后，专门训练了一个月军事，于九月间毕业。学员一部分分配到八路军工作，但大部分仍回到各地去做统战工作，主要是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从一九

三七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但十二队的学员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並常有联系。如温建平同志，十二队学员兼区队长，担任十二队支部书记（不公开，他是国民党区域地下党组织派来学习的）。文化大革命时，是四川大学校长，现调北京语言学院任院长，党委第一书记。袁得胜同志是十二队学员，被选任第三区队长，支委委员，现湖南省工会副主席。最近在中央党校学习，还到我家看望并照相留念。王德同志是十二队第十二组学习组长，他在南京任副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长，时常有来往，现为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最近寄来同袁得胜同志合影的照片。胡开明同志是十二队学员，救亡室主任（即俱乐部主任），现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桌之同志是十二大队学员，地方党组织派来学习的，他原在空军第二专科学校任政治委员，经常来来往往。我仅谈抗大第四大队一个队的情况，证明抗大当时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在十二队毕业后，我又被调十三队任队长。一九三八年抗大是八个大队，一九四〇年发展到七个分校。抗大毕业学员散布到全党全军、全国各地。

延安挖窑洞 敌机炸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部队的学员大部分回前线工作。抗大第二期，我调到六队任队长。这时全国各地大批知识青年来抗大学习。没有房子住，就发动各队学员自己挖窑洞，罗瑞卿副校长亲自组织指挥。他知道我是泥匠工人出身，要我看察地形，做出图样，我六队先挖，给其它队做示范。我立即带各区队长和队的管理员到现地看察，分配地点，计划每个区队挖八个，队部挖六个，共挖三十个洞。当天回去就准备工具，第二天，全队人员动工，以十天的时间完全挖好。罗副校长带各队长来我六队现场参观，他指示各队按六队计划施工，但要因地制宜。六队挖完后，立即请当地技术工人安门窗、打火炕。我队很快搬住窑洞了，

抓紧训练，于十一月毕业。

抗大第三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招收学员。二期六队学员毕业后，我调三大队任大队长。一九三八年四月，抗大第三期训练结束。第四期招收全国更多知识青年，扩大到八个大队。如一大队住瓦窑堡，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同志；二大队住柳树店，大队长何长工同志；三大队住延安城外新挖的窑洞，大队长方正平同志；四大队住延安城外东关，我任大队长；五大队住延安城内府衙门，大队长冯达辉同志；六大队住洛川，大队长韦国清同志；七大队住缓德，大队长徐德操同志；八大队是女生大队，与我大队同住东关，大队长张琴秋同志（女）。那时各大队均设政治协理员，仅一大队设的政治委员。我们四大队政治协理员是黄志勇同志。王建安、郭林祥、罗华生同志先后任四大队副大队长。政治主任教员陈志芳、军事主任教员李国华同志。四大队是十个学员队，分设两个支队，一队队长洪学智同志兼任第一支队长，八队队长白浪同志兼任第二支队长。三队、七队学员是女生。还有一个直属军官队，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派来训练的军官，大部分是尉官，也有一部分校官。抗大第四期的军事训练加多了，因抗战进入高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武汉、南京、上海。我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役歼灭日本鬼子的一个旅团，激起了日寇的惧怕和对我报复。日寇派大批飞机多次轰炸延安。延安开始没有防空设施，各个单位和群众都有伤亡，我们大队被炸伤亡一些学员。如三队女生张放，是徐德操同志的女朋友，经校政治部批准毕业后举行婚礼，可是被日寇飞机炸死了。日寇飞机经常不断地轰炸延安，影响着训练。我们第四大队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学，到十二月毕业，结束了第四期教学。

迁移到蟠龙 开荒大生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飞机不断轰炸，中央军委决定延安的机关、院校作适当的分散，避免无谓的伤亡。我们四大队一九三九年二月奉命迁移延安以东九十华里的蟠龙，训练第五期学生。离开总校直接领导，大队的独立性较大，干部有所变动。调李干辉同志来任政治协理员，洪学智同志任副大队长兼第一支队长，唐凯同志为第二支队长，王诚汉同志为第三支队长。各支队分散借住群众的窑洞和房屋，自己加以粉刷整理。因蟠龙的地方不大，入户不多，供应粮食、蔬菜都发生了困难。大队党委讨论，决定动员教职员自己动手，一面教学，一面开荒种地，克服供应的困难。蟠龙人口少，荒地很多。党委号召每人开荒一亩，每队种菜二亩，要求各队支部保证完成，力争超过。抗大从第三期起，学员队支部就公开了，这次开荒，支部领导起很大作用。如各学习组间，区队间和各队间互相提出挑战与应战，党、团员带头，搞得热火朝天，革命青年有朝气，谁也不愿落后。但因没有劳动经验，学员几乎百分之百都手上打了水泡，有的打了好几个。学员说，这是我们学习红军光荣传统的成果；有的说，校歌里唱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应说到做到；还有的学员说，我们进抗大，不仅在课堂上学，还要在实际劳动锻炼中，成为一个抗日的坚强战士，这样才能算真正的抗大学员。

我们四大队开荒种地，获得许多劳动果实。各队种的菜有：菠菜、茄子、水萝卜和小白菜等。四月下旬五月初，就吃上了自己种的菜。全大队开荒近千亩，种有小米、高粱、玉米，秋季可望收到十几万斤粮食。但未到收割季节，我调离了四大队，队长由罗华生同志接任。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

三大队住瓦窑堡，即陕西省的子长县，离延安一百八十华里。该县当时还是国民党管辖的区域。国民党的县长田杰生很顽固，派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住榆林的步兵一个团和骑兵营，由上校团长胡道通率领，五月中旬开到瓦窑堡，要抢我三大队的住址，有意与我军闹磨擦，当时情况很紧张，积极准备战斗。中央军委令调我去指挥三大队抗击国民党的磨擦，罗瑞卿副校长找我当面指示：“要充分作战斗准备，但我们不先打第一枪，为消除磨擦需要想方设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切服从于抗日战争。”我到职时，三大队党委为造成声势，便于反磨擦，即全大队整队出城，列队欢迎我，并开了欢迎大会。三大队八个学员队，编二个支队，学员九百一十二名，都是来自全国的知识青年，有一部分国民党军初级军官。原大队长方正平，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已调，现有政委黄志勇、副大队长郭林祥、训练处长胡汉标、副处长任白戈、政治处副主任邓可运等同志。这些同志是大队党委委员，我提议开个党委会，传达中央军委指示和罗副校长对我表示精神，讨论对策并请同志们谈谈目前斗争的情况。黄志勇同志主持党委会，首先听了陈钦、聂凤智两个支队长汇报。他们说：自国民党的八十六师部队开来后，学员因没有打过仗，情绪很紧张，各队都做了防御工事，白天上课，晚上加强岗哨。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冲突。他们贴出标语要我们退出市区，我们也贴标语：你们应开上前线打日本！党委讨论的对策是：对国民党军八十六师部队，加强统战工作，做到“既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军事上加强战备，但力争不要打起来。我提议以我个人名义写信给胡道通，看他如何表示。信的内容：现在处于民族危亡，我们两党两军不应该有磨擦，要国共两党合作，领导抗日战

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并提出我愿意同他会面商。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参谋把信直接送给八十六师的上校团长胡道通。胡看信后，表示同意与我会见，他提议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县政府见面，田县长也参加。二十八日上午，我同黄志勇政委，带二个随员准时到了县政府。胡道通团长、田杰生县长，在衙门前迎接，到会见所，互相讲了些见面话，接着就谈：抗日战争与民族团结的问题。我说，只有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抗日军政大学训练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根据我党中央指示，作短期训练后，就到抗日前线去，胡团长是指挥官我相信会赞成，相信田先生也不会反对的。我说完他二位说了些赞成的话。接着，黄志勇政委说，我们刘大队长才到任，明天下午三时开欢迎宴会，特请胡团长、田县长出席。胡道通满口答应说一定去；田杰生支吾了一会说：我同胡团长一起去。果然他们二个都来了，在酒宴间，田杰生提出第二天下午，县政府办酒席欢迎刘大队长，请各位作陪。第二天上午发了请帖。我们研究留郭副大队长、邓副主任指挥部队，提高警惕以防意外。经过几次的来往，发现胡道通这个人还较开明，愿意同我们团结抗日。六月三日，他主动找我和黄志勇政委私谈。他说：已同田县长谈了，以团结抗日为重，应该消除隔阂。他已报师长建议开回榆林。六月六日，他请我和黄志勇同志吃饭，田杰生也到了。他说：师长命令部队开回榆林，明日开拔。我们表示欢送。经过这段统战来往，做了不少工作，瓦窑堡的国共磨擦问题消除了。

三大队奉命由瓦窑堡转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国内形势是投降的危机加深，国共两党磨擦加剧，大资产阶级一部分动摇，这是由于日本诱降及国际压力所致。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与华中游击战争及巩固国内团

结，克服投降危险，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决定抗大和陕北工学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向华北敌后迁移，到敌后办校，加强抗日干部的培养，统归罗瑞卿、成仿吾同志指挥，七月上旬东渡黄河，延安仅留抗大第三分校。校首长为便于战斗行动，各大队改称为团的番号，我们三大队改为抗大第三团。抗大三团、四团组成前卫纵队归我和罗华生同志指挥，于七月九日原地出发，以四天行程到达延水关，渡过黄河，进到吕梁区的永和县。因汾河水涨不易徒步，情况发生变化，即令返回黄河西岸北上，取道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以北地区再次东渡黄河。我团渡过黄河后，经临县进到~~县~~^汾集结休整了几天，准备通过同蒲铁路敌人的封锁线。抗大三团原是前卫团转为最后的掩护队，我团及“联大”（陕北工学）为第三梯队，于九月二十三日晚由一二〇师派的两个营，掩护我们通过同蒲线。罗瑞卿副校长带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进到同蒲路东滹沱河上游来接引我们。于七月十日，胜利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的陈庄地区，这是一个小长征，足足行程两个月。

在转移行动与战斗中，学员得到很实际的锻炼，以前存在的松懈散漫现象大大克服了，特别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方面收获很大。我团在灵寿县的陈庄、女庄和牛庄约驻三个月，进行训练，成效很好，特别是战术方面，得到了实际考验。晋察冀边区是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较健全，物资较为丰富，军区对我们很关照，被服服装得到补充，生活给养大大改善，使全团的教职员的体力有所增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毕业典礼，分配学员到八路军各部队去工作，从此结束第五期。

敌后平原的抗大三团

党中央为了坚持敌后的平原游击战争，令我率抗大三团到冀

中平原负责训练八路军三纵队（东北国民党起义部队）的连排干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率抗三团的教职员由灵寿县的陈庄出发，经唐县，于二月四日晚，在望都附近通过日寇封锁的平汉铁路到达冀中平原，进到安国、蠡县地区后，二月八日，在博野县的大平村，找到三纵队司令部，见了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一，首长非常热情，请我们吃饭，欢度春节。吕正操司令员说：三纵队是年轻的新八路，大部分连排干部是由国民党东北军起义部队的战士提起来的，一部分是由冀中平原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提拔的。在冀中平原训练干部，是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训练，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部队，必须适应战斗环境，才能训练好干部。程子华政委指示说，在敌人据点之间训练干部，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冀中的人民抗日情绪很高，是非常坚决的，而对付敌人的办法也很多。抗大三团的同志把群众工作做好了，就能在敌后平原办好学校。开始工作是有困难，组织体制扩大，加重了抗三团的责任。八路军三纵队原来的教育机构不很健全，三纵队首长对我们很信任，把教导团的工人大队、游击干部大队、炮兵大队和冀中一、二、四军分区的教导队均归并抗三团，共有学员二千五百余人。因为敌后平原情况紧张，不能在一个村庄住着训练两天，而需经常通过敌人据点转移，且只能在黄昏后才能转移。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战斗了两个多月，在平汉铁路保定、石家庄以东的深泽、深县、安平、饶阳、安国、蠡县、博野、武强、肃宁、河间、高阳等县城内，都驻有日本军队和伪军，并在大集镇和交通要道上筑有碉堡守备。但广大农村的抗日人民十分爱惜八路军，我们抗三团就在上述地区内活动。我们部队一进村庄，村长立即派人骑上自行车，到敌据点周围看着敌人，若敌出动向我宿营的村庄前进，赶快跑回来报告，部队到黄昏转移时，各村庄都专门准备了带路人，一村转送一村通过

敌人的据点，部队一进村庄布置宿营时，群众主动腾出房子，烧熟了炕让给我们睡。经过一段实践，训练干部确有困难，三月下旬，纵队首长令转移到平汉铁路西的行唐地区，背靠西山，面向平原。抗大三团团部在秦家台，五个大队分布在周围的村庄，四月一日正式开课。但经常要到平汉铁路东去背粮，有几次遇着了敌人，与敌进行激烈的战斗。

一九四〇年的六月一日，是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四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在秦家台开了盛大的纪念会，同时又是第六期的开学典礼。这次大会的动员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在议事日程里有阅兵与分列式，有各种体育表演、各种军事动作和炮兵操作表演。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亲临检阅，部队派了代表参加，印度援华团的柯棣华、巴思华同志也参加大会。这次大会开得较隆重，在敌后的平原办学校，把抗大的旗帜插到冀中的平原，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通过正太路 南下太行山

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变化，国民党军队退至四川峨嵋山下，蒋介石躲在重庆“名为抗日实是反共”，与日寇勾勾搭搭，由“联共抗日走向反共抗日”，最后是“不抗日而反共”。日寇和伪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兵力，都对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我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也大大地发展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加的巩固和扩大，广大人民对日、伪军斗争更加坚强起来，反对日寇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央、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抗大培训干部的任务分配和抗大的组织体制，重新作出了决定。抗大总校设在太行，随着十八集团军总部，一分校设山东，二分校设

晋察冀，三分校设延安，四分校设华中，五分校设山东，六分校设太行，七分校设晋西北，共设七个分校。中央军委、抗大总校令我率抗大三团的干部南下，接受新的训练任务，现训练的八路军三纵队的学员，移交给二分校负责。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从秦家台出发，经灵寿、平山地区于十五日进到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以北的岔口集结，冀南军区派警卫旅第二团掩护我们通过正太铁路敌人的封锁线。八月十六日晚，在娘子关与井径间通过时，东面突然开来一列火车，向太原开进，因掩护的部队退回来未过去，我们又回到岔口。八月十七日休息一天，党委开会决定十八日晚上通过铁路，除掩护部队外，我团本身也组织部队加强掩护的力量，副团长聂凤智同志负责指挥。八月十八日晚上，改在娘子关以西的榆次通过正太铁路。这时正处在百团大战的前夜，敌人警戒很严，我们通过时，敌以浓密火力射击封锁，机关枪、六〇炮拼命地打。我们在敌猛烈火力下胜利的通过了，只青年干事兆西同志负轻伤，被敌火打伤几驮载行李的骡马。过正太路后，掩护部队归建，我们进入太行山地区的东冶村，休息一天后继续南下，于八月十日进到延霞庄，即总校的住地。总校滕代远副校长，非常热情地接见我们，指出：三团同志在敌后冀中平原独立的环境下，进行了八个多月的训练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太行山办六分校

一九四〇年八月下旬，我十八集团军组织了百团大战，向日寇进攻，破坏敌人平汉、正太和同蒲铁路的交通线，消灭沿线守备敌人，取得了很大胜利。九月下旬和十月份，日寇向我太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率抗三团的教职员随总校进行反扫荡的战斗行

动。总校将抗三团人员组成两个大队，由洪学智同志率一个大队去华中，聂凤智同志率一个大队去山东，中央军委命令我留晋冀鲁豫军区筹建抗大第六分校。十一月上旬，我在太行山的五十亩地（村名）离开总校，调往石灰窑（村名）一二九师的随营学校。反扫荡战斗结束后，于十一月三十日，我率随校人员奉命开到河南涉县的固新镇，与抗大第四团会合，以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和抗大第四团合并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其任务是：训练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初中级干部，直属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指挥领导。命我为抗大六分校校长，黄欧东同志为政治委员，姚继鸣同志为分校参谋长，铁坚同志为分校政治部主任，胥光义同志为副主任。

抗大第六分校组成后，奉命开到山西省武乡地区选择校址。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旬，进驻武乡的东沟。一九四一年一月，日寇对太行进行春季扫荡，我们又转到黎城的东、西黄须一带。春季反扫荡结束后，于二月十五日由黎城转到武乡攀龙镇及其附近地区。刘、邓首长指示：抗大六分校就在该地区作基本校址，对各部队送来的学员进行开课训练。遵照刘、邓首长指示，我们六分校校部驻义安村，接收各部队送来的学员。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庆祝抗大第六分校成立，举行第八期的开学典礼。一二九师师长兼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亲临出席，作了敌后训练干部的具体指示。一二九师蔡树藩政治部主任、总校的保卫部吴部长也参加了大会。各部队调来学员二千七百多人，编成四个大队，亦叫四个营，第一营是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是排级干部，第三营是连、营政治干部，第四营是特科大队，即训练炮兵、工程兵和供给管理干部，每个营均是五个连。另有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其一、三营干部，红军占百分之八十，这些学员战斗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低。其余各营的学

员是知识青年，文化程度较高，但战斗经验少。在学习过程中的团结工作很重要，如知识青年接受新事物较好，对课程内容理解较深透，因此有骄傲情绪。但老红军很看不在我眼里，说讲漂亮话不行，到战场上才能显出硬功夫。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新老干部团结是很重要的问题。参谋长姚继鸣同志是知识分子，国民党旧军官出身，马列主义水平较低，旧军人的习气很浓厚，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我和黄欧东同志有交代，要团结他，促使他政治上进步。姚继鸣同志对黄欧东同志不太尊重，他的脑子里只有校长没有政委的观点。如行军中要按校长、政委、参谋长的次序行进，校长不上马，都不准骑上马。黄欧东同志不讲究这一套，他骑他的马，姚就不满意，说他不尊重校长。如四月下旬，一天清早姚主持会议，我和黄政委进操场时，姚发出“立正”口令向我报告课目和到操人数。操作完后我讲了话，请政委讲话，黄说不讲，队伍值星员带回，排以上干部留下。黄在干部中说：“今天会操的动作、精神都好，但不突出政治，也可以说没有政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要这一套，而且坚决反对这种单纯军事观点。……。”姚继鸣听着当时就受不了，一出操场就对黄说：“黄政委今天宣布了我的政治死刑。”黄回答说：“我们八路军根本用不着你这一套。”他二人顶吵起来，我和胥副主任都说，回去把问题谈清吧。一回校部，黄跑到我那里说：校长，吃过早饭开党委会。我说：好吧，但希望欧东同志冷静些，刘、邓首长有交代，不要忘了团结他，今天你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一会，姚继鸣同志到我那里说：校长，我不能干了，向你请假回师部去。我说：不好，我们都是党委委员，有问题可在党委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你回师部不做工作是错误的。早饭后，开校党委会，双方各坚持自己的意见，都没有作自我批评。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对黄、姚二同志作了批评，我指

出这次发生争吵主要是黄歇东同志这种做法不对头。最后，党委研究允许姚向师党委、刘、邓首长写报告，但必须好好的工作，校党委亦向师党委会如实反映。师党委很重视，专门找我三人出席师党委会，解决黄、姚二位同志的纠纷问题。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是抗大成立的五周年。在纪念母校五周年，以推动学习的同时，准备出席师召开的“九·一八”运动大会，进行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各项比赛项目。校运动会开了三天，各方面的成绩都比较好。结束后，因武乡区域的粮食发生了困难，全校人员开到和顺县大背粮。正遇着日寇大扫荡，我们全校人员就在太行第二军分区和顺、榆社区域内参加反扫荡战斗。这一个月不能进行训练，并有些伤亡。由于全校人员的顽强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反扫荡战斗结束后，全校人员由和顺背粮食回到分校原住地。为选派代表队出席“九·一八”的全师运动大会，于九月五、六、七日开了复选运动会。由于学校成员都是部队选调来的学员，质量比较高，条件比部队好，经过初选与复选出来的代表队，再加上刻苦训练，各种准备工作较充分，军事、政治、行政方面配合得好，所以在师“九·一八”的运动会各项竞赛项目成绩优良，在全师十多个参加比赛单位中争得第一名，但缺点是形式重于内容，射击、投弹落了后。

二、三八六旅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对太行的冬季扫荡来势凶猛，用“铁壁合围”的战法，几路齐头并进，非常残忍。在此情况下，学员队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以麻雀战的形式来对付敌人的扫荡。在分散战斗活动中，学校教育大有进步，在理论联系实际、做好群众工作、与敌战斗中，都有很大成绩。

我六分校这一期本在十二月下旬即可毕业，但因一年来敌人几次扫荡，消耗了许多时间有些教学课程没有完成。为使受训干部毕业后回到部队能真正胜任、称职，刘、邓首长命令增加两个月的学习时间，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毕业。这时我接中央军委命令调离六分校，到三八六旅工作。又因日寇对太行采取“铁滚”扫荡战术，我不能立即离校，要指挥全校教职员反扫荡战斗。一九四二年二月，我离开六分校，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

参加“冀浮”战役 开辟中条工作

我奉命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任副政委。原来的政委王新亭同志调任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聂真同志是豫晋地区党的领导同志之一，他兼任三八六旅政委，一九四二年二月，我随邓小平政委一起到王家裕，率领七七二团通过白晋公路封锁线到太岳地区。太岳纵队司、政机关住沁阳县的阎寨。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给我谈话交代任务后，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岳南的西裕村到职工作。我到旅时，仅有周希汉参谋长、张祖谅政治部副主任二人管工作。调王近山任旅长还在冀南，尚未到职；聂真同志是豫晋联防区党委书记同王新亭同志率十七、十八团和决死纵队的五十七团在中条地区。十六团住东裕村，七七二团原在太行王家裕，归建后住西裕附近靠近旅部。我到三八六旅时，正值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阎锡山派其六十一军进占我冀氏、浮山地区闹磨擦。邓小平政委到太岳军区主要是组织“冀浮战役”打击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三八五旅从太行调来参加这次战役。太岳部队参加这次战役的有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和二一二旅。纵队首长命令由李聚奎、刘忠、周希汉三同志统一指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发起“冀浮战役”。仗打得很顺利，三八五旅和决一纵队均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我七七二团攻击进

到四孔山的敌人，歼灭敌人一个团，十六团和二一二旅一部攻击进到四十里岭之敌一个团，把敌人大部歼灭。残敌窜回其据点内，三月二十日，该战役结束。我们部队开回原地，我十六团还在郎壁地区打了红枪会，尔后开回东裕村进行休整，作“冀浮战役”的战斗总结。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我随邓小平政委去到中条山，七七二团二营护送。五月七日到达中条暖辿与王新亭、聂真同志会见。国民党三十八军孔从周同志派来的参谋长（姓名忘了，共产党员）与邓政委在暖辿见面，主要商谈三十八军起义的问题。关于开辟中条山工作，邓政委听王新亭、聂真同志汇报情况后，就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开辟中条和豫北地区很重要，建立豫晋联防区，以刘忠同志兼联防军区司令员，聂真同志兼政委（联防区党委书记），统一指挥十七团、十八团和决死队的五十七团。王新亭同志回太岳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中条、豫北的情况很复杂，既有日军、伪军李正德、董学义，又有国民党汪派的张伯华，还有蒋介石从洛阳地区派过黄河北岸来专闹磨擦的什么龙营、荀营，另有当地土匪部队、红枪会和地主武装等。我们五月七日到暖辿，日寇九日早晨就以三路进攻中条，来势汹汹向暖辿猛扑，我率十七团一营掩护指挥机关，在进攻敌人的空隙转到豫北地区，靠近十八团。接着日寇又转向进攻我十八团，我们又转回到中条山的黑虎湾。刚开展工作两天，敌人又以四路向黑虎湾进攻，我们又转到柴圪塔、李圪塔和雪泉岭地区。敌紧跟进攻，我们又绕圈转到上河。这样反复来回二十多天，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五月的下旬，敌人以六路进兵，包围上河。我们得此消息后，立即行动，连夜转移到东、西川，侦察人员跑来报告西川敌已占领，我即指挥部队掩护，从一条深山沟里串到东方蒙蒙亮，可是此处又遇着敌两面夹击，在浓密的敌火下冲出

重围转到垣曲的大山内五里坡、尖山子的小山村庄才稍事休息，骡马行李、伙食担子全部隐蔽在深山，随身携带的粮食已吃完。忽然间天下大雨，敌人才停止追击。我们趁蒙蒙的大雨通过李家河，翻过十里坡的大山，经过垣曲县的同善镇，进到中条有名的大历山才停下休息。

部队拖得十分疲劳，又饿着肚子，大山里没有人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会被困死饿死的。于是派一精干小队护送邓小平政委、王新亭主任和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长去岳南，尔后我们西进至绛县、闻喜地区使敌发生错觉，待敌追此地区时，以“敌进我进”的办法，我突然东进至阳城的董封、下川一带，结果胜利地渡过了这一危险的关头。我们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化装成伪军，潜入内部弄清敌情，结果成功地抓到十几个汉奸、特务和敌探头子，罪行严重的，即开群众大会，宣布其罪状当场枪决，大部分当场释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把中条山周围几个县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把山西的阳城、绛县、垣曲、豫北的济沅、沁阳等县连成一片。到八月份先后把各县的抗日人民政府建立起来。把垣曲县同善镇一股土匪武装收编为抗日游击队。绛县、阳城的地主武装已肃清，济沅县尚庄李正德这个伪军头子很顽固，把他孤立起来了，通过地下党关系争取了沁阳伪军头子董学义。名为伪军，实则靠在我们一边，为我们控制。

我军把中条山的局面打开了，豫晋联防司政机关设在柴、李圪塔，以中条的析城山为依托。一九四三年二月，由于太岳地区重新划分，把豫晋联防军区编为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调唐天际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奉命调回三八六旅任政委兼太岳第二军分区政委。在开辟中条的工作中，有三条重要的经验，体会很深。

第一，敌人向我进攻时，“该躲则躲，该打则打，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是战胜日寇进攻很重要的一条。中条山与敌

作战，在粉碎敌人的进攻中有两种思想。以聂真同志为首者主张躲而不主张打的思想，并且老开党委常委会讨论战斗行动，但“决而不行”。我是指挥员，区党委决定我是遵照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他又变卦了，在战斗行进中又停下来开会，说保险点好呀，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说他是“开会亡国，决而不行，是橡皮结论”。有一次我很不冷静，向他们要脾气，把作战地图、望远镜交给他们，不干了。在紧张的战斗情况下，为战胜敌人，完成开辟中条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作为一个指挥员，决心果断是对的，但要态度摆担子是错的。回旅时，在区党委常委会上我作了自我批评，向他们道歉。他们对我很谅解。

第二，关于肃清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坐探问题。应该“对敌狠，该杀的杀，证据确凿、罪恶严重的一定要杀”。我们把敌人几次进攻粉碎后，在中条区域内，抓了十几个当地的汉奸、特务和日本坐探。区党委常委讨论处理时，有不同意见。后经区党委扩大会讨论，还征求一些基本群众的意见，才决定开群众大会，枪决了好几个证据确凿、罪恶严重的汉奸、特务分子。这样一下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没有人敢再去当汉奸、特务、日伪军的坐探了。

第三，关于争取红枪会头子站到抗日一边的问题。在中条垣曲县之落凹，有一个红枪会头子叫张松文，其势力很大，有四千多会员受他控制，並与国民党军龙营、荀营有来往关系。但荀营同志通过当地一个倾向共产党的吴忠礼与他接上了头，我提出：以联防军区司令名义接见他，争取他站在抗日一边，同时利用他做国民党军龙、荀营的工作。讨论时聂真、李哲仁同志有些顾虑，不是很同意。但魏衡、杨柏生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就以联防军区司令的名义接见了他。结果通过他利用红枪会力量，开辟垣曲地区的工作非常顺利的进行，利用他与国民党军龙、荀营的关系，

做了团结抗日工作，提出“你不反我，我不反你”这个条件，他们接受了，在开辟中条抗日根据地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

三、太岳第二军分区

太岳第二军分区在岳南地区，辖长子、高平、晋北、晋南、阳城、沁水、土敏等七个县。以端氏为中心（土敏县政府地址），分区司、政、后机关和地委，设在端氏周围的杏岭、娄底、尚庄、郭壁一带。这个时期的野战部队均兼地方军区的工作，如：陈赓同志任太岳纵队司令员，也是太岳军区的司令员。我们三八六旅兼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同志，也是三八六旅的旅长。一般的都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但我们分区的地委书记薛迅是女同志，所以没有兼分区的政委。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周希汉同志，政治部主任张祖谅同志。我旅另一特殊情况，保留了山炮连（四门山炮）、工兵连和骑兵排，这是准备恢复野战旅进行运动战、攻坚战时使用。但当前日寇对我分区扫荡，保护炮是一个负担，至少需用一个坚强的步兵营作掩护。如一九四三年日寇的夏季扫荡，我们用七七二团第一营掩护山炮连向阳城以西的山区转移，其余部队、机关均东进到敌占区去活动，用“敌进我进”的作战方法与日寇作战。山炮不能随部队进到敌占区，一营营长卢兵杨同志说：搞得不好还有危险，有时可把炮兵分散随步兵行动，有时可把炮暂埋藏起来。我们同意他提的意见，如敌秋季扫荡用的是“梳篦战术”，而我们就将山炮埋在深山的沟里保存，敌人扫荡粉碎后，把炮收回。

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的狡猾。一九四三年冬季扫荡是集中兵力，分区清剿，以多路向我分进合击。我们对敌扫荡的战斗方法，还是把炮埋藏起来，步兵和指挥机关分路

向敌占区转移。周希汉副司令员率二十团进到长子地区，士敏独立团分散在分区内地掩护群众打游击，我率分区机关以七七二团的第二营掩护，日寇进入我分区的腹地，我就转移到晋南，接近敌占区的司家山活动。这时日寇发觉我们转移到了司家山，就以四路重兵紧紧地包围我们。敌人整整攻打了一天，我七七二团二营的指战员英勇顽强与敌战斗一天。由于筑时防御工事，部队伤亡很小，我们顺利突出了重围。但我二十团在长子县的团城，被敌合围，受到一些损失。敌人这次扫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向其据点撤回，我们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用 榴 瓣战术的扫荡。

开辟豫北 巧取尚庄

一九四四年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没有对我区进行扫荡。这年部队进行大练兵，集训干部，准备开辟工作，向敌占区发展。我分区领导成员有所调动。一九四四年四月王近山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率十六团西渡黄河前往延安，到陕甘宁边区任新四旅的旅长，我被任命为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薛迅同志（女）兼任分区政委，周希汉同志调延安学习，张祖谅同志调太岳第三军分区任司令员，七七二团随他到三分区作骨干。我分区骨干部队，由冀南军区调来第二十团，另建立了士敏独立团、各县的县大队。我们分区还有一支很坚强的武工队，经常深入敌占区收集敌伪情报并做敌伪军的反正工作。

部队冬季大练兵时，延安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响亮号召。各解放区部队怒涛巨浪般地向着敌占区发起强大的攻势。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我们部队整训快要结束时，纵队首长命令“太岳军区第二、四军分区

部队由刘忠、陈康二同志统一指挥担任开辟豫北的任务。七七二团第三营和山炮连，归回二分区，参加开辟豫北的作战任务。当时豫北的情况是：日寇已缩到沿交通线的新乡、焦作、济源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去了，伪军成为日本鬼子的第一线外围。我们开辟豫北主要打击张伯华、李正德这两股最大的伪军，攻占尚庄。西万庄的伪军董学义，到适当时间可通知他起义。

我将开辟豫北的任务传达到部队后，全体指战员十分振奋，因我旅曾三次攻打尚庄未克，部队伤亡大，吃过李正德的亏，这回可要报仇雪恨了。对于怎样打的讨论中，发扬军事民主，有的主张一进豫北就攻打尚庄；有的主张先让一步，争取好的伪军先行起义再攻尚庄，有的则主张先来一个内部开花，钻进敌人的心窝去，消灭张伯华，打下杨毛庄，回头再攻打尚庄。我们对这几种意见，慎重地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若先攻打尚庄，会震惊其他小股敌伪军，逃入敌人大据点内或化整为零散伙了，张伯华可能闻风逃过黄河南岸去。这样我们抓住一个，却逃了十几个，豫北开辟不好，人民群众仍受敌伪的摧残。同时我们对尚庄李正德的具体守备情况，还了解不透，战斗起来可能旷日持久，这会贻误战机，对我不利。至于先让一部分伪军起义，此时条件已完全成熟的只有济源西万庄的董学义部，该部位于尚庄的东南，杨毛庄东北，与李正德、张伯华成鼎足之势。若我军未到，就叫他宣布起义，必将遭受比他力量强大的张伯华、李正德夹击，其结果对我开辟豫北不利。经过反复的研究，认为先打杨毛庄，消灭张伯华为上策。张伯华、李正德并称豫北伪军中的两霸，但在日伪面前，张伯华是汪记国民党的正统，有名的伪县长，比李正德得宠，若论实力，张伯华则不如李正德雄厚。张、李之间一直勾心斗角，只要枪弹打不到自己头上，谁都会“隔岸观火”，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充分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我

们决定推迟董学义的起义时间，让他周旋于张、李之间，两面煽风既可麻痹张、李，亦可充作我军的耳目。为了给李正德造成错觉，行动之前，我们故意让董学义给李正德透露：八路军打不下尚庄，这回要打杨毛庄了，李正德听说八路军要打张伯华，正中下怀，幸灾乐祸地向董学义说：“这下张伯华那小子可该倒霉了，鹬蚌相争，咱等着瞧吧！”于是他向其部队传令“此次八路军南下，意图不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张伯华听闻我军进军豫北的消息，要先进攻他是半信半疑，与董学义说：“八路军一向谨慎，他们真要舍近求远，孤军深入么？我看是声东击西，其中可能有诈！”董学义表示称赞他的看法，使张伯华更加麻痹。

张伯华盘据在黄河北岸的孟县杨毛庄，从尚庄南去还有七、八十里，中间隔着沁河，两侧有日本军据点。张伯华自恃前有李正德挡着，两边有日本人抗着，认为八路军到不了他的杨毛庄，一向是高枕无忧，疏于防范。四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正是“星星不明月光暗”的时候，我率二十团、七七二团第三营、晋南县大队和山炮连、骑兵排，由士敏的窦庄出发，经晋城以南的天井关，沿着尚庄东侧急进。伪军李正德果然佯装不睬。我军当夜渡过沁河，通过日寇据点，在杨毛庄外围与四分区的部队会合，同时四面围攻杨毛庄，黎明前接敌，拂晓发起攻击。整训后第一仗，战士们十分勇猛，激战不到一小时，就一举全歼汪记张伯华伪军，俘虏一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余支，可惜张伯华这个汉奸头子逃走了。

开辟豫北的初战告捷，部队情绪更加的高昂，“消灭张伯华，拿下杨毛庄，趁热打尚庄”，不少的干部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凭着当时部队的锐气，立即就去打尚庄未尝不可。但考虑到李正德可能已有戒备，同时我们对尚庄的设防、工事构筑还没有确

实侦察清楚，若盲目硬啃，必将化费很大的力气。因此，我决定先把尚庄外围的小股伪军肃清，以孤立李正德，待确实摸清他的底细后，再决定对策，或争取他起义，或攻占其尚庄老巢。在这一部署下，同陈康同志商妥，四分区的部队挥戈西进，将尚庄西南的伪军据点扫清，直逼济沅城下，监视济沅城内日寇的行动。二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临沁河，突然进到尚庄东南的西向、义庄。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迅速进驻到尚庄东北二十里的紫陵。此时，尚庄周围的大小据点，均被我军占领，伪军一部被歼，大部投诚了我军。早已退缩进大据点的日本鬼子，这时也惧怕我军的声威，不敢轻举妄动，李正德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

李正德原是豫北的一个占山为王的大土匪头子。抗日战争初期，他收罗了一批流氓地痞，集拢成股，伪装抗日，招摇撞骗，敲诈百姓。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摇身一变，当上了济沅皇协军的司令，成为日寇的凶恶爪牙。他盘据在紧挨太行山南麓的尚庄，西靠沁河，南旁济（沅）、沁（阳）公路，尚庄虽只有五、六百户人家，却筑有二丈多高、五尺多厚的土围墙，墙外有壕，墙下有暗碉，李匪平时戒备森严，我军侦察人员进不去，向我报信的群众出不来，只要发现某个百姓稍有嫌疑，非杀即关，李正德凭着深沟壁垒和日寇给他的优良装备，凭着他手下掌握近二千武装，控制着周围五、六十里宽的地面，虎视眈眈，为日寇把守着豫北“治安区”的大门，扼住我太岳部队进出豫北的咽喉地带，我旅曾三次攻打，均因其据守顽抗和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未能攻打下来，对豫北敌伪军争取工作，也受到影响，李正德这个汉奸头子也因此更加狂妄起来。

我们消灭张伯华之后。李正德确实高兴了两天，以为这一下真可以独霸一方了。当时，我们曾通过董学义捎信给他，让他反

正，他哪里听得入耳呢？悍然回答说：“我不是张伯华！”但到我们再打西向、义庄的伪军时，他就沉不住气了，急忙派人探听我们的意图。一天上午，一个自称是李正德的政训处长的家伙要求见我。我特意在主攻部队二十团团部很客气地接见了他。这个人满脸奸笑，真是一个“说客”。我告诉他说：“日寇已经日落西山了，你们是中国人应该回头，考虑后路，告诉李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这个家伙听不进去，嗯啊了半天，才推托地说：“刘司令说的话，我一定同李司令转达。”我又接着说：“我对你们李司令的历史非常清楚，只要他诚心改过，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坚决与人民为敌，那我们是不能宽容的。”李正德本来派他的政训处长前来摸我们的底，主要是了解我军是否要攻打尚庄。我们的态度明确得很，先礼后兵，可打可不打，选择的权利在于他，而不是在我。这个家伙明白过来了，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那是！那是！刘司令的指教，小弟回去立刻禀告李司令，磋商就绪后，便来回话！”

李正德派来的代表走了没多久，我们从董学义部派去尚庄的两个人也回来了。有一个是我们打进董学义部队做瓦解工作的同志，这次他们去尚庄，是以董学义的名义去劝李正德起义的。他们汇报说：“李正德部队的下层已经很动摇，就李正德本人也惶惶不安。但因为没有摸透我军的企图，不愿随便摊牌，估计还有徘徊不定的心理。”据此，对李正德的政治瓦解工作还可以继续进行，但必须明确军事上要积极准备攻打尚庄。在战斗行动之前，需保守军事秘密，并故意示弱，以麻痹敌人。我们隐藏了所有的重武器。并令部队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又组织了一部分带来的民兵，装模做样地开回岳南，还在当地群众中散布我们部队另有战斗任务，即日将返回分区。显示我们不是强大的攻坚部队，也丝

毫没有进攻尚庄的样子。

过不两天，那位政训处长又骑马而来，不出所料，他一见面恭恭敬敬地表示亲切，说：“我们李司令对刘司令很钦佩的。”他除了还是吱吱唔唔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外，一双贼眼四处乱溜，忙个不停，我们故作麻痹，不仅显得毫无戒意，而且还邀请他到部队驻地随便参观。这位李正德的得力代表，真象“蒋干过江”一样，时而惊喜，时而狐疑，时而指东划西，时而沉默不语。最后，大概他自认为偷到了什么“秘密”。竟然兴奋起来，向我告别而回尚庄。隔了两天，李正德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要我派人到他那里去谈判，看来李正德并不完全满足他那位处长的报告，决心要亲自出马。这可能有两个企图：第一，通过谈判进一步的试探我军的动向；第二，准备在尚庄显示他的威风给我派去的代表看，好讨价还价。我立即回信给他，明天上午准派代表去贵处进行谈判，经党委研究，决定派我特工科长雷起云同志化为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直属队总支部书记范离同志化为宣传科长，侦察股长王传训同志化为秘书，二十团一连连长陈梦华同志当随行的警卫员，乘此正好摸清尚庄地形和碉堡、工事构筑的情况。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谈判代表乔装整齐来见我。我对他们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欢迎他掉转枪口共同抗日，严肃地向他指出，只有起义才是出路。但对我们不能太老实了，李正德想尽一切方法要摸清我的虚实，我们也要趁派代表去谈判的机会，把尚庄的布防情况切实摸清楚，你们尽可能地记下他的布防，派王传训、陈梦华两同志去，就是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你们一定要机智、灵活，不能让他有所警觉。敌人提出的要求不轻易答应，但也不能断然拒绝。敌人若真有诚意改邪归正，我们一定表示欢迎。”当天的上午，我们的谈判代表，就气宇轩昂地进到了李正

德的老巢——尚庄。

李正德果然在我们谈判代表经过的路旁，以欢迎的形式摆了队伍，排列着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地显示他的力量。王传训、陈梦华两同志就特别注意察看敌人的武器和地形。李正德貌似很有诚意地接待我们的谈判代表。正如我们所估计的，他提出四个互相矛盾的条件。头两条说得可好，声明他脱离伪军，换成八路军的旗号，听我们的指挥。后两条却说不能把他调离尚庄，要求我们不派人进他部队里去，更不能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李正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已经非常清楚了。在谈判中看出他起义是假的，摸清我军行动情况，企图顽抗到底，是他的真实目的。

此时，我们攻打尚庄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为了给李正德最后一个自新的机会。党委会决定以我个人名义写信给李正德，要他亲自与我见面商谈。会见的时间、地点由他决定。李正德接我信后，回信表示同意，他提出会见的地点在对峙的中间地带一所学校里，双方互派代表和相应的卫队。时间约定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

我们两套方案都准备好了。部队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一声令下即可出动，政治部门写好了宣传提纲，印刷了大批的标语、口号，宣传队还排了演出的节目，若谈成了，部队开进尚庄，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准备改编其部队，但十分之八谈不成。因此，做好攻占尚庄的战斗部署。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双方的代表准时来到了中间地带的学校会场，但李正德本人没有来。他的代表说：“李司令正在处理一件事情，随后就到。”但一直等到下午二点他还没有来。他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溜走了，都说回去看看，但只去不回，最后送来一个纸条子说：“今天有事，改天再谈。”李正德把我们的宽宏大量当作软弱可欺。为了最后麻痹李正德，

使他放松戒备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又回他的信表示同意“改天再谈”。把他们的代表人员送走后，我们就在这个会场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布置立即攻打尚庄的战斗行动。

部队正在进行战斗动员，忽然接着军区的电报，传来了我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会的消息，我们立即传达，全体指战员精神倍增，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坚决打下尚庄！活捉李正德！以战斗胜利来庆祝“七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万岁！部队连夜出发，拂晓前，进到尚庄东面的一个村落，站在桥头外壕的敌哨兵，刚问了一声口令，就被二十团尖刀班的战士炸倒了，接着尖刀班用炸药炸掉了敌人的桥头地堡。这时，突击连长（谈判时化装警卫员的）带着他的部队，避开敌人的火力射击，绕道接敌，掏墙越院进到尚庄西侧，我重机枪、迫击炮、山炮迅速占领了发射阵地，很快就把火力配备、部队攻击部署布置好了，待天明，发出信号，攻击尚庄。

敌人还在作梦，以为我军象过去攻打尚庄一样，天亮不久就会撤走的。于是他一面盲目地向我射击，一面狂叫，“天要亮了，你们还不走？等一会皇军来了，就要当俘虏了。……”敌人梦想济沅城的日本鬼子会来支援他，以为我们部队同过去打游击一样，总是夜间攻击，拂晓撤退，他们哪里知道在我们攻尚庄的同时，我四分区部队紧密配合，发起了对济沅城日寇的攻击，而且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游击战，如今是集中兵力、火力攻打敌之据点，开辟大片解放区。现在的战斗是：夜间接敌，拂晓攻击，白天好捉俘虏。这就从抗日游击战争转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随着形势发展而变化的战术。

东方刚刚露出亮光，尚庄二丈多高的土围墙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面前，我立即命令发出攻击信号，迫击炮、山炮抵近射击，接

连打几炮，一处打开一个缺口，矮了五尺多。就在这炮声隆隆，烟雾弥漫之际，重、轻机枪一起开火，掩护突击队，扛着梯子、木板、炸药包的战士们，象猛虎一样冲过了壕沟。在围墙的缺口处进行连续爆破，土墙塌下来，成了一个陡坡，突击队就从这陡坡冲进尚庄寨子里去了。这时，邓仕俊分区参谋长带着二十团攻进了西门，七七二团第三营从东北角上突进尚庄。敌人失去了围墙的依托，寨子里无险可守，巷战不到二小时，把寨子里的敌人全部歼灭了。四月十四日上午十时，我率分区指挥机关，开进尚庄李正德伪军司令部的漂亮院子里。不一会，我骑兵送来一个身穿深兰布长袍子，头上散乱着几根毛的瘦长个，两手被绳子反绑着，弯着腰站着。一个骑兵战士说：“司令员，这是李正德，原来他是从地道溜走的，在我骑兵连追捕逃走之敌时，他混在群众之中，群众告知这是李正德，他还想逃走，我们才把他揪出来。”王传训侦察股长向李正德说：这回可把你请来了，你还要什么条件吗？我叫战士把捆的绳子给他解下，问他：“你这个汉奸卖国贼，在豫北残杀了多少人民，你的罪恶很大，现送你到太岳军区受训，好好交代你的罪行。”这时，晴空万里，尚庄及周围的人民群众热烈庆祝他们的解放！我们在尚庄庆祝一九四五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攻下了尚庄，活捉了李正德，在豫北影响极大。日本鬼子龟缩在济源、沁阳、焦作、孟县等县城和大据点内，不敢再出来扰乱。李正德、张伯华这两股势力最强的伪军被彻底歼灭，其他小股伪军更不敢同八路军对抗，尤其是沁阳西万庄的伪军董学义起义后，他们纷纷地向我军投诚。我军声威大震这对开辟豫北的工作非常有利。打下尚庄之后，我们令晋南的县大队由杨香玉同志先带回分区，并把缴获的战利品和俘虏官兵护送到军区。我率二十团、七七二团第三营和分区直属机关、部队乘胜南下，直到黄河

之滨，活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豫北几个县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济源、沁阳、孟县、温县的抗日人民政府，肃清了敌伪反动武装。因这几个县均有我党的组织，豫北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和巩固起来，成为反攻日寇的坚强阵地。

日寇宣布投降 抗战胜利结束

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上党地区晋晋线的日本兵，开始向平汉铁路撤退了。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于六月二十二日，电令我率骑兵兼程北上，指挥晋南、晋北的县大队和民兵收复晋城，尔后接着北进收复高平。其开辟豫北的分区部队和机关，交由分区邓士俊参谋长指挥，在豫北工作过一段后，率队向晋城、高平归建。我于二十三日率分区骑兵排出发，于二十五日赶到晋城附近。晋南县大队长杨春玉向我汇报说：据晋城送出来的情报称，日寇正在准备撤退，但至今尚未行动。我们在晋城周围活动几天敌人无动静。七月三日晚，由高平方向开来十几辆坦克，当晚日寇开始撤出晋城至七月六日全部撤走。我率晋南、晋北二个县大队收复晋城县，留晋南大队控制晋城，恢复秩序，晋北大队立即随我北进，尔后高平县大队于七月七日逼近高平县。据高平县大队长陈九章汇报说：高平城内的日寇，秩序非常混乱，正向长治撤退中，这两天敌十几辆坦克向长治往返来回开动。我即令陈九章大队长率队进到高平至长治之间积极活动，打乱敌人的撤退秩序，寻找战机歼灭撤退之敌，晋北大队和高平民兵担任包围高平城，分区骑兵排立即出发进至长子县城周围活动并与长子县大队取得联系。高平城的日寇于七月十二日全部撤走，我当天率高平县大队进入高平城。七月十五日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电告说：日军已退出上党，令豫北部队立即北返高平地区集中，待命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下，东度黄河，深入敌后，从敌人手中夺回失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行政区。上党地区主要城市与交通线是为伪军占据，但广大乡村仍在我八路军手中，上党区的广大民兵在我党领导下，觉悟日益提高，根据地日益巩固。上党人民以无穷的人力、物力，支援太行、太岳和冀南部队作战，使我军成长壮大，转入反攻并同全国军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決戰前夕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出：“从整个形势看來，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根据这一方针，在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即发出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并且命令华北、华中各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决心依靠美帝国主义，把人民纳入内战的血海，可是他又害怕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极意玩弄和平的骗局。八月下旬，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同时，继续派遣其部队经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向我解放区进攻。八月底，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二个军，经风陵渡北渡黄河，侵入晋南远城地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三个军，则向河南郑州集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三个军，则向苏北的徐州前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八月中旬，在日、伪军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太原，同时，以其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六十九师，挺进第二、第六纵队，保安第五、第九团等部，共一万七千余人，由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在日军第十四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以南地区，向我晋冀鲁豫心腹地带上党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八月十九日，该敌进占长治城，即潞安府上党的首府。至二十五日，又占

我屯留、壶关、潞城、襄垣四县，企图扩占整个晋东南，摧毁我太行、太岳的根据地。日、阎联军在进攻中使用一切手段，在长子城下竟然施放毒气，使我率围攻长子的两个连的指战员全部中毒。毛泽东同志早已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在他亲赴重庆谈判之前，就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消灭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还指出：“对国民军队作战，必须集中兵力打有准备的仗，打运动战，打歼灭战”。又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三万余人，于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

一、上党战役的三八六旅

一九四五年的七月中旬，日寇撤离上党，我奉命收复了晋城、高平。七月下旬，分区机关和部队进到高平以北的南张店、马村一带集结，待命行动。这时太岳军区首长接到了刘、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命令：恢复三八六旅的番号，以刘忠为旅长、张祖谅为政委，七七二团归还建制，三八六旅以七七二团、二十团和士敏独立团组成，为参加上党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

攻克长子 全歼守敌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初，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刘、邓首长在潞城以西的黄碾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作战部署。刘伯承司令员首先谈了全国的战局形势，接着指出：“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着全国的战局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插进来的

阎锡山军队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会议确定先打长治外围各县城，吸引敌人出长治，消灭敌人于运动之中，然后攻占长治。李达参谋长分配各军区的任务，命令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攻打长子城。会后，陈赓司令员作攻打长子县城的具体部署，并决■一旅的三十八团配属我指挥。陈赓司令员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坚决执行命令攻占长子城。我旅弹药不足，要求补给。他说：“弹药尽量满足你们，但炮弹不会多，主要依靠手榴弹。攻城部队要组织好，特别要讲求战术，以短促的浓密炮火掩护部队一举登城……”。长子城，位于长治的西面，距长治（潞安府）五十华里。这座城不大，但工事坚固，城墙两丈五尺高，城门外有石碉，城角四周有消灭射击死角的砖碉，城角外边设有低碉，每个低碉还设有三个以上的暗碉，可在不同的水平线上进行直射与侧射；沿城墙外有一道三公尺多宽、二公尺多深的护城壕其壕内积水过腰，墙外还有一米多高的铁丝网，主要地段附设有地雷，城墙垛上放有许多手雷，碰着它立即爆炸；在交通要道上设有拒马这是日本鬼子构筑的，阎锡山部队又加以修改了，的确是相当的坚固。

我们带着崇高而严肃的使命，回到旅部的驻地屯留以南的东李高村，和张祖谅政委商讨，确定了各团的战斗任务，召集营以上的干部会。决定七七二团先攻夺长子城北关，而后在北关登城；士敏独立团佯攻东门，应积极行动吸引牵制敌人；二十团、三十八团首先攻占长子城的西关，而后在西门发起攻城战斗，二十团担任登城的主要部队，集中全旅的炮火掩护该团突击队登城。

九月十三日黄昏，我七七二团向北关的敌人进攻时，被前面一座孤徒的小山挡住了去路。这座小山名叫北高庙（山顶上有一座庙），筑有坚固的碉堡，是长子守敌的重要屏障，好比“乌龟头”一样，站在庙上用肉眼能看清城内的来往行人，炮火可以越城

直射到大街上。守敌在蹲北高庙的工事里与我军顽抗，我七七二团发起了四次冲击，都未攻下来，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七七二团团长周学义同志很焦急，也很不服气，“难道七七二团要在长城下丢脸？决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攻下”。这个从内战以来经历无数次战斗的老红军部队，勇敢果断，屡次战斗中攻就攻得下，守就守得住，特别善于夜战，一向有“夜老虎”团的称号。第二天周学义同志在第一连挑出第二排，他亲自训练交代，当晚进行“夜摸”。

九月间，田野肥硕的谷穗弯弯地下垂，树叶渐渐地变黄，秋意很浓了。这天晚上的炮声停息了，只听着秋虫唧唧地低鸣。上弦月刚从太行山那边抬起头，但又被一朵朵的薄云遮住了。敌人守在庙里，因七七二团攻击了两天没有攻得动，就疏忽大意起来。第二排的独胆英雄们，一个个拨开当头的嵩草匍匐身摸爬上小山，二排长一声喊：“打！”轻机枪、六〇炮猛烈射击，一阵手榴弹打进庙内爆炸了，战士们冲进庙里喊：缴枪不杀！北高庙守敌一个排全歼了。“夜老虎团”，显出了真本事，以一个排的兵力攻夺北高庙，砍断了龟头。周学义同志亲率部队攻进北关，敌人慌乱了，退进了城内，七七二团占领长子城北关，立了第一功，这就有力地支援了面西主攻部队二十团和三十八团的战斗行动。

在“夜摸”攻进北高庙的同时，我二十团以五小时的战斗，攻占长子的西城外临城的村庄—西关。部队接近城下，三十八团接着第二十团开进。九月十五日，炮声、机枪声整天不停地响着，我和二十团团长楚大明、政委朱兆林、政治处主任吴效敏，冒着敌炮火进到二十团前沿的观察所，把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同志也叫来了，共同研究登城的部署。我们的战士真灵巧，把观察所设在老乡家的屋脊下，挖一小洞非常隐蔽，敌人根本发觉不了，但视线很宽阔，可以清楚地看清城内，特别是东边城墙上敌人活动情况，这就可以判断敌人在城内的部署。我们在这个隐蔽

的观察所内轮番观察西门的城墙外围的碉堡、工事构筑，在现场制订攻城的战斗部署。我二十团战士正利用村落的房屋挖洞，每个洞直径一公尺，战士可以带上武器、弹药从洞内钻过去，自西向东隐蔽接近到城壕。敌人只监视道路、桥头和开阔地，而却想不到监视村落的房屋，想不到我们秘密地把登城部队运到了城墙下。我二十团是平原生长的，挖洞、爬墙是他们的特殊本领，各团都佩服它。

因为我们的弹药有限，一门山炮仅二十发炮弹，一挺重机枪是一千发子弹。因此，炮火轰击只能“十分钟”。“十分钟”，楚大明同志一字一句地思索着。我加重语气的说：对！弹药有限，只能“十分钟”，并要一次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一瓢水”，要浇死白狗子，就必须是烧开了的热水才能成功，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有严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在战术上，就叫做“一瓢水”战斗吧！二十团的登城突击队，已组成了五个组，即火力组、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和登城突击组。团长楚大明同志连夜到处检查着，干部们计划着，战士们在讨论着。“一瓢水”，“十分钟”，成了登城战斗的有力口号，人人表决心，个个在挑战，这个说，只要火力组封锁住枪眼，我们保证把跳板架好；那个说，只要你们把跳板架好，我们马上送过云梯并树立起来。另一个说，只要你们把云梯树好，我们一定登上城去！等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黄昏，战前的寂静使人不安，盼望而又耽心的时刻就要到了。时间好象过得特别的慢。十九点整。我军两发碧红色的信号弹划过天空，顿时炮声隆隆震耳欲聋。山炮集中炮弹打一点，把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轻重机枪的浓密火力，压住了敌人的发射点；战士们将云梯抬出来，不顾敌人轰击，沿西关街道猛跑抬上前去，他们前面的跳板组胆量更大，一个倒下去，另一个接上，把跳板架在外壕上，掩体内的战士站起来跑到棱线上往城墙内扔手榴弹，在震耳的炮火、刺鼻障眼的硝烟

中，云梯架在被山炮打陷的缺口上，挂满手榴弹端着手提机枪的战士，象猛虎般的扑上云梯。当第一个手握红旗的勇士爬上城垛时，我炮火立刻停止射击，勇士们用手提机枪向城里的敌人猛射，后续部队接着登城。敌人吓破了胆，顾头不顾脚的乱钻，有的神志尚未清醒过来已当了俘虏。“十分钟”，“一瓢水”，成功了。二十团胜利登城，七七二团，三十八团在北门和东门相继登城了。“一瓢水”，难忘的“一瓢水”！这是我三八六旅五个月练兵的胜利，是战士们勇敢、机智而取得的胜利，也是登城突击队五个组密切协同动作而取得的胜利，这标志着从抗日游击战转变为运动进攻战和攻坚战的胜利。

二十团进城后打开西城门，我和张祖谅政委率领指挥所进城了。二十团进展最快，迅速占领了锺鼓楼制高点，控制着全城。他们部队不走大街而在房屋内挖洞钻过，既隐蔽，又避免杀伤，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敌人最后顽抗的据点——长子县衙门，国民党县政府。各团进城后都进行巷战，战士们先打一阵手榴弹，乘着弹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杀扫清残敌，捕捉战俘。敌人缴械了，阎锡山的挺进二纵队司令白映瞻被我二十团活捉了。我旅和三十八团共俘敌官兵一千五百余人，打死敌官兵五百多人，缴获敌全部枪炮弹药和辎重。当夜十二点，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了。在我旅攻克长子城的同时，兄弟部队也先后攻占了壶关、潞城、屯留、襄垣，各路部队均向长治前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三个军区部队，直逼到长治城下，大战潞安府的一场猛烈的攻坚战，就摆在眼前。

占长治北关 老爷山打援

长治城被我军围得水泄不通，我旅已占领了长治城北关。我们正在修筑交通壕，隐蔽接近城墙，准备在北关登城。忽然间，

天下起了滂沱大雨，道路很难走，挖的交通壕全都变成了水沟，登城的准备不得不暂停下来。这时，陈赓司令员在电话上对我说：阎锡山派来援兵两万余人，在其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指挥下，从太原出发已到沁县。现正日夜兼程向长治急进，企图解救长治的史泽波与我军决战。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形势是非常紧张的。如继续攻城，可能在城没有攻克之前，敌援兵已赶到，对我军形成两面夹攻；如放弃攻占长治城，那么上党地区就被阎匪控制着，完成不了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之前的指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围城打援”。在这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刘、邓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立即北上，先歼灭敌援兵，然后攻占长治。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命令我旅立即撤离长治北关，速向老爷山前进，歼灭敌人的援兵，抢占老爷山阵地。

战士从长治北关泥泞的工事里爬出来，悄悄地向北出发了。秋夜的北风，吹在被雨淋湿的衣服上，寒气刺骨，但奋勇杀敌的战士们，知道开到北面去消灭敌援兵，个个磨拳擦掌，早已忘记寒冷了。十月三日，我旅到达屯留北的余吾镇，七七二团控制东梓，二十团控制从岳地村到余吾镇的公路，士敏独立团进到草滩集结待命。老爷山是由四个山梁构成的，主峰顶上有座庙，叫老爷庙，位于白晋公路西，居高临下的控制白晋公路，距离余吾镇二十华里。它与白晋路东的磨盘脑相对应，是长治以北唯一的险要地形。我们原打算先敌占领老爷山，但在我带着各团干部去看地形时，我侦察部队已与敌四十七师先头部队打响了，敌人比我们早来一步，占领了老爷山。敌发现我军大部队北进后，停止南进，就地构筑工事，扼守老爷山，企图稳步向长治推进，与我军决战，解救史泽波。我们向占领老爷山之敌组织了数次猛攻，七七二团从西面攻几次没攻上去，二十团和士敏独立团从东面攻了几次也没攻得上去，还有太行部队第十四团归我们指挥，从正面

攻击几次也没有攻上去。各团都有伤亡，七七二团攻得猛伤亡较大，该团一营剩下百余，该营二连连长高保华，率全连战士一百四十余名，同敌人反复拼搏，一夜之间伤亡过半，到天亮只剩下三十一人了，高连长也身负重伤。这样对峙，双方胶着于老爷山的山梁上。二十团长楚大明，急中生智，于二十四夜间带了一个连悄悄迂回到敌侧后，以突然动作占领了老爷山东北角的两个小山梁，切断了敌七十四师与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控制了老爷山的水源。这样，敌人被包围孤立，饮水被切断，拼命向我进行反扑，均被我旅部队打回，开始动摇起来。

太岳军区的指挥所已进到了余吾镇，陈赓司令员十月六日早晨来电话，命令我无论如何要迅速攻下老爷山。这时，控制老爷山上的敌人怕被我歼灭，放弃老爷山的有利阵地，偷偷地向东逃窜了。各团急速出击追歼逃敌，但由于打了两天两晚很疲劳，我们思想也有麻痹，敌人跑掉了，我旅占领了老爷山，旅指挥所立即移设在老爷山上。我站在老爷山的制高点上观察，远闻东面磨盘脑炮声隆隆，重轻机枪和手榴弹打得象热锅炒黄豆，“卡吧卡吧”的响个不休。磨盘脑一带被弥天的硝烟遮住，我太行部队正与敌人酣战。望眼镜里看见敌人大队沿着公路向南运动，突然间，在东北的方向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刺着我的眼睛，拿望远镜仔细一看，发现小股敌人先由东向西移动，太阳照射在敌人身背的洋油桶上，发出闪光。“奇怪，大队向南，为什么有小队、行李反而走北？敌人在要什么花招？”我即派侦察部队插到北面去查明，同时反复地想着敌人是否要向北撤退，“佯南而实北”，这三天的战斗，看来敌人无力再向长治前进，他解不了史泽波的围，彭毓斌不会跟着史泽波送命于上党。事不宜迟。我急忙给陈赓司令员打电话，报告敌人企图北逃的动向。陈司令员说：“你把情况确实弄清楚。我马上到你那里去，部队准备行动。”这时

是十月七日下午三点了。五点钟陈赓司令员、王近山副司令员带参谋人员来到老爷山，我将敌人的动向一一指给陈、王首长看，并提出了作战部署的建议。不一会派去北面侦察的部队回来说：

“查清北面是小股敌人掩护着行李、担子向北走。”陈赓司令员听了情况汇报，停了好一会都没有说话。在紧急关头，他的沉着、果断是令人钦佩的。过了二十分钟，陈赓司令员下了决心说：

“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确实开始退却了，你马上率二十团沿公路左侧北进，插入敌后，追上堵住敌人。”陈赓司令员严厉地下达命令说：“你们赶到敌人的前头，迫使北退之敌停滞于虎亭以南地区，以利于我集中全军的主力部队，彻底歼灭敌人。”

土落歼灭北退之敌

我率二十团立即出发了，后面的部队交给张祖谅政委指挥。黄昏时刻，我们在白晋公路的西面，沿着姬家沟、河口、白家山向北急进。黑夜行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部队是一路队形与敌并行前进，敌人走公路，我们爬山路，我们要赶上敌人，我们要超过敌人，跑到敌人前面堵住敌人。追呀！追上敌人就是胜利。我们部队虽然连续打了半个多月的仗，但指战员的战斗情绪非常旺盛，英勇顽强，打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去消灭退却逃窜之敌劲头特别大。前面是一条河，水流得很急，两岸是陡崖。部队停下来了，这时二十团团长楚大明同志身先士卒渡水过去了，后面的部队非常有次序的手拉手的渡过河去了。从黄昏前出发，四十多里的夜行军、急行军，而且是山路的战备行军，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已是夜晚的十点了。这一带是太岳的老根据地，我着参谋人员赶紧找老乡问情况。老乡们说：刚才有一百多骑马的白狗子向沁县跑了，慌里慌张地渡过漳河。我听了心里很着急，这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后撤了，彭毓斌可能跑掉了。于是令二十团

团长楚大明同志，赶快布置部队进入阵地，控制河岸，绝断公路，堵住敌人。这时我二十团在土落村口放哨的战士抓到一个敌人逃兵，送来我处，我亲自询问敌人的情况。从敌逃兵口中得知敌人的大队人马尚未过去，现正由南面开来，企图北窜撤回沁县。幸好，逃走的敌人仅一小股，我令楚大明同志即派一个营，渡过漳河北岸堵截，其另两个营和团直属部队立即占领阵地，连夜依山傍水修整旧有的工事。我在土落村后的小高地上指挥。这是大堵击战，能不能歼灭北逃之敌，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堵住。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堵好，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堵击任务。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天刚明的时候，只见大批的敌人向北开来，有的还集结在小山前公路的两侧洼地上。在很小的一块地方聚拢了两万多敌人，这就是阎锡山的八十三军与二十三军。这个堵截战打上了，但敌人大我十倍的兵力，因此战斗任务非常艰巨。我二十团长于攻坚战、村落战，堵截敌人的防御战打得少，这时政治工作特别强调打好这次堵截战，以彻底歼灭阎锡山的二十三军和八十三军。我二十团控制了有利的地形，整修好了旧有的防御工事，敌人无法向沁县逃去了。敌人拼命地向我二十团阵地攻击。在浓密的炮火掩护下，炮弹象雨点般的落到二十团的阵地上。敌人步兵冲击到二十团的阵地前沿，但二十团的英雄们，一次又一次地打垮敌人，组织一个连一个连的反冲击与敌白刃搏斗。

敌人吓破了胆，一堆一堆的死尸倒在我二十团的阵地前沿，但敌人的指挥军官仍拚着命督队，组织一次接着一次集团冲锋，进到距我二十团阵地前沿四十公尺处，就扑倒在地上，不敢前进了。这场堵击战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从早晨到中午，由中午到下午，一次、二次、三次，直到第八次向我冲击的敌人内部混乱了，只见其炮手不顾他的指挥军官的威逼和吼叫，把山炮撤出了

阵地，推到河边去隐蔽了，敌人的士兵再也不敢向前冲了。我二十团指战员固守住了阵地，堵住了向北逃窜之敌，使我军赢得了时间，太行、太岳和冀南各军区的部队都赶到了，分别从左右两翼包围，正面攻击围拢上来，将敌人装进口袋里。与此同时，我二十团在漳河东岸的第一营，遇着头戴钢盔，手端上了刺刀的步枪急急来援的阎锡山省防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肉搏战。第一营指战员毫不畏惧奋勇抗敌，迫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经过一天一夜的艰巨堵截战，把企图向沁县逃窜的阎锡山第二十三军、八十三军（除彭毓斌和他的警卫随员外）全部歼灭。

桃川歼灭长治的逃敌

土落村的堵击战刚刚结束，部队忙于打扫战场，把俘虏的万余官兵交民兵押送军区后方。从漳河里打捞出敌人丢弃的十余门山炮，归拢所缴获的武器、弹药，掩埋敌人的尸体等等，全旅的指战员都忙得个不亦乐乎。连日来，紧张的战斗吸引着我们，忘记了饥饿，如今战斗结束了，肚子里确也空了，真想赶快吃一顿饭，休息一下。这时，我和张祖谅政委在旅部和各团长、政委研究配备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并挑选一批俘虏战士。这时，谢富治副司令员来了，一见面非常高兴的握着我的手说：“刘忠同志，你们辛苦了，这次堵击战打得很好呵！邓政委要我代向你们致敬！”他接着说：“军区党委决定，刘、邓首长批准：士敏独立团升级为三八六旅第二十一团，蒲大义同志为二十一团团长，梁天喜同志为政治委员。”这时，蒲大义、梁天喜同志立即站起来向副司令员敬礼，各团长、政委热烈鼓掌表示祝贺。士敏独立团，在上党战役中的确锻炼出来了。

副司令员说：“史泽波已放弃长治向西逃跑了。刘、邓首长命令我太岳部队立即追击该撤走之敌，军区命令你旅和三十八团

立即行动，沿张店马壁向翼城方向追击必须于半途即东西峪一带歼灭之。”张祖谅政委到七七二团，我到二十团，谢副司令员亲自去二十一团宣布升级命令并作战斗的动员，决一旅的三十八团归我们指挥，王近山副司令员已到该团传达追歼西逃之敌的作战任务。从土落村到东西峪，在地图上看并不远，二百三十里，但这一带是山地，全是大小山峰，半天爬不出一个山岭，而上级首长命令我们必须在三天内赶上并歼灭该敌，这对久战刚停下的部队不能说没有困难。

我们的战士真可爱，使人感动，他们听说侵占长治的敌人逃跑了，上级命令我旅追歼阎军史泽波十九军，个个精神抖擞。经动员后立即出发，趁着朦胧的月色，直向西南挺进。一座山、一道岭爬着，爬着，有时沿着弯曲的山背走上去，队伍前头向西南，看到后面却又拐弯向北，绕来绕去。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早晨进入一个陡立的山谷，有一道急湍的小河，秋天的严霜落在两岸枯草上，和晨光相映，亮晶晶的耀眼夺目。天气冷了，部队没有吃饭，身上穿着单衣，淌过河后有不少战士的脚刺裂了，鲜红的血湿成一片，仍坚持行军不掉一步。旅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各团的政治干事均分别下到各连排和战士一起，一边行军，一边做政治工作，老红军干部就讲长征故事给大家听。一连走了二天二夜，又饥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啦啦队又在喊：同志们！加油呵！前面快到东西峪了。我们部队进到东西峪，敌人走过去了，部队停下稍休息一下，也来不及做饭，就告各团在老乡家里买点现成饭吃，以便快点赶上敌人。这时，人走不动，骡马饿得没有劲了。好在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希望我军很快追歼阎锡山十九军，都很高兴争着煮饭、喂牲口。警卫员搞了点饭菜，我和祖谅同志正吃着，军区首长赶到了，放下脸问：“怎么，你们停下休息啦！”“报告首长，部队饿得不行，实在走不动，吃了饭

马上走。”首长以责备的口气说：“可是你要知道，敌人就喜欢你们这样做。”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心里也有气，就放下饭碗不吃了。我让作战股长胡绵弟通知各团立即出发。

部队继续分两路，二十一团走山梁，二十团、旅直属队和三十八团走山谷，急速前进。七七二团从土落出发就单独沿张店、马壁、将军岭一线绕个大弯子，先插过去了，以防敌人万一漏网。我们离开东西峪急速向桃川前进时，前面侦察部队派员回来报告说：在佛~~庙~~岭、~~庙~~将军岭一带发现了敌人的队伍向桃川开进。我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这就好了，没有白跑，把敌人追上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史泽波呀史泽波，这回你可跑不掉了”。敌人走了四天才从长治走过横水、东西峪，可以说象“乌龟爬沙”。不是敌人不想走快，而是我民兵、游击队沿途袭扰敌人，丧魂落魄的敌人一闻枪声响，就要停下来侦察、搜索，占领阵地掩护才敢前进，而且敌人后面还有太行部队一个团一路尾击着。战士听说前面就是敌人，劲头就上来了。黄昏前我和张祖谅政委给三个团下达战斗命令，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命令各团第二天（十二日）拂晓在桃川一带有利的地形上，彻底消灭阎锡山第十九军。其战斗部署：二十团担任正面攻击，二十一团在左翼，三十八团在右翼包围敌人，旅指挥所随二十团前进。

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我们在老乡家里休息，正要吃老乡给我们做的豆子饭时，军区首长又赶上我们了。我向军区首长说：追上了敌人。军区首长问我：“你们很辛苦的追上了敌人，有把握消灭敌人吗？”我说：“请首长放心，歼敌的战斗部署已经布置好了，有把握于明天拂晓，在桃川一带围歼敌人。”军区首长说：“好吧！一定不能让敌人跑掉了呵！刘忠同志，我们要向党向人民负责，否则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的。”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陈赓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首长，一直是信任我们的，当我们主意拿

定了，有把握消灭敌人时，首长们总是放心的。晚上的接敌运动，二十团前面走着，我们率指挥所人员在该团后面跟进。山地夜行军，前面部队走走停停，我和张祖谅政委商量睡两个小时后再走。张祖谅政委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停下来睡了，我多不少整睡两个小时，醒来就叫走。祖谅同志说：“你睡觉真有本事，多不少睡了二个钟头，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刚要睡着时，你又叫走。”我也凑趣地说：“指挥员要善于指挥打仗，也要善于指挥睡觉，叫睡就睡，叫醒就醒才行。”他说：“这个很难学到手。”

十月十二日的早晨，东方见亮了，我们站在桃川东面的山头上。七七二团昨夜与敌人交战于将军岭，把逃敌的道路完全断绝了。二十团、二十一团和三十八团今早拂晓从佛岭方向加入了战斗，太行部队一个团尾追敌人，紧紧地扭住了敌人，对敌包围圈越缩越小。敌人是十一日下午三点就被压到桃川村及其周围。我军十二日六时发起总攻击，山炮、迫击炮弹、火箭炮弹，落在敌人的小圈里开花；重轻机关枪、手榴弹打得敌人只喊饶命。到上午八点半，战斗胜利结束了。阎锡山的第十九军一万多人，除少数先头溜掉外，全部被歼在桃川，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我二十团活捉，共俘敌官兵五千余人。我七七二团还追到马壁村以西，将逃敌先头一个团消灭一大半。至此，追歼长治逃敌战斗，消灭阎锡山第十九军的任务，胜利地完成了。

在上党战役中，我参战的主力部队三万余人，参战的民兵五万余人，共歼敌十九军、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等十二个师，三万八千余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的将官二十七名，共歼阎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总指挥彭毓斌也身负重伤，在乱军中毙命。上党战役是一个干净、彻底、战果辉煌的大歼灭战。

上党战役后我旅的战斗总结

上党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日程，也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使我华北解放区赢得了时间，能够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部队，在自卫战争中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上党战役结束后，我旅总结如下经验：

第一，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之前指出：“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进攻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仗打得越好，我就回来得越快。”这个任务由于刘、邓首长的指挥英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我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全地区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胜利完成了任务。

第二，提高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上党战役大量消灭阎锡山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我们太岳野战部队，原来仅我旅保存了一个山炮连四门山炮。上党战役中我军缴了许多山炮和其他各种炮，相信会有许多的炮兵营、炮兵团。正如毛主席说的：“消灭敌人武装自己。”

第三，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和攻坚战，给我旅以极大的考验和锻炼。我们旅同全军野战部队一样，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在战斗中边打边建，边战边练，战练结合，大大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第四，上党战役间土敏独立团奉命升级为野战兵团，即为三八六旅的二十一团。我军会有更多地方部队转变为野战兵团，这标志着我们部队发展的趋势。

第五，我旅担任长子县城的攻坚任务，使用大量炸药爆破与进行土工作业，对以后攻城战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二、切断同蒲路 在四纵十旅

上党大捷和各个解放区斗争的胜利，大大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我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与我签订“双十协定”。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果然，蒋介石在签定“双十协定”的同时，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从空中、海上向北平、天津和东北等地加紧运送军队，其主力沿各铁路交通线向我解放区推进，积极准备扩大内战规模。十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三、第十六两军沿同蒲路经榆次转正太路开到石家庄，侵入了我军华北的腹心地区。中央军委指示，我太岳军区主力部队西出同蒲，控制同蒲铁路交通南面的一段，截击胡宗南部队经同蒲路北上，以配合我晋冀鲁豫的主力部队，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整编部队 攻克赵城

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我太岳军区的部队分别集结于根据地腹心区的沁水、安泽、沁源一带，进行了短期休整，我旅住于沁水县地区，对部队特别是上党战役中解放入伍的战士进行了政治教育。根据地在欢庆胜利中又有大批的青壮年志愿参军，部队迅速发展扩大。根据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的指示，十月下旬，原太岳军区部队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以陈赓为纵队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十旅（即我们三八六旅）、十一旅（原决一旅）、十三旅（原十七团、五十七团、四分区基干二团合组而成）三个旅。以周希汉为第十旅旅长，刘忠为政治委

员；以李成芳为第十一旅旅长，刘有光为政治委员，以陈康为十三旅旅长，廖冠贤为政治委员。这是编成野战兵团，其太岳军区以王新亭为太岳军区司令员，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为政治委员。并组成一个军区独立旅（不久改为十二旅），以刘金轩为旅长，李耀为政治委员。从此，我太岳军区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军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和刘、邓首长命令，开始同蒲线的作战。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旅为单位分路西进，在陈赓、王新亭司令员，谢富治、王鹤峰政委统一指挥下，我们十旅攻占赵城，十一旅攻占霍县北的什茨、南关两据点，十三旅以一部兵力攻占南堡，该旅大部兵力为纵队的预备队。太岳军区部队分布在赵城以南活动，以钳制洪洞、临汾之敌不使其北援，各个分区的武装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由于我军具有人民参战的条件并熟悉地理情况，因而行动很迅速，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我旅于十月二十七日接近赵城，二十八日，攻占赵城的东关。我二十八团（原七七二团）在左，二十九团（原二十团）在右，两个团同时在东关作登城的准备。我三十团（原二十一团）在赵城北关作强攻以吸引敌人，赵城县大队及该县的武装民兵在西关、南关方向活动。十月三十日黄昏，在浓密的炮火掩护下，由于炸药爆破成功，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同时在东城墙登城，一举攻克了赵城。全歼阎锡山守赵城的督导第四纵队等部共两千余人。我旅有上党战役攻占长子城的战斗经验，非常胜利地登上了城，伤亡也很小，但敌人一发炮弹落在我旅的前线指挥所里楚大明副旅长腰部负伤，作战股长向明同志光荣牺牲了。在我旅攻克赵城的同时，十一旅攻占了什茨、南关两车站，十三旅占领了南堡敌人据点，太岳军区部队有力的配合了我们纵队的作战。至此，我军控制了同蒲铁路的灵石以南至洪洞以北的铁路

线，在人民参战的支援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赵城解放，霍县被围，同蒲铁路为我军斩断，胡宗南部队无法继续经同蒲铁路北上，胜利完成了控制同蒲铁路南段的带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任务。

令调东北未去 我旅攻占浮山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为实现党中央“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决调我四纵队开赴东北，集结于屯留县鲍店地区，进行补充、训练，待命出发。但到十二月初，同蒲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又决定四纵仍留太岳。陈赓司令员率我旅和十三旅再出同蒲，与太岳军区部队在洪洞、赵城地区会合。这时，晋南之敌遭我军在霍县、赵城打击之后，深怕交通断绝，南北联系受阻，从十一月下旬起，即以驻临汾之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部，主力四万余人开始北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侵占赵城，但其铁路一时无法恢复通车。在此期间，我纵和太岳主力会合，因临汾以北的敌军主力集结，不易歼灭，而临汾以南的汾河两岸广大地区敌防御薄弱，所以决定：以主力乘势向曲（沃）、翼（城）、浮（山）地区突击。具体部署是：以十旅、十一旅沿浮山、翼城公路疾进，突然包围并攻占浮山、翼城两个县城，掩护纵队主力顺利开进，命令我旅攻占浮山县城。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旅由洪洞东南之苏堡、原上地区隐蔽前进，以突然动作包围了浮山县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以三十团为主实行攻城战斗。第一次攻击因登城云梯过短未能成功，随即采用爆破与攀登相结合的办法，第二次攻城。二十八团和三十团从西部登城攻进城内，直捣敌防御中心伪县政府，当夜全歼该敌，共毙俘敌保安团一千余人。我军主力乘胜南下又攻占翼城，这就使曲沃、绛县之敌失去了重要的屏障。至此，胡宗南部队就停止北上，控制运城和风陵渡口。我军切断了同蒲路的南段，把阎锡山、胡宗南

的联系完全隔断。

三、停攻曲沃 忍痛撤兵

攻曲沃未克

为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粉碎国民党军于停战前夕抢占战略要点的企图，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命令我四纵队迅速攻占曲沃、候马、新绛地区，控制候马南北交通，为保持我军阵地造成有利的势态。纵队首长作出部署：以我旅及十三旅（欠一个团）围攻曲沃，相机攻占¹沃城，以十一旅直扑晋南重镇候马，歼灭守敌，并乘胜向南北两翼扩张战果，相机攻占新绛县；以十三旅的一个团，配合太岳军区独立旅的一部，直出芝城、高显，阻止临汾之敌南援。一月六日，各旅由翼城及以西地区分别出动，其行动和战斗情况，随时报告纵队司令部。

我旅于一月七日开进到曲沃城北二十里的曲村集结，立即对曲沃城进行侦察。纵队首长令我旅和十三旅（欠一个团）统归我和周希汉、陈康三人指挥。我们亲自看查曲沃城周围的地形后，于十日上午作了具体、详细的研究，确定我旅先攻夺曲沃城的西关，并在西关登城，担任主攻；十三旅与我旅同时攻占北关后，在北关作辅助登城，以钳制吸引城里的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火器；其东关、南关由曲沃县大队和当地武装民兵加强活动。我们于十一、十二日先后夺占了西关、北关。此时东关、南关之敌害怕被歼缩进城里去了，我地方部队乘机占领了东关、南关。由于一月十三日的僵战，为争取时间攻占曲沃，一月十二日晚十一时，发起登城战斗。至十三日拂晓五时，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登城突击队同时登上了西城墙。但由于敌人的反冲击，特别是

强大的炮火、如山炮、迫击炮、重轻机关枪火力对我登城道路的封锁，使我后续部队白天无法继续增兵登上城去，已登上城墙的突击队，仅控制了西城墙五十公尺的一段，不能攻入城内。由于敌火力封锁很严，亦不可撤下来，只能在突破占领的地段上坚持。以待黄昏后，部队才能继续登城扩充战果，攻占曲沃城。

一月十三日上午，我同希汉、陈康，还有楚大明同志（我十旅的副旅长），进行了研究，决心黄昏后以全力夺取该城。我到二十八团，楚大明副旅长到二十九团，陈康同志把十三旅两个团的主要力量从北关转到西关增强突击力量，周希汉同志亲自组织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登城，三十团为预备队。陈赓司令员在电话里问我：“你们在今晚十二点钟前能攻下吗？军委有命令，今晚十二点停止战斗。”我说：“这个钉子不拔掉，对我们解放区很不利，同时敌人火力严密封锁道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登城突击队蹲在城墙下，我们白天既不能进兵，他们也撤不下来，特别是伤员撤不下来。”陈赓司令员接着说：“你们能否下午继续攻击呢？”我说：“白天攻击伤亡大，把握不大。”陈司令员最后说：“好吧，我们研究后答复你们。”

忍痛撤曲沃 二次打曲沃

下午二点半，谢富治政委到曲沃西关我旅指挥所。他向我们提出：万一今晚十二点攻不下怎么办？我说：又没有三人小组的人在场，有什么关系呢？我到明天拂晓前攻下亦可以。谢富治政委对我说：“那好吧！刘忠同志，你负责任，我走了。”他明显表示不同意我仍继续攻打，变了脸就走。我、楚大明、陈康同志意见一致，按计划攻击不变，他走他的。周希汉同志说：“谢政委明显不让我们再打了，若再攻，这就违背了纵队政委的意图，更主要的是有中央军委停战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刘忠同志考

虑。”周希汉同志这样一看，陈康同志认为还是撤兵吧。楚大明同志仍坚持要继续攻击，消灭敌人还犯罪吗？我最后忍痛只好取消继续攻击的计划，令掩护登城突击队于黄昏后撤下来，退出战斗。

城墙上的登城突击队撤下时，敌人以浓密的炮火轰击，并以步兵反冲击，致使我一批伤员撤不下来。我十分痛心，满身怒火，部队撤完了还在西关指挥所。参谋人员说：“政委，部队撤完了，我们走吧！”我很气愤地说：“打了半辈子仗，没有像这次惨痛！”忍痛撤兵，丢掉伤员，我决心不干了。回到曲村旅部，立即同陈赓司令员打电话，要求他报告大军区给十旅派政委来，我当不了这个政委，回家当老百姓去。陈赓同志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但不要生气嘛！陈赓司令员当日（十四）下午就到了我们旅部，对我作解释，说：“你有意见可写报告嘛！但工作还要好好地干，要脾气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全旅指战员大多数都有意见，所以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讲话，作了详细地解释。会后又找我单独谈话，征求我对纵队的指挥意见。我如实地向大军区党委及刘、邓首长写了报告。

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旬，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纵队党委讨论再次攻打曲沃时，决定我指挥十旅、十三旅的部队第二次攻打曲沃城，于四月十五日攻克，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武器、弹药、物资甚多。我内心是十分高兴的，胜利完成了攻下曲沃城的光荣任务。接着我率十三旅在当地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绛县，歼灭不断向我进犯的陈子文部一千余人，巩固了我军阵地。县委书记程少康同志率地方机关部队入城办公。

在这一时期的作战中，我军贯彻了毛主席“掌握时机，寻敌弱点，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的军事思想，收到了良好效果。同

时，经过攻克赵城、浮山敌军较坚固的防御，提高了部队的攻坚能力，进一步积累了夜战、近战的作战经验，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完成了从分散游击到集中的运动战、攻坚战的转变，为战胜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章 血与火的洗礼

一、参加四纵作战指挥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完全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当时敌军全部兵力共有四百三十万人，同时有拥有占全国人口大半的地区，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及铁路交通线。国民党还接受了侵华日本军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大量援助。而人民解放军仅有二百二十多万人，不及敌人的三分之一，没有飞机、坦克，很少大炮而且没有外援。解放区的人口只有一亿三千多万；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只初步展开，反动的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后方不十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迷信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堪一击的。蒋介石和他的参谋长陈诚都夸口要在“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军队，五个月内解决整个中共”。但是，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毛主席就断言“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因为尽管敌人有许多优势条件，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它的军心和它统治区域的民心都是厌战的；它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它在军事上也有几个无法克服的大弱点，这就是：战略意图要占领我解放区的许多地方，但又有兵力数量不足，后备力量薄弱的矛盾；战术要求（集中机动使用兵力）与战略意图（它想要的地方很多）的矛盾；嫡系军和杂牌军矛盾；极少数高级指挥官好战与广大官兵厌战的矛盾；以及战术上的很多弱

点。我们的条件尽管暂时不如敌人，但我们进行的是人民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人民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英勇善战，这就具备了敌人必败、我们必胜的坚实基础。

敌人发动了占其全部正规军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的一百六十万人，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一下子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也就是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在正面作运动防御，主动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以便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争取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情况，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一九四六年四月，即解放战争前夕，我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参谋长职务。四纵队的领导人是：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韩均任副司令员、杨奇清任副政委、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陈、谢分任纵队党委正副书记，党委常委开会讨论领导分工时，韩均同志提出，要我管前面的作战指挥，他管参谋工作。他说，职务不要变，分工还是按具体情况变一下好。常委其他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由于我纵处的地区与西北战场的联系极为密切，同时从太原到风陵渡这段同蒲线是我纵控制，其战略意义很重要。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在执行作战任务方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我直接参加四纵队的作战指挥。

闻（喜）、夏（县）战役

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四十七旅、五十三旅、一六七旅，附重炮团、特务团等北渡黄河后，集结运城地区，于一九四六年七

月三日，沿同蒲路节节北犯我解放区，来势非常凶猛。纵队党委决定，我率第十旅、十三旅和十一旅的一个团，共七个团的兵力，于七月四日拂晓分由曲沃之曲村镇、南樊镇、侯马镇地区出发，隐蔽地向闻喜、夏县地区急进，寻机歼灭北犯之敌。我于七月五日下午，率指挥机关人员到三军分区司令部，令该军分区的部队逼近运城作战斗活动，迷惑与钳制敌胡宗南的主力。北犯之敌，在其飞机、坦克掩护下，于七月十二日，进占我水头镇、张店镇、胡张镇、堰掌镇等地区，其先头部队一六七旅占我闻喜县，因尚未与我主力接触，自恃兵力雄厚，有陆、空配合行动的优势，麻痹骄傲。但先头部队远离主力，弱点已暴露在我面前，此时临汾地区的阎军图保存实力，表面上虚张声势，实际上不作有力的配合，这就造成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

打好闻、夏战役，陈赓司令员当面交代我：第一，这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仗，要确实摸清情况；第二，口不要张大，每仗集中大敌三倍以上的兵力；第三，白天部署好，夜间进行战斗，速战速决；第四，我们的部队打胡宗南没有经验，第一仗必须打好。七月十三日晚，我军突然猛攻胡张镇、朱村，一举歼灭敌三十一旅的九十一团及其旅直属部队。七月十四日夜间，又继续向进到如意下晁、赵家庄之敌攻击，歼敌三十一旅的九十二团全部。这两仗都采用夜战、近战，强袭、急袭的战法，分割包围，速战速决，使敌人兵力来不及展开，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飞机、坦克夜间无法用上。因而打好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仗。

进攻闻喜之敌一六七旅，于七月十四日，以其四九九团向南增援，遭我担任打援的部队猛烈反击，歼敌二个营。七月十六日占领水头镇之敌七十八旅北上，当晚被歼一个营后，紧缩做一团，迟迟不前进。其余各敌均退缩在闻喜、夏县及铁路沿线的主要据点内，构筑工事，固守不出，整顿补充，以图再犯。我于七

月二十三日，回师曲沃、翼城地区准备再战。

闻夏战役历时十天，歼敌三十一旅全部，一六七旅两个营，七十八旅一个营，共俘敌官兵六千三百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的进攻气焰，增强了解放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念。我战士押送俘虏路经闻喜的横水镇时，群众都出来围观。有人问被俘敌连长：“中央军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被解放军捉住了”。他狡辩地说：“不是我们不行，而是解放军打仗超出了战术原则，我们还没有拿起枪、架起炮，就把我们捉住了。”这引起一场大笑。敌军逃回去的第三十一旅旅长刘铭剑，被撤职查办，敌九十一团长李国培及第九十二团长柳届春，均被判处徒刑。敌第一军军长董钊，也受了一顿斥责。胡宗南遭这次战役的重创，不得不暂停下来，不敢按原部署继续前进。闻、夏战役的胜利，迟阻了胡宗南军北犯的行动，打破了敌人三个星期打通同蒲线的企图。我军在与国民党美械装备的嫡系军队的首次交锋中，初步了解其作战特点和行动规律，丰富了夜战、近战歼敌的战斗经验，为今后战斗中大量歼灭敌人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 蒲 战 役

闻、夏战役后，胡宗南军主力，聚集闻喜、夏县、安邑、运城地区进行整补。由于我晋绥军区主力在晋北开展对阎锡山匪军的攻势，临汾南北同蒲路阎锡山的主力被抽调，他准备将灵石以南地区的防守交胡宗南部队守备。因此，灵石至临汾这段兵力薄弱。据确查，阎锡山的六十军军部奉六十六师防守临汾；土顽军张从龙部千余人防守洪洞，其三十九师大部及地方团队共三千余人防守赵城，六十九师等部两千余人守备灵石，三十四军守备平遥、介休及其以北的点线。阎锡山部队因兵力不足，顾此失彼，在我不断打击下，士气很低落，战斗力日益下降，对我军深

为恐惧。

我纵主力北返曲沃、翼城地区后，进行了短期休整，总结了闻、夏战役的作战经验，部队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纷纷要求在下次的作战中担任主要任务。解放区的人民更加积极地支前参战。八月初，中央军委指示我纵乘敌空虚逐个夺取洪（洞）、赵（城）、霍（县）、灵（石）诸城，配合晋绥军区部队作战，截断胡、阎联系，开辟有利的战场，吸引胡军北进，以各个歼灭之。纵队党委研究决定以十旅、十一旅第二次夺取洪洞、赵城两城，歼灭阎匪军守备部队；以十二旅监视、包围霍县的守敌六十九师，尔后再以主力北进攻占霍县、灵石两城。以第一、二军分区部队，分别对平遥、介休、临汾守敌展开战斗活动，阻其出援；以十三旅结合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于漳县、闻喜、横水地区积极活动，掌握胡军的动向，迟滞其北进，保障主要方向顺利进行战斗行动。并号召全体指战员既要打好仗，又要做好新解放区的工作，争取军、政双胜利。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我十旅、十一旅同时北进，十四日分别接近赵城、洪洞，进行外围战斗。我随十旅行动，十六日围攻赵城，将赵城的东关、南关、北关完全占领，严密包围赵城。东关作为主要攻城的依托，西关未占，因紧临汾河，我以一部兵力配置于汾河的西岸，如敌西逃，则歼敌于野外。在我攻城中，守敌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企图死守待援。激战后，八月十八日二时，我十旅的部队突入城内，敌一部在城内被歼，大部突围后逃至汾河西岸的万安镇，被我十旅全歼。在我十旅攻击赵城时，霍县的守敌六十九师出动南援，同时以主力东犯我解放区，企图驱逐我军以巩固其守备。我十二旅当即乘机给予猛烈的反击，敌伤亡千余人，即回窜霍县，我十二旅乘势包围霍县城。我十一旅部队，在第三军分区部队协同下，夺占洪洞城

关及外围据点后，乘胜紧缩包围了洪洞城。八月十六日晚开始攻城战斗，守敌依托城墙、工事和外壕拼命的顽抗，我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采用炸药爆破，攻城部队胜利登城，当夜守敌被歼无一漏网。

赵城、洪洞的解放，为整个同蒲战役打开了有利的局面。为扩大战果，纵队党委决定我率十一旅立即行动，兼程北上。经二十二、二十三两日的战斗，攻占了霍县城关和外围据点。二十四日黄昏后，十一旅、十二旅同时登城，攻占霍县，歼敌大部。此时，灵石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西逃，我率十一旅于八月三十日进占灵石，以一部兵力西渡汾河，追歼逃敌，歼敌一个营。并在吕梁军区部队配合下，解放了汾西县城。至此，介休以南，临汾以北二百多华里的同蒲铁路，完全为我控制，随即组织数万群众破击同蒲铁路。我纵留置于闻喜、绛县、临汾、平遥、介休地区，担负保障任务的各部队和广大民兵，亦在主力作战的同时，展开了普遍的游击战与政治攻势，胜利完成了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开辟了对今后作战有利的战场。

同蒲战役历时半个月，歼灭敌人第三十九师、六十九师大部，四十四师一部及洪安支队、保安十六团等一万二千余人，解放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座县城及村、镇敌之据点共五十二处，控制同蒲铁路二百六十华里，缴获山炮七门，轻、重迫击炮十七门，轻、重机枪三百七十五挺，步枪六千七百余支以及大量的弹药、物资。这一战役胜利，不仅重创了阎锡山军，破坏了同蒲南段的铁路交通，粉碎了胡、阎企图南北合击我纵的计划，而且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和阵地，开辟了继续歼敌的广阔战场。在作战指挥上，我纵始终贯彻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导思想。在战术运用上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出敌意外的主动性、灵活性”。我纵党委经常研究作

战计划，确定战斗部署，重视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战前提出军、政双胜的口号。在获得战斗胜利的同时，又创造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良好榜样，我纵被人民群众称为“仁义之师”，并受到党中央来电嘉奖。其原文是：“你们部队在自卫反击光复洪洞、赵城、霍县诸城时，纪律甚好，闻之甚为欣慰，望全军将士加以勉励。”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也打电报，表扬嘉勉。同蒲战役胜利结束，我纵指战员的战斗勇气、政治情绪更加的高涨起来。

临（汾）浮（山）战役

在我军进行同蒲战役的时候，胡宗南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又将其第三十师（辖三个旅）和精锐主力，所谓“天下第一军”的第一旅（原为第一师刚刚整编为旅）调到晋南。八月十七日，胡宗南亲自飞到运城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布置对我军的新攻势。其部署是：以第一师沿同蒲路北进，第三十师沿铁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开进，企图压我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而后同阎锡山军南北夹击与我决战。九月初，胡军北进临汾、翼城地区。阎锡山为接应胡宗南北进，将平遥、介休地区的第三十四军集结在义棠地区，于九月十三日南进，企图攻占灵石，被我击退。中央军委指示我纵，对北犯的胡军应集中主力给予坚决打击，以歼其一个旅为目标；对平、介之敌阎锡山部队，以地方部队钳制之。纵队党委决定在胡匪北进至临汾、浮山地区时，寻机歼敌一至两旅。具体部署是以十旅、十一旅、十三旅隐蔽集结于洪洞东南地区，周密侦察敌人行动并做好歼敌的准备工作，以十二旅结合第一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阻止由平遥、介休南犯的阎军，其各军分区的部队，深入敌后积极活动，以迟滞、疲惫胡军，迫使拉长战线，分散其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利我纵主力歼灭北犯的胡军。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胡宗南以十一个旅的兵力沿同蒲铁路及

~~甘西和陇东公路向延安挺进，国民党军在同蒲路以北的山西境内~~

第二团，进至合理庄、老母村、官雀和南北韩村地区。当晚，我集中三个旅向敌第一旅之第二团出击，拟将该团切成数段各个歼灭。以第十旅攻合理庄、老母村，以第十一旅攻官雀，以第十三旅攻南北韩村。

下午八时，敌第一旅的第二团，已全部集结于官雀。我纵除十一旅抓住敌人外，都扑了空。纵队命令我十一旅乘敌立足未稳，出敌不意歼灭该敌，但因当时占领官雀之敌的布置情况不明，十一旅即派侦察员赵玉秀等三人前去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器配备和指挥所位置新情况。赵玉秀小组按当地的民情、衣着化装后，直奔官雀。他们黄昏时到达官雀村东北的无名高地，发现村边敌人筑有工事、地堡，敌人在屋顶、窗顶上配置火器；官雀村西南的地形较开阔，敌人正强迫群众砍树、拆门板，构筑工事，赵玉秀小组乘此之便，各自抱了树枝混进村内。他们接近敌指挥所驻扎的四合院，就在右侧约三十米处隐蔽起来。一个挟着皮包的军官过来，侦察员罗德远即从路边断墙后猛然跃出，卡住他的咽喉，藏在对面烂草棚内的赵玉秀也跳出来将手巾塞进军官口中，拖到断墙后面捆绑起来，从皮包内搜出作战地图一份。这个俘虏军官是敌第二团的作战参谋，十一旅旅长李成芳同志亲自讯问了他的口供，这就准确查明了官雀之敌的作战部署。

查明官雀敌情后，李成芳旅长报告了纵队。这时，陈赓司令员令我速去十一旅直接指挥，坚决消灭占领官雀的敌人。我到十一旅与李成芳、胡荣贵同志研究，决定于九月二十三日拂晓前，发起对官雀之敌攻击。经过了二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十四日凌晨三时，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第一旅的第二团二个营及团直属队，毙伤敌团长以下四百五十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一千二百余人，缴山炮二门、战防炮四门、迫击炮十三门、火箭筒四具、轻重机枪三十挺，各种枪枝三百五十余支，骡马一百五十匹及其全

部的军用物资。但该敌第三营尚未歼灭，仍在官雀村西顽抗死守。

我十三旅旅长陈康同志为配合歼灭官雀之敌，进行浮山和西佐岭的阻击战。九月二十日，由翼城沿浮翼公路北犯之敌一六七旅，其先头于二十二日八时进至东张，与我警戒阵地的三十九团九连接火，该连以运动防御的战法节节抗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至十时敌攻进到我主阵地前沿，我三十九团正面作英勇抗击，同时，以小分队由翼侧向敌实施连续的反冲击，狠狠地打击了敌进攻的气焰，击退了敌多次向我阵地的反击。接着，敌在飞机和各种火器支援下，连续不断地向我三十九团主要阵地轮番攻击。由于我十三旅的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协力反击，激战至十六时，敌遭我极大的杀伤后，才局部地突破我阵地。我三十九团伤亡较大，弹药消耗很多，在这关键时刻，指战员仍顽强战斗，与敌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该团二营营长何金光同志在机枪射手牺牲后挺身而出，端起机枪猛烈向敌射击，敌人死伤很多，但他也中弹牺牲。我三十九团的顽强阻击，为十一旅围歼官雀之敌赢得了时间。当日十八时，三十九团完成阻击任务后，陈康旅长令撤至浮山的天坛山地区。随后敌占领了浮山城，我三十九团又奉命佯攻浮山城，给敌人错觉以策应我十一旅歼灭官雀的敌人。

胡宗南畏惧官雀部队覆灭，除令第一旅旅长黄正诚亲自率主力由汾东援外，复令第二十七旅、一六七旅放弃浮山，西援官雀。我十三旅的三十七团，即在官雀至韩村之间，组织了坚强的防御，积极阻击敌西援。该团的第一、二营在西佐岭，第二营在南北韩村附近进入阵地。九月三十日十一时，浮山西援之敌，进到该团防御前沿，展开攻击。战斗十分激烈，我三十七团英勇阻击，连续打退敌十多次的冲击。敌在攻击受挫的情况下，集中炮火向我三十七团阵地轰击，步兵发起疯狂的进攻。直至十六时，

敌人以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才突破我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但该团仍然英勇阻击，以机动防御，节节抗敌的手段迟滞并消灭了许多敌人。到十八时，敌人进至官雀以东的韩村时，我三十八团第二、三营立即投入战斗，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紧紧地扭住了敌人，阻击救援官雀，使我十一旅得以全歼官雀之敌。

生擒敌“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

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在官雀被我军包围的消息传到临汾时，敌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董剑焦急万分，令其第一师师长（前敌总指挥）罗列速派第一旅旅长黄正诚，率第一团和旅直属队救援官雀。我第十旅采用正面坚守阵地，侧面伏击敌人的战斗方法在上陈村、老母村、王村一线阻击敌人。九月二十三日晨五时，敌第一团第一营，附山炮四门进至上陈村附近，向我三十团三营的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夺路东援。当日七时，敌以两个营的兵力连续向我三十团三营阵地猛攻，并使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我三十团三营指战员英勇顽强坚决阻击，敌未得逞。敌正面进攻受阻，即向我三营阵地的右翼迂回，我三十团三营前沿的连队，撤至上陈村地区，协同二营继续坚持，与敌激战终日，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给敌以重大的杀伤。在七连、九连阵地前面，敌遗尸二百余具，始终未能前进一步。黄昏前，我三十团对敌实施反击，将敌压回到合理庄。

敌人东援受到我顽强阻击，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便在九月二十三日黄昏龟缩陈堰村，转入防御，固守待援。陈赓司令员令我在前线掌握战况的发展，我带参谋人员、报话机和警卫通讯班进到陈村，靠近十旅的指挥所，一面把报话机安好，静听敌人通话、发报，一面派参谋与周希汉旅长联系。在报话机里老听到罗列和黄正诚发四个字码的电报，译出来一看，罗列令黄正诚攻

官雀。黄正诚回答，也用四个字码，问罗列是什么意图。我将此情况一一报告了陈、谢首长，同时直接告知各旅。但到九月二十四日拂晓时，黄正诚着急了就在报话机里说：“罗司令，不必用号码了，要求你直接说。”罗列就在报话机里说：“我令你攻官雀是手段，撤退是目的。”我一听到立即在电话上报告了陈赓司令员。陈说：“你趁敌要撤退，立即令十旅抓住战机，迅速出击，断敌退路，彻底歼灭退却的敌人。”我亲自跑到十旅指挥所告周希汉旅长。周旅长当即部署，以三十团一部兵力由南向北进攻敌人，二十八团由西向东进攻敌人。这时，二十九团已进到陈堰村西侧，周希汉旅长发出了攻击号令，各团同时发起攻击，一举攻入陈堰村内。二十八团攻进村后，二、三营密切协同动作，迅速歼灭了顽强抵抗的一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缴获重机枪六挺。

由于敌人主要兵力已被我二十八团、三十团吸引到正面去了，二十九团顺利地深入敌之侧后，这正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迅速直插陈堰村内。该团四连一进村，就抓住敌人团部的一个伙夫，由他带路直扑敌一团团部，敌少将团长刘玉树想跳墙逃跑，被我二十九团四连活捉，敌“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黄正诚，被我十旅包围，惊慌万状，最初他还想用其火箭炮、机关枪等火力掩护，向村西南方向突围。这时，我十旅各团一齐冲进了村内，敌人遭我十旅部队连续攻击，被压到一个院子里，他派兵爬上房顶顽抗。但在我十旅各团的英勇攻击、穿插分割的情况下，敌人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大部分敌人在巷战中为我歼灭，敌“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还带着残敌一部，龟缩在村西南的一个院子内，负隅顽抗。

这时，我十一旅已全歼官雀之敌人，并已向北转移。其浮山向西的援敌一六七旅、二十七旅正赶来企图解救第一旅。我从报话机内听黄正诚急急向董剑、罗列求援。我建议周希汉旅长乘敌

动摇，援兵未到，迅速歼敌。于是周令三十团在陈堰村东南地区占领阵地，阻击西援之敌；二十八团前出至合理庄准备打敌增援部队；二十九团及旅直属部队，集中使用兵力、火器，掩护二十九团痛歼残敌，炮兵实施抵近射击，工兵以“土坦克”逼近敌人院墙，用炸药爆破，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我二十九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时，敌施放催泪毒气，阻止我二十九团的进攻，企图掩护突围逃跑。但在二十九团连续攻击下，堂堂的所谓“天下第一军”的中将旅长黄正诚，被我二十九团四连五班长李新田及二个战士俘虏了。至此，敌第一旅的第一团和它的旅直部队，共计二千九百余，被我第十旅全歼于陈堰村。

浮山来援的敌二十七旅、一六七旅，于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才进至官雀、堰村一线，他们知第一旅全部被歼，黄正诚当了俘虏，恐慌万状，不敢停留，仓促逃至临汾附近的县底镇。我十三旅跟踪追击，当晚在县底附近又歼其一部。残敌即仓惶逃回临汾城。

十旅派人将国民党“天下第一军”的中将旅长黄正诚送到陈村，我同他见面了。他还穿着绿色呢子军服，戴上国民党军的中将中衔，一见我，端端正正的立正站着不动。我十旅政治部敌工干事说：“这是我们纵队参谋长。”他就给我敬礼。我叫他坐下谈话。我说，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你会知道的，放下武器就不是敌人了。接着问他，你这次怎么当了俘虏？他不说话。我再说，没有关系嘛！你同我的陈赓司令都是黄埔军校蒋介石的学生，你们是同学，一会儿我可带你去见他。现在你可以谈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什么看法，随便谈谈吧！黄正诚带着不服气的口气说：“我被你们抓来有原因，若你们陈赓部队正规的摆开来同我们打，那你们打不过我们。”我说，怎么打不过你们呢？他说：“因为我们的武器比你们好，火力比你们强，部队训练比你们

部队正规，我们的指挥军官都是在军官学校毕业的。”我说，那为什么你们打了败仗呢？他说：“我们吃亏在你们用毛泽东先生的人民战争，我们部队一宿营，你们的民兵就来骚扰，开始的几次，以为你们正规军来了，一听打枪，我们的部队赶快占领阵地。但阵地占领后，民兵又不见了。从闻喜北进中，多次都是如此。到临汾浮山地区接近你们正规部队，又以为是民兵骚扰，结果你们正规部队四面出击包围我们了。”他又说：“我们进入你们的解放区，像个聋子、瞎子一样，找不到一个老百姓给我们带路，就是找着了也不给我们好好的带。到你们解放区一点粮食也找不着，官兵打仗、走路都要饿着肚子。所以，你们解放军能战胜我们，就胜在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全民皆兵上。”我说，你现在服气了吧！他说：“服了。我们打败仗，我被你们俘虏，主要是没有民众，失去了民心。”我说：对了。你们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必然要打败仗的。好吧，我们就谈到这里，派人带你去见陈赓司令吧。这段谈话，是很有意思的。国民党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天下第一军”的第一旅被歼灭，引起了国民党整个军队的大震惊，胡宗南的攻势，被迫停止，他痛惜发家老本的覆灭，所以大发雷霆。为此，他又亲到临汾“整饬军纪”。自此以后，胡宗南部队的凶焰大降。后继续向我进攻时，以十个旅以上兵力“齐头并进”，畏首畏尾地行动。由古亭到洪洞仅三十华里，竟走了四天工夫，平均每天走七里半，像“乌龟爬沙”一样迟缓。

解放战争初期，我晋冀鲁豫四纵队在中央军委、刘、邓首长直接领导和太岳广大人民支援下，“三战三捷”。主要原因是：

- 第一，我军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处处爱护人民，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而掀起了人民拥军参战的热潮。
- 第二，是我四纵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坚定沉着，灵活机动，

发扬能攻能守的顽强战斗作风。

第三，是纵队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打运动战，歼灭战，打有把握的攻坚战。每战集中优势于敌三至四倍的兵力，迅速勇敢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第四，陈赓同志是人民解放军中优秀指挥员之一。他指挥英明，善于“出敌不意，攻敌无备”，不失去消灭敌人有利的战机。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我在陈赓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对敌恨，对己爱”，作战指挥果断细致，相信干部，关心爱护干部，大胆使用干部。陈赓同志的最大特点是：“有功归于你，错了他承担。”他的作风非常民主，但决心一下，就不轻易改变。

二、协同晋绥军区部队保卫延安

解放战争的形势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虽侵占了我解放区的105座城市，但却付出了三十三个旅被我军歼灭的代价。现在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心厌战等致命弱点，更加暴露出来，其攻势不得不开始下降，我解放区军民在严重挫败敌人进攻的斗争中，力量迅速壮大，部队愈战愈强。在整个作战形势还是蒋攻我守的时候，局部地区已出现我军的反攻，如冀东我军，就在向敌反攻中。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卖国、反国民党独裁的斗争，正在日益的发展，起义的民变武装已达三十万人。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反动派，是下定决心与人民为敌，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他们把我军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认为是懦弱和失败，被暂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占我张家口后，蒋介石随即下令召开伪国大，同美帝国主义签订卖国

的“中美商约”，继续向我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等解放区进攻，并积极准备偷袭我民主圣地——延安。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彻底地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进一步把他自己推到绝路上。

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一举袭占延安，把我党中央领导机关驱出陕北，彻底摧毁陕甘宁解放区。为粉碎敌人袭占延安的计划，中央军委命令陈、谢率领第四纵队越过同蒲路，经吕梁山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作战。并以十二旅进入吕梁地区展开攻势，掩护四纵队通过吕梁。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我纵队党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开展群众性的杀敌立功运动，胜利完成作战和一切工作任务，以彻底粉碎敌人对我陕甘宁解放区的进攻。

晋西南战役

临近浮战役后，胡宗南在晋南已变为守势，阎锡山因屡遭我歼灭性的打击，其主力缩守晋中的盆地。我纵队抓紧战斗空隙进行部队训练，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进一步认识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的正确。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我纵在沁源县郭道召开了纵队英雄、模范大会，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总结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在这次英、模大会上我被评为战斗英雄。会后，展开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指战员纷纷表决心、订计划，积极求战，战斗情绪非常高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来电指示我纵：“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也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进”。我纵接到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后，纵队党委为保证西进的迅速突然，不致因

敌沿途阻挠，而影响西进的行动，部队集结于安泽、沁源一带。我纵开进的部署是以十二旅为先遣队，于十一月十一日，先头西渡汾河，进占汾西，了解情况，开辟道路，掩护主力西进。十一月二十日，我先遣队十二旅再次攻占汾西。纵队直属机关、第十旅、十一旅、十三旅渡过汾河后，我十一旅、十二旅于二十一日攻占大宁，晋绥部队于二十三日攻占了永和，我纵主力于二十四日进到黄河东岸。此时，晋绥的一纵已到延安，陕北部队的战备，已大体就绪。同时，敌因慑于侧后威胁，已渡过黄河的敌第一师又重返东岸。中央军委、毛主席电令我纵暂缓西进，协同晋绥军区部队，遂行晋西南战役。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率十旅的二十九团、三十团对蒲县之敌发起攻击，二十八日攻克蒲县，歼守敌一部。同时，晋绥独四旅及我十二旅、十三旅，开始向隰县守敌围攻。隰县城为阎锡山在晋西地区的统治中心，是晋西总指挥杨澄源及汾西第六专员公署所在地。敌为固守该城曾构筑较坚固的多层防御工事，自夸为“铁壁堡垒”。我攻隰县的战法，先以突然动作，强占敌外围要点堆金山阵地和周围广大地区，攻占城关后，继以晋绥独四旅，我十二旅、十三旅分由北、东南三面准备攻城。十一月二十九日黄昏，我令发起总攻，十二旅先从东面突破敌城墙，继之晋绥独四旅，我十三旅由南北两面登城，敌利用多层坚固防御工事进行顽抗，妄图坚守待援，经激战至当夜的二十一时，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俘敌上将晋西总指挥杨澄源，少将参谋长胡芳珍以下两千余人，缴获大批的粮食物资。隰县战斗结束后，晋绥纵队北上围攻中阳，我纵主力集结于隰县待机。我率十一旅奔袭吉县，寻机歼灭胡家南军一部。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在扫清吉县外围据点中，歼敌一部。接着敌守备兵力增加，工事坚固不易攻占吉县城，我即令停止攻击。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阎

锡山因中阳危急，即令刘效增率七十三师三个团，七十师两个团增援中阳。我率十二旅、十三旅随即由隰县北上，协同晋绥二纵队作战。十二月十二日攻克中阳，全歼守敌，俘敌四十五师副师长张居乾以下千余人。至此，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解放汾西、隰县、大宁、蒲县、永和、石楼、离石、中阳等八座县城，歼灭晋西守敌五千余人，为尔后歼灭胡宗南军准备了有利的战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胡宗南慑于我吕梁作战的胜利，慌忙调集六个旅，由临汾、吉县向大宁进攻，企图赶走我军，稳定晋西南局面后，再向我延安进攻。此时，中央军委指示：为发展与坚持吕梁地区，吸引胡宗南作战，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太岳根据地，确定晋绥独四旅、三五九旅，四纵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十三旅由陈赓、王震、谢富治三位统一指挥，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及其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并根据敌往返调动疲劳，胡宗南的第一师已遭过严重打击，阎锡山军又不积极行动等情况，陈、王、谢决心令我率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十三旅隐蔽集中于午城及其以东地区，待敌越过蒲县后，在蒲县、午城间，给敌第一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另以三五九旅深入蒲县以东敌人的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以独二旅留北线，监视汾阳、孝义之阎军。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敌分由临汾、襄陵、吉县出动，沿临汾、大宁公路两侧及吉县向蒲县、大宁方向前进。敌畏惧被歼，行军时，多头多路，齐头并进，宿营时，麇集一团，十分谨慎。我决心一面将主力集中，隐蔽待机，一面以小部队实施阻击、迟滞、消耗与疲惫敌人。十二月十九日，东路敌前卫一六七旅进至蒲县，南路敌四十七旅向吉县以北的和尚岭我十一旅三十三团阵地攻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占领蒲县之敌，分三路继续向

西进犯，九十师两个旅为右路，第一师之一六七旅和第一旅（重新建的）主力为中路，左路军为第一旅的一个团。当时，我决心在运动中寻机先打敌两翼，求歼敌一部。即令十一旅以一个团的兵力于和尚岭继续阻击敌四十七旅北犯，集中主力十旅、十二旅、十三旅、晋绥独四旅，由隰县以南之东、西曹村及寨子之线，向进至高家庄，南北盘底，古县、上下龙花一线之敌六十一旅实施突击。因地形险峻、运动困难，敌甚密集、不易割裂，未能全歼该敌，仅在北盘底歼敌一个多营。十二月二十五日，东、南、西三路敌人进占大宁后停止于大宁、蒲县间的狭窄地区。此时，我则采取疲困敌人的办法，以小部队四出袭扰并伏击其运输部队，迫使敌回撤增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十三旅于蒲县以北的古驿、薛关间伏击，歼敌第一师一个加强营及一个运输队。三五九旅又将临汾、蒲县间敌之后方交通切断，使敌粮食极为困难，无法解决。这时，胡宗南发现处境危急，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将主力由午城、大宁地区，分路向临汾、吉县撤退；董钊率第一旅、六十七旅沿大宁公路东撤，一六七旅、四十七旅向吉县、乡宁撤退。十二月二十九日，敌主力已撤至蒲县以东，一六七旅已达吉县，四十七旅仍暂时控制大宁、午城，后尾六十七旅尚在井沟、薛关之间。针对上述情况，我令晋绥独四旅配置于大宁、午城线钳制四十七旅，令十三旅于蒲县西北的薛关、井沟间将敌后尾六十七旅切断，令十旅、十二旅将敌包围。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敌六十七旅被我包围薛关、井沟间，在围歼中敌多次实施反扑，企图突围，均被我击溃，当日下午四时，对敌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敌除少数逃跑外，全部被歼。我为扩张战果，乘胜向蒲县推进，以求再歼当地守敌一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将蒲县城包围，歼敌一部。一月二日，敌主力回援，我主动撤出战斗。至此，晋西南战役告结束，敌袭占延安计划被迫推迟，进犯

吕梁的阴谋亦被粉碎。

晋西南战役，是我纵奉中央军委命令协同晋绥野战部队，向晋西南地区发起的强大攻势，目的是保卫延安。我先后解放县城及市镇三十余处，歼灭胡、阎匪军一万六千余人，使北起中阳，南至吉县城郊，西沿黄河东岸，东至同蒲铁路，长达四百余里，宽约三百里的广大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这一战役的胜利，把陕甘宁边区之东境与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解除了陕甘宁解放区东侧的威胁。国民党反动派袭占延安的计划被迫推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的作战任务。

汾（阳）孝（义）战役

当胡宗南集中六个旅向我吕梁地区进犯时，阎锡山即在晋中蠢动策应。他以六十九师、四十四师沿同蒲路南下，攻占了灵石、南关等地，企图配合胡宗南部队进犯我吕梁地区。此时，我查明阎军在汾阳、孝义的兵力薄弱，仅七十师两个团及四十五师一个营和当地的保安团队担任守备。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指示我军除以地方武装困扰南线胡军，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外，主力挥师北上，组织汾、孝战役。我军计划先夺取汾阳、孝义两城，调动平遥、介休地区之阎军来援，尔后集中兵力歼敌援兵。作战部署是：以晋绥之独二旅、独四旅攻占孝义，我率四纵十旅、十一旅攻占汾阳，以十二旅、十三旅担任扫清汾阳、孝义之间敌人的据点，并准备歼敌援兵，三五九旅为预备队。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十四两日，我军分别逼近汾阳、孝义两城，因敌增兵汾阳，我报陈王谢十旅、十一旅力量不足不易攻克汾阳。他们令我改为围困汾阳，吸引敌人来援。一月十七日晋绥独二旅、独四旅发起对孝义城攻击，经一夜的战斗，于十八日晨攻克孝义城，全歼守敌二千五百余人。我军攻占孝义，包围汾阳。阎锡山

大为震惊，他亲自到平遥指挥，急调九个师及由伪军改编的两个纵队，共二十五个团三万多人，于一月十八日，分路来援。其南路以三十四军军长孙楚率六十九、七十三、暂编四十四、四十五等四个师，由介休犯孝义；中路以三十三军军长赵承援，率七十一、暂编四十六等两个师及八、九两个纵队由平遥出动扰孝义、汾阳，北路以六十一军军长王靖国率六十六、七十二、暂编三十七等三个师由文水出动解汾阳之围。阎锡山倾其全力出动与我军作战。上述敌人主力于一月十九日集结于平遥、介休、义棠等地。

陈王谢为歼灭来援之敌，立即调整部署：以十旅进至孝义以南的前后营、仁顺、梧桐（离孝义城西十里处）；十一旅进至孝义城；十三旅进至三泉镇（孝义西北十二里）；十二旅进至聂村、田屯村、司马镇（孝义城北十五里）；晋绥独二旅进至西盘粮、长兴村、张魏村（孝义东十里）；独四旅进至五窑圈、居家村，三五九旅进至上村。我仍在十旅、十一旅的位置，掌握敌人整个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北路敌已进至汾阳以南的西阳城地区，中路之敌当日十时，分路向我田屯村、西河堡、司马镇进犯，十五时进占司马镇、田屯村、大貌村。十六时以五个营的兵力向聂村我十二旅部队进犯，被击退，我十二旅歼敌八十余人，南路敌直扑孝义城，进占孝义北关。当即遭我十一旅三十三团二个营由城东反击，将敌击溃，并俘虏敌四十六师二团团长以下八百余名，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六门。向东西盘粮及郑家营进犯之敌遭我打击后开始动摇，但南路敌仍有再犯的企图。我为集中力量打南路之敌，决定以一部钳制中、北两路，以少数部队防守西盘粮，诱敌来攻，主力摆于敌之侧后，以求歼敌于西盘粮及梧桐以东之野外。一月二十一日，南路敌以一部向我东盘粮独二旅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部向梧桐方向进犯，激战至下午五时。我按原

计划向敌发起反击，敌全线溃退，我跟踪追击，歼敌孙楚指挥部及六十九师二个团，重创敌人三个师，并将敌三个团包围在东盘粮，只孙楚本人及少数敌军逃回介休去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北、中两路之敌向东盘粮增援，当晚东盘粮之敌突围，已向介休逃窜。二十四日北、中两路敌人向平遥方向溃退，我主力部队当即乘势北进截击该敌。十三旅由孝义直扑西河堡、西大王村之敌；十二旅直扑万户堡；十一旅、晋绥独二、四两旅直扑盐锅头，并以一部由孙家寨、北辛武断敌退路。当日敌六十六师及第八纵队大部向北逃窜，我继续追击，并将敌一小部包围于西河堡，敌七十二师及第九纵队包围在东大王村、北船头。一月二十五日，我十旅歼灭东大王村、北船头之敌，俘敌一千一百余人。十三旅的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各一部直插敌心腹，挫乱了敌人，对敌威胁甚大，并歼灭了西河堡之敌，俘敌二百余人。我三十八团团长高子和同志光荣的牺牲。十二旅于万户堡以北，歼灭向东溃逃之敌二百余人，缴获山炮三门。二十六日，将敌四十六师、七十一师包围在中街村。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我以十旅、十一旅对中街村之敌发起攻击，但因战斗的组织不够严密，各突击队间及火力协同均不密切，故攻击未成。我十旅副旅长、党的优秀干部、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楚大明同志是役第二十九次负重伤，因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这是一个大的损失。此时，阎锡山又调集其溃兵四十五、七十二、七十三等三个师由平遥、介休经张兰镇向中街村敌增援，七十师由汾阳进至乾河村，六十六师、第九纵队进至北辛武。二十八日，各路敌在飞机、炮兵火力掩护下，向孙家寨地区我军的阵地发起攻击，被我军击退。二十九日下午，被我军围困之敌，在援兵接应下突围，歼灭其一部，大部向张兰镇方向逃窜，撤回至平遥、介休。

汾、孝战役歼敌六十九师少将副旅长王熙明以下一万六千四

百余人，缴获山炮十二门、迫击炮十九门、轻重机枪四百八十二挺、长短枪二千九百余支、各种炮弹一千五百余发、子弹二十六万余发、汽车五辆。战役中，我纵和晋绥部队，先乘虚歼灭分散之敌，攻占孝义，围困汾阳，诱敌来援，尔后，以分割歼敌的战法，积极勇猛的战斗，给了阎锡山以沉痛的打击，使晋南胡宗南军更加的孤立，为我军展开局部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汾、孝战役结束后，我纵二月上旬，由吕梁地区返回太岳区进行整训，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在晋西南战役和汾、孝战役中，我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各级政治机关、党委、支部都很重视立功运动。在每次战斗每件工作中，都贯彻了这一号召，只要有突出贡献的，就给予立功。部队里还创造了“记好学好”运动，好人好事当日登记、表扬，及时贺功奖功，送立功喜报到立功战士家，并及时传播经验，介绍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及时检查总结，提出新的计划和要求。这样形成了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广泛群众运动。二月中旬，各旅、团开了贺功大会。五百多名英雄、模范出席纵队的贺功大会，表扬英雄模范事迹，交流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克服了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增进了部队内部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伟大胜利，使整个战局都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电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为配合陕北和大别山两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令晋冀鲁豫的四纵、九纵、太岳军区的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军组成南下兵团，称为陈、谢大军，作好战斗准备，待命南渡黄河，会攻洛阳。太岳军区部队组成晋冀鲁豫第八纵队，原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调任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调第四纵队参谋长刘忠任太岳

军区司令员。于是，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到职工作。此后积极组训第二线部队，准备参加大反攻，解放全中国。

三、率太岳部队攻打临汾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晋绥军区第二纵队与我第八纵队，在王震、王新亭两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运城。这样，阎锡山在晋南地区只剩下临汾这一孤立的据点。守敌以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副总指挥梁培璜为首，指挥胡宗南的三十旅（欠八十九团）、二十七旅的炮兵营，阎锡山的六十六师全部，各县杂顽武装（保警队、还乡团）组成之保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九团，连同原有的保安十五团，补训第一、二团共八个团及五六、九、十二等四个伪专员公署、十四个流亡县政府共二万五千余人。他们不断地在城周围抢粮抓丁，发展特务组织，建立伪政权，制造谣言，破坏群众生产与我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临汾，消灭晋南地区的蒋阎军，不仅可使晋中、太原地区之蒋阎军更加孤立，便于我集中力量彻底肃清晋境残敌，而且将有力地配合西北、中原作战。为此，晋冀鲁豫军区于一九四八年二月，组织临汾战役，以徐向前副司令员为首组成前方指挥所，命我太岳军区部队配合主力第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吕梁军区的第三旅、第七旅解放临汾。并决定三月上旬，开始发起临汾战役。

根据徐副司令员的指示，我亲率第一军分区的四十一团、四十二团，第二军分区的四十四团、四十五团、四十六团集结洪洞城东之苏堡、尹堡、蜀林、古县村一带；第三军分区的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四十九团集结在运城等地，积极进行练兵并做攻取临汾的各项准备工作。军区的工作交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

鹤峰同志和方升普副司令员负责。遵照徐向前副司令员指示，我率领部分参谋、政工人员先行出发，进到临汾周围实地侦察。经实地勘察和地方同志报告：临汾城的地势较高，四周城墙均依托自然地形砌成，俗有“卧牛城”之称，素为晋南军事屯兵的重镇。阎锡山妄想依此恢复其对晋南人民的血腥统治，将临汾城附近五至十里的大小村庄，利用自然地形及坚固房屋，构成衍生据点，遍设铁丝网、鹿砦、地雷等作为付防御。城垣周围一至三百公尺处，则筑起坚固的护城据点。各护城据点除有核心阵地外，四周遍设有伏地碉、野战工事及各种附防御，以暗道、交通壕相互贯通，并取得城墙之上、中、下三层火力点（上为掩盖工事，中、下层为暗道工事）及城内炮火的支援，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特别是城北之四号碉、五号碉（日本坟）、八号碉（兴隆殿），城南之二十号碉和东关之发电厂等阵地，更为坚固复杂。各据点相距二至四百公尺，火力均能互相支援。另在城墙外，挖了一条环城的外壕，宽八至十公尺，沿外壕构筑有火力点，壕底加筑有地堡、暗堡，与城墙之三层的火力点共同构成立体的交叉火网。城内有环城的内壕，沿壕的火力点与城内核心工事。沿街工事，炮兵阵地、城墙上的反射火力点等，构成纵深的阵地，确是相当坚固。我将整个地形、工事构筑情况查清后，直接到前方指挥所向徐向前副司令员当面作了详细的汇报。

战役发起 外围争夺

向徐向前副司令员汇报后，我即回到军区指挥所——苏堡。召集一、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刘聚奎、梁文英、涂则生、李培信及各团长政委开会，研究所侦察到的临汾情况。分区和各团的情绪很高，但信心不足。因为分区的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坚战，我们又没有重火炮，只一门“九四”式山炮，“八二”迫击炮

每团有四门，但弹药不多。研究的结果是：靠炸药、手榴弹，靠部队土工作业，挖交通壕，抵近敌人的碉堡、工事，即做“土行孙”来克服这种困难。这个会开得很好，统一了这种战法，各分区、各团负责同志回去进一步作政治思想动员和战斗准备工作。

第一，开始临汾城的外围作战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得悉临汾守敌胡宗南的第三十旅开始空运西安，增援西北战场及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部出扰襄垣、汾西地区。前方指挥所决定，于三月七日发起临汾战役。我太岳军区部队除以第二军分区的四十五团位于灵石、霍县地区准备打援外，为扫清临汾城北敌人的外围据点，给攻城战斗开辟道路，即令四十二团、四十六团由洪洞地区星夜赶往临汾。七日拂晓，四十二团以一营攻击高河店，二营攻击南北焦堡，三营攻击南北孝村，该团各营同时进入战斗。一营的第二连首先以猛烈的炮火摧毁敌人的桥头工事后，发起冲锋夺占了敌阵地。同时第一、三连由桥西徒步过河插入高河店村西将敌包围，配合二连正面攻击。至上午十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一个连。二营攻击南北孝村、郭家庄的战斗中，敌人大部逃跑，只俘虏数人。三营攻击南北焦堡，因地势较高，且敌人筑有坚固工事，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才全歼守备的敌人。四十六团到达指定的位置后，于三月十四日，向玉皇顶之守敌保安第十五团一个营进行攻击，因战斗组织不严密，突击队的行动迟缓，守敌大部逃跑，该团部队占领敌人的阵地时，仅俘敌十余人。

与此同时，我兵团主力迫近临汾城南机场，击毁正在起运的两架飞机。待运之敌窜回城内时，敌空运计划已被粉碎。乘此，我军攻取了城南之尧庙宫、东西赵村等地。我城东的部队攻占了崔家疙瘩、黄土包、火车站等据点。由于外围战斗顺利进展，大大地鼓舞了我参战部队的士气，增强了攻克临汾的信心。

第二、攻打四、五号碉的战斗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前指决定由城东、城北两面攻城，城南为助攻方向。并令我军区以四个团的兵力位于北门的东段地区，攻打四号碉、五号碉，得手后即以此作为登城的阵地；以两个团在城南配合八纵的二十二旅进行佯攻。我决定以四十一团攻取四号碉，四十七团攻取五号碉，并以四十六团、四十八团位于城南配合二十二旅担任佯攻任务；其四十二团、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四十九团我亲自掌握，作为机动力量。

四号碉，位于城的东北角护城壕的二十公尺处，整个阵地高出自然地面五公尺。其所占的面积，东西长三十公尺，南北长二十公尺，上面有圆形的主碉一个，高十公尺，周围有暗堡、明堡各六个，两道外壕各宽八公尺，深五公尺，铁丝网两道。该碉离城墙八十公尺，是护城的主碉之一，东距三号碉三百公尺，西距五号碉五百公尺，它们可作相互的依托。我四十一团三月十九日接受任务后，决心用坑道爆破的手段攻占四号碉，以该团第四连为第一梯队，其余的部队开始挖交通壕，向敌人阵地的前沿推进。临汾城的东北角是一块开阔地，约一千五百公尺长，无法接近。四十一团挖交通壕的办法是白天分配地段，到天一黑全团排成两路纵队，静悄悄地挖，约三个小时初步挖好。其交通壕面上，用树杆、门板架起铺上泥土，用一个夜晚就接近四号碉。部队一切战斗准备都在暗的交通壕内进行。二十二日，进至距敌四号碉的外壕三十公尺处进行坑道作业。二十三日黄昏，四连进入阵地，在组织好了的火力掩护下，以坑道爆破向四号碉攻击。但由于坑道距离测量不准，而在四号碉的外壕之外爆炸，突击队冲至外壕不能通过敌火力阻击，该连伤亡十七名而攻击未成功。这时我迫击炮连立即把炮推进平射，重新组织火力掩护，进行第二次攻击。爆破小组非常英勇，对敌三道外壕及两道铁丝网进

行连续爆破，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晚二十四时，在各种炮火和投弹组掩护下，突击队顺利突破敌人阵地。敌人这时缩入四号碉的主碉和西南角上的地碉内顽抗。四十团的团长李成春，亲自在前面指挥，又增加一个排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于二十四日拂晓前，全部占领四号碉阵地，全歼守碉之敌。四连完成占领四号碉任务后，即撤下来休息，由六连坚守四号碉阵地。该连进入阵地后立即改修工事，以防敌人反击。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敌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向四号碉阵地连续反扑。由于六连不善于构筑工事，加之坚守阵地的思想准备不足，致四号碉又被敌人夺占。敌人占领后，以八十八团一个连防守，并重修工事。当天的晚上，我又令四十团对守敌连续攻击四次，四号碉又为我攻克。之后，四号碉阵地交给四十二团防守。在我再克四号碉后，敌仍继续不断地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我之兵力连续反扑，一日之内竟达九次之多，战斗异常激烈。我坚守部队有时在弹药无法补给，兵力无法增援的情况下，英勇顽强独立作战。如二连的第二班只剩下五人，而敌人已冲击到我阵地前沿，副班长张国金挺身而出手提一包炸药，将正在架梯之敌十余人完全消灭。最后只剩下张国金和战士王国富两人，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击退敌人，守住了阵地。在坚守四号碉的十八天中，共杀伤敌五百余人。张国金同志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他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传遍了全军。

五号碉，位于城东北角以西的五百公尺处，距城墙二百公尺，地形较高，周围有削壁，阵地内筑有主碉一个，高十公尺，周围筑有地堡群。阵地的正面及东、西两侧有两道外壕，深、宽各七八公尺。外壕的外沿设铁丝网三道，布雷区两处。此据点，南靠城墙，东、西与四号碉、兴隆殿紧紧相连，火力均能有效地互相支援。守敌为胡宗南的三十师第八十八团三连的两个排和阎军的

一个中队。我四十七团接受攻打五号碉任务后，即进行四昼夜的土工作业，构筑堑壕、交通壕五千余公尺，并做好了各项攻坚的准备。三月二十三日，与四十一团攻击四号碉的同时，该团以第一营二连为突击队，第三连为第二梯队，向敌五号碉发起攻击。由于我火力集中，突击动作的迅速，很快就通过布雷区，破坏了敌人铁丝网及外壕，架梯登上削壁，夺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歼敌三十多名。但在此时误将较宽堑壕当成第二道外壕，发展到第二道外壕时，遭敌强烈抵抗，突击队伤亡很大不能继续发展，第二梯队被敌人火力封锁不能增援上去。因攻击未成，即转为巩固已得的阵地，当晚，继令第三连发起第二次攻击，又因地形不熟，进攻数次仍未成功。尔后采取坑道爆破，继以二连、八连先后向敌发起攻击。又因步兵、炮兵协同不好，坑道的方向偏差，连续两次攻击均未成功。

攻击五号碉，四次未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该阵地是敌人城上和兴隆殿等地火力严密控制下的一个据点，居高临下。当我每次攻击时，均遭到猛烈的炮火阻击。加之，我事先对地形敌情的侦察了解不准确，如原了解守敌胡宗南的部队一个排，实际上是两个排，还有阎锡山军的一个中队。地形、工事方面，我前沿阵地距敌外是八十公尺，而误测为五十公尺，且把敌人护城壕误认为是主碉。在战术上，没有组织佯攻部队，没有部队钳制敌人，攻击中，步、炮、工协同动作不一致等，致使我多次攻击均不成功，这是很大的教训。

三、第三，攻占一、三号碉的战斗

三月三十一日，前指令我军区部队位于东门以北的城墙第一突出部，至城的东北角以东地区，控制城垣的外壕，扫清登城障碍，保证破城坑道作业的安全。我决定以第一军分区的四十一团攻占三号碉，第二军分区的四十四团攻占一号碉。四月七日，四十

一团三营配属山炮、重迫击炮各两门，对三号碉发起攻击。因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爆破组前进到外壕附近时，伤亡过重不能遂行其任务；梯子组亦未架好梯子；突击队形又拥挤遭敌很大的杀伤，攻击受挫。四月十日，我采用坑道爆破将敌第一道壕炸毁，突击队即迅速占领阵地突入三号碉，全歼守敌一个连，并连续打退敌人数次的反扑，巩固了阵地。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四十四团九连，向敌一号碉发起攻击。由于战前发扬了军事民主，班、排、连各级干部反复的观察地形，战斗的组织细致，战斗中火力、爆破和突击三者协同一致，所以在战斗一小时内攻占了一号碉，歼灭守碉之敌补训一团四十余人。之后，敌数次向我反扑均被我击退。二十五日，敌又以三十师的第九十团二营，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九连反扑，最后，我九连只剩下五人，退守到阵地的一角顽强扼守，并配合增援之第五连将敌人击退。九连战士李云奎左手被弹片炸伤了，怕伙伴们看见让他下火线，就取下帽子盖住伤口，继续用右手与敌战斗，直到打退敌人反扑才下火线。卫生员给他上药时责难他说：“这样重的伤为什么不早来上药。”李云奎回答说：“丢了手没有丢了阵地，这是合算的买卖”，真令人感动。至此，我军部队控制了环城外壕一百八十余公尺的地带，为进行坑道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进行破城的坑道作业

在开始外围的战斗中，我们就研究了毛主席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术指导原则。我军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临汾的作战，没有重火炮怎么办？这就想到我们军区自造的黑色炸药很多，坑道挖到城墙下装上大量的炸药破城，这是唯一的办法。而且临汾城内除消灭的部分敌人外，还有一万多人，就是有强大的炮火掩护，架上了云梯，登上城墙，亦难以歼灭城内

的敌人。这也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攻打曲沃城的沉痛教训。三月三十一日，前指开会时，徐副司令员面示我说：“挖坑道，你们这种做法很对，当‘土行孙’、做‘土狗子’钻土，现在是破城的唯一办法。但必须控制城垣的外壕，扫清登城障碍，保证破城坑道作业的安全，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坑道作业的任务。”

为加强对破城坑道作业的领导，我于四月一日，责成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涂创生同志、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尚思光（他是工兵学校毕业）、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胡立声三同志统一领导，组织坑道作业指挥所，指挥各分区工兵连，加紧进行破城的坑道作业。并令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我给涂创生、尚思光、胡立声三同志指出：第一，加强对坑道作业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坑道口必须十分隐蔽，以防敌人发现和破坏；第三，通过城壕底下后，出土是个大问题，要解决推土的车子无响声；第四，测量距离、掌握方向必须准确；第五，大量炸药运进坑道时，要做到绝对安全，等等。还有其他问题我没有想到，希望你们指挥所认真研究，以能顺利完成两条破城坑道作业任务。

五月上旬，敌人发觉我进行破城的坑道作业，于是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坑道的斗争。如：沿城墙内东北两向，每隔五十公尺构筑坑道，以单道直进埋上大水缸听我挖坑道的响声；挖丁字形的坑道专炸我之坑道；在地面上组织小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对我坑道作业进行破坏。敌数次突击到我坑道口不远，均为我部队迅速击退和消灭。在破城的坑道作业中，我工兵部队发挥了机智顽强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办法，胜利地完成了两条破城坑道作业的任务，其中的一条对攻克临汾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攻克临汾 全歼守敌

经过两个多月的外围争夺战后，敌人伤亡惨重，兵源枯竭，虽将地方伪政权人员、警察、学生等强迫编补参战，但作战部队的总数不到万人了。同时经我军长期围困，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士气十分低落，物资供应专靠飞机投掷，非常困难。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旬，我工兵部队胜利完成破城坑道作业，一条装上黑色炸药六千公斤，一条装上黄色炸药一千公斤。前指决定于五月十八日总攻临汾城，部署是：以十三纵队的三十七旅由大东门以南炸开缺口登城，三十八旅位于城南助攻，三十九旅位于城西赵村地区堵截溃敌；以八纵队的二十三旅、二十四旅于大东门北至第二突出部并肩登城，二十二旅于汾河以西担任堵击；我军区部队以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各一个营为二十三旅的第二梯队，四十七团位于汾河西配合二十二旅堵击溃退之敌，其余部队控制城北三号碉至郭庄一线担任助攻。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发现敌人企图破坏我坑道，前指遂命令提前攻城战斗，十七日十九时我两条坑道爆炸均成功，炸开城墙两个缺口，一个是三十九公尺的大缺口，另一个是七公尺缺口。我四十一团、四十二团跟随突击队迅速登城并向城内纵深和两翼发展。整整战斗一晚上，十八日拂晓，攻临汾城战斗胜利结束，敌首梁培璜等率小部残敌从西门逃跑为我堵击部队俘虏。至此，临汾守敌全部被歼，临汾宣告解放。

我军区部队奉前指命令担任临汾的城防任务，我兼任城防司令。以四十四团进驻城内，执行城市警备任务。军区党委三月六日对前指发出“对于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七项规定”，攻占临汾的当天又发出“为纠正部队中所存在着的游击习气与作风的五项规定”，在部队中经反复讨论进行了深入宣传教育。因此，在战斗、接管以及执行城防警备的任务中，均严格地执行了政策、纪律，

我军区参战部队顺利地完成了前指挥所给予的各项任务。

参加临汾战役，我太岳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转为正规的攻坚战。全体指战员初步学会了攻克坚固城市的战斗经验，特别是爆破和坑道作业技术大大提高，通过组织干部实地研究敌人的阵地编成，临汾城墙的高度、厚度，工事构筑，做出作战部署以总结经验教训并在现场组织实兵演习等，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攻克坚固城市的正规作战，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战术上和纪律上作充分的教育训练，精心地计划作战部署，周密的组织战斗，细致的对敌情侦察和研究分析。战斗中必须善于组织好步兵炮兵的协同，发扬短促火力，运用爆破和小群战斗动作配合。临汾战役得出经验，没有重型炮火只有学“土行孙”、做“土狗子”挖坑道爆炸城墙，才能够胜利完成攻占坚固城市的作战任务，这为以后攻占太原打下了基础。

四、晋中战役

临汾战役后，阎军在晋中占据着十五座城市及周围的村、镇，屯驻了五个军，十三个师及八、九、十等三个总队，二十三个保安团，二十一个交警大队，共约十三万人。在赵承授指挥下，凭借着这些残留的反动武装，拼命抓丁、抢粮，加紧抢修碉堡、工事，妄图阻抗我军解放晋中地区。我华北军区为了营救晋中人民，削弱阎军力量，创造解放太原的有利条件，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旬组织晋中战役。我军区部队在临汾战役之后，奉命北上，参加晋中战役。

打阎军亲训师 攻占张兰镇

临汾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把打临汾部队任命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同志为副司令员。

兼副政委，陈漫远同志为参谋长。我太岳军区部队升为第十五纵队，但晋中战役仍以原番号参加作战。奉兵团首长命令，立即沿同蒲路北进。第一军分区部队为四十三旅，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解放灵石；第二、第三军分区为四十四旅、四十五旅，于六月九、十两日，先后由临汾地区出发，十六日全部集结灵石城东北的静升镇地区待命。我四十六团于六月十七日晚，以突然的动作包围介休的洪山镇，该镇的守敌狼狈逃窜，四十六团占领了洪山镇。十八日，我四十二团连续拔掉介休境内的东西胡龙、上下岑模及上梁等四个据点，全歼守敌杂顽军三个连。我四十一团相机攻下张良、崇贵等村，将敌“爱乡团”一个连及洪山镇逃去之敌一并歼灭。二十日，我四十三团直插介休邬城店，截断了由汾阳、孝义回窜之敌亲训师的交通。敌在其炮火掩护下，分头向我四十三团猛扑，企图夺路北逃，均被该团击退，阎军亲训师师长陈震东亲率主力向我四十二团一营的霍村阵地进攻，并突破该团二连的阵地，跃进到一营指挥所。这时的情况是非常紧张的，我杨清奎营长、尹建中教导员挺身而出带头冲击把敌击退，敌师长陈震东被我击伤。我第一军分区主力则由南北王里、邬城店地区向敌后直插，与敌反复拉锯，激战终日，敌我双方伤亡均大。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我率二、三军分区部队到达介休县的张兰镇以西地区，在大甫遇敌运动，以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之行军纵队，将敌截成数段后，部队即向混乱的敌人猛冲，压缩敌于汾河滩上，进退维谷，大部为我歼灭。残敌一部乘黑夜逃入张兰镇，以阎军四十四师老虎团固守张兰镇。此时阎军主力仓促北移，其张兰镇之敌陷于孤立，增援断绝，士气低落。经过详细侦察、周密组织后，我决心以军区主力攻克张兰镇。采取爆破与炮火摧毁相结合的战法，开辟冲锋道路掩护部队的突击，六月二十四日十七日，发起总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攻占张兰镇，

全歼敌两千余人，缴获武器弹药甚多。攻克张兰镇后，兵团命我军一部迅速向榆次、太谷挺进，此时，晋中战役第二阶段战斗，正在猛烈的展开。

英勇顽强的董村阻击战

阎锡山主力之三十三军集结于平遥洪善，三十四军集结于祁县的大小阎村及榆次、太谷、祁县之徐沟广大地区。兵团首长决定佯击平遥，诱敌南下，然后，我主力突然北上，争取在祁县、太谷间的地区歼灭敌人。兵团命令各纵队及我军区部队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晚，均以突然的动作进入指定的位置。我奉命率领部队兼程北上，协同肖文玖部，截断榆次、太谷段的铁路阻敌北窜。七月二日晚出发，一夜行军八十五华里。我一分区部队于三日拂晓前，已进至榆次、太谷间之董村、沙沟、沟西和北桑梓一线，立即炸毁了董村的铁路桥。构筑工事坚守，堵击北撤之赵承授部。第二军分区的四十四团，三日晚驱逐了上下丁里之敌，四日破坏铁路三公里，攻占了孟离村。五日敌六十八师一个团乘车南下增援向我四十四团阵地猛扑，四十四团在友邻部队的策应下立即出击，将敌击退，粉碎了敌人南援的企图，保证了我董村阻击部队侧后的安全。

董村位于太谷城以北七公里之铁路东侧，是通往太原的咽喉。被我控制后，就完全切断了赵承授军逃向太原的归路。因此，赵承授不惜一切代价，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九个步兵团附山炮三十余门，轻、重迫击炮四十余门，并于七月三日九时，由南北两侧开来铁甲车，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我董村阵地。十五时，敌以九总队四个营，分三路先后攻击董村，遭我杀伤后，于黄昏撤回铁路西侧，构筑向我进攻的工事。四日的十三时，敌集中七十一师，老虎团残部共四个团的兵力，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同时向

我董村、沟西、北桑梓等阵地攻击。当敌进入我火网时，我四十一团即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死伤惨重，狼狈逃窜。五日的十一时，赵承授令三十军军长沈瑞亲临指挥七十一师、四十六师第二团、十总队（缺一个团）亲训炮兵团、亲训机枪团一个大队，装甲汽车三辆，铁甲火车两列，先以猛烈的炮火向董村阵地轰击，而后以七十一师二团，配合一个日本兵连，在飞机掩护下，向我董村阵地猛攻。敌占我董村阵地前面的小庙后，继续在装甲车掩护下，向我四十一团四连阵地突击，遭我短促火力杀伤后，又缩回原地去了。当天晚上我四十一团组织小部队全面出击，除守小庙之敌外，其余敌均被我击退至铁路以西。这就增加了敌向我攻击运动距离，便于我的火力杀伤敌人的突击部队。

赵承授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攻击的次数不断增多，兵力、火器大量增加。我发动全体指战员大力构筑工事，特别是火力巢、避弹坑等主要工事，在敌人可能突击的地方，构筑了弧型工事。组织了三层火网，迫使敌无法接近我的前沿阵地。我坚守阵地的部队，在敌炮火和飞机的猛烈轰击下，凭借坚固的工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战士们反映：“做好工事避弹坑，不怕敌机、火炮猛轰炸！”七月六日八时，敌人又以飞机四架，装甲汽车五辆，以步兵密集队形再次向我董村阵地猛扑，当装甲汽车开进到村口时，被我四十一团四连徐英战斗小组上房顶以“手提包”的炸药炸毁了敌装甲车，并将企图爆破我占之房屋的敌人歼灭。敌后续部队不敢前进，即狼狈地向后逃窜。

董村的阻击战，历四昼夜，击退敌人十数次攻击。全体指战员自始至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勇气。我四十一团三营，在坚守到第三天时，全营干部仅有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和排长各一人了，所有的机枪只有两挺能用了，迫击炮弹、六〇小炮弹全部用尽，各种子弹也剩下不多了。这时敌人的攻击愈来愈疯狂，装甲

汽车进到距我阵地前沿只有五十公尺，掩护其步兵向我连续攻击。但我三营战士英勇顽强地守住了阵地，班长冯有喊：“同志们，我们是党军，是人民的军队，誓与阵地共存亡。”战士焦正和对敌人喊：“我是临汾过来的，你们投降过来吧！不过来就送你回老家去。”一个阎锡山军官站起来答：“你为什么去当共匪，缴枪回来吧。”战士张鸿彦把枪一举说：“对，给你一枪。”叭的一声响，把这个军官打倒了。象这些生动的事例是很多的。但在这紧张激烈战斗情况下，也有的干部坚持不住了。如一分区委就在电话上向我建议说，这种牺牲没有什么价值，要求把四十一团撤出董村。我回答：“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能后撤，到必要时你们分区部队增援上去，坚决守住董村。”战斗确是愈来愈激烈，到第四天，敌人猛突我四十一团六连阵地。六连第二排战斗到只剩下李三水、解三保两个战士，依然坚持阵地与敌搏斗。最后在友邻战斗小组支援下，终于守住了阵地。

董村的阻击战，我四十一团整整坚持了四昼夜，总歼敌千余人，敌人妄想窜回太原的企图归于失败。兵团首长表扬说：“你们光荣地完成了董村阻击任务，因为你们吸引住了敌人，切断了铁路，使我兵团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特给四十一团立战功。”

攻占榆次的东阳镇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十九时，我用电话将四十一团董村阻击战的情况，向徐司令员汇报了。徐司令员指示：你们守董村兵力要加强，并迅速夺占东阳镇，把太谷至太原的铁路线完全绝断，以利于兵团主力全歼赵承授部队。我于七月六日令第三分区之四十七团迅速攻占东阳镇，并令三分区司令员蒲大义、政委车敏樵，率其主力进至榆次的车辆村，与晋察冀军区派出的肖文玖部队取得联系，使赵承授军无法窜回太原。我四十七团顺利攻占东

阳镇。这时敌郭宗汾部两个团和一个机枪团，于七月七日南援接应，企图恢复榆次、太谷的铁路交通，遭我三军分区部队和肖文玖部痛击后，立即缩回太原。此时，北起东阳，南至董村铁路线及两侧地区全部为我控制，赵承授军完全陷于被歼命运。我控制了铁路桥，阻击了敌人，争取了时间，完成了阻击敌人窜回太原的任务，这对兵团主力全歼敌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小常战斗 大量歼敌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夜，赵承授军主力被迫离开铁路，企图由榆次、徐沟间北逃太原。我部奉命由东阳镇地区配合车辆村肖文玖部西插，与十三纵接通，切断敌向榆次北逃的归路。吕梁部队亦进到榆次以西地区。至九日晚，全部包围赵承授部于大、小常村及其周围的村庄内。八、九两日，敌在七架飞机的掩护下，分路向北突围。一路向我四十五团阵地猛攻，一天之中向我攻击八次之多。另一路猛犯我肖文玖部之车辆村阵地与十三纵布防的阵地，均被击败。七月十日，兵团发起总攻，八纵队攻大常村，逐村攻击，紧缩包围。我部以四十四团、四十二团向南席之敌攻击。由于对该敌监视不严，警戒疏忽，敌十总队一部乘夜突出南席，向太原逃窜了。所留残敌两个连，于十三日下午，被我全歼，我遂占领南席。这时，我四十五团攻占了新戴村，毙俘敌千余人，缴获山炮三门，其他炮二十余门。

七月十六日，我兵团主力攻占了西范村，赵匪三十三军及十总队残部被压缩到小常村内，该敌凭借坚固的房屋和野战工事顽抗。同时，阎军组织四十五师、四十九师和四十师残部南援的兵团，亦进至榆次西南之怀仁、王都地区，企图接应赵承授部突围。十六日的十时，赵承授残部组织千余人，向我四十四团二营攻击，我二营前沿阵地被敌突破，该团第二梯队迅速发起反冲

击，敌被打垮，向东溃逃又遭我痛击。另一路在其飞机掩护下，向东北突围，妄想与其南援兵团会合，遭我反击又缩回小常。我们军区部队兵团命令歼灭小常的敌人，十三纵一部配合作战。正在炮火准备时，敌以一个团兵力向南突击，妄图掩护其主力向东北方向突围窜回太原。我四十二团、四十四团趁敌突围混乱之际，从东北、东南分三个尖头，一举突入小常村内，我亲率军区主力相机投入战斗。这时，十三纵配合攻击的部队，亦同时突破敌人阵地，在村落及野外展开了激战。二小时内即将小常村之敌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区部队歼敌一万六千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

晋中战役，使我军区部队学会了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本领。从整个战役说，敌数量多于我军，然而我调动了敌人，自始至终争取了主动权；在战术上，大胆深入敌纵深，插断敌人的退路，打乱敌人的部署，致敌于死命。我军区部队的战斗力普遍地提高了，进一步熟练了攻坚战、运动战和村落战的战术运用，不少的团队亦解决了坚守防御的问题。特别是四十一团坚守董村的阻击战，表现顽强，敌虽以数倍于我之兵力，在飞机、战车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攻击，而我四十一团的阵地屹立不动。在阻击敌人的进攻中，该团灵活地运用了游击式的防御与阵地防御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以轻机枪为骨干结合步枪组成阻击小组，活动于敌阵地的两翼和纵深，打击敌人散兵和单个重要目标，拖延敌人进攻我的时间，造成敌对我阵地编成的错误判断，有力地配合了主要阵地防御。

五、十五纵队榆次练兵

我军区部队经过临汾、晋中两战役的锻炼，战术素养有大的

提高，初步学会了大兵团协同作战。部队建设方面，装备有所加强，组织日趋健全，提高了政治觉悟水平，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游击习气和地方性逐渐克服，奠定了向正规化迈进的基础。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我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以我为纵队司令员、袁子钦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司令员，熊奎为参谋长、高得西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分区为四十三旅，林彬任旅长、梁文英任政委、张希庸任副政委，下辖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团；第二军分区为四十四旅，涂则生任旅长、李培信任政委，下辖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团；第三军分区为四十五旅，蒲大义任旅长、车敏樵任政委，下辖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团。我太岳军区部队正式列入野战部队的行列，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半年多来的连续作战，部队的成员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干部大大增多，老战士大量减少。大批的解放战士补入部队，各团队的新成份已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以上。大多数连队中除班长以上干部和少数老战士外，多半都是新解放的战士，连队的党团员比例，降到不足百分之十五，班长党员很少，有的连队没有战士党团员。刚补进连队的解放战士没有经过诉苦和系统的政治教育，其思想很复杂。如说：“卖瓜不肯说瓜苦。阎锡山说，他是革命；八路军说，他是革命。还不是一样。”“八路军说得再好，总不如在阎锡山军队赚钱。”等等。受过短期训练的解放战士，有的还公开要求回家。上述思想直接影响到部队巩固、练兵和战斗任务的完成。为此，纵队党委遵照兵团“先诉苦后练兵”的指示精神，决定全纵队首先展开诉苦运动。在诉苦运动中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使解放战士对我人民军队本质有了较明确认识，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划清了阶级界限，“不要忘

记阶级苦，更不要忘记血泪仇！”提高了阶级觉悟，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建党、建军、练兵、作战奠定了基础。

诉苦运动后，我纵各旅、团均先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转入军事练兵。以“单兵爆破、火力掩护、小组突击”的战术动作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为主，尤其根据阎锡山碉堡构筑情况，以爆破作业和攻夺洋灰碉为重点。在练兵开始前，各旅集中了一批干部（班、排、连）作了短期训练，培养练兵的骨干。干部经过集训后，提高了训练部队的能力，加强了责任心，能以身作则，发扬军事民主，走群众路线，因而激发了部队的练兵热情。战士们普遍地反映：“干部们学好了，将来带领我们完成作战任务，就不会叫我们乱碰了。”

练兵工作在纵队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逐步深入，发扬了军事民主，克服了种种困难，改进了教学方法，巩固了学习情绪。从而使战术、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尤其对爆破和攻取洋灰碉的思想顾虑及战术动作，解决得比较好，收效比较大。这对攻打太原外围据点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攻打太原外围据点

太原是山西省会，阎锡山统治了三十余年。山西广大农村和城镇为我解放后，太原陷于我四面包围之中。太原城东是大山，汾河往西还是山，太原好象个锅底，孤单摆在汾河滩。阎军的官兵自己讲：“太原形势象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石嘴子和风阁梁，好比眼睛高又亮，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象五脏”。这说明太原的地势，东山在战略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消灭困守太原的蒋阎匪军，彻底摧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反攻作战，我华北野

战军第一兵团，奉命组织太原战役。

攻击秋村之敌 控制武宿机场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敌四十四师、四十五师，亲训师一部，沿汾河与铁路之间向南扩张，三日进至太原城南十五公里的小店镇。敌四十八师、四十九师、三十七师、十总队，进犯榆次的秋村。六十六师、六十九师集结小店以北的红寺地区，企图大肆抢粮，以备扼守太原。兵团首长决定在太原碉堡地带外的地区消灭敌人，创造攻占太原的有利条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发起太原外围战。命令我纵向秋村、武宿之敌进击，歼敌四十九师，并以一个旅控制铁路线上之辛营，切断敌之退路。纵队决以四十三旅围歼秋村、武宿之敌；四十四旅以一个团插入辛营，攻歼该地之敌，并切断武宿、秋村之退路，其余二个团位于刘村、鸣谦镇机动；四十五旅位于沙沟、河口、小峪口一线，监视东山的敌人，并为纵队二梯队。

进犯秋村之敌，是阎军四十九师一、二团共两千余人，附山炮两门。十四日晚，我四十三旅第一二七、一二八团，分头向秋村秘密运动，于十月五日五时，突然发起攻击。一二九团插进秋村、武宿间进行堵击。当我一二七团进攻敌人时，为敌发觉。敌以一个排沿水渠迂回至三营阵地的侧后，向我猛袭，但该团五连将敌驱逐走了。由于敌情、地形侦察不详，攻击准备仓促，未达到“出敌不意，攻其无备”的目的。在战斗发起后，各营没有很好协同动作，致失去战机，使守敌大部逃窜入武宿机场的碉堡群内。武宿守敌二一八团的三营营长，经我劝降无效，我四十三旅十一日十四时发起攻击，以火力掩护，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的动作夺占了敌人指挥碉，俘敌四十余人，敌二一八团三营营长被俘。这时即令敌营长劝降，促使武宿周围碉堡之敌营以下官兵三

百余人全部投降，我仅轻伤二名战士。这显示了猛打加瓦解的战斗威力，提高了部队攻打敌洋灰碉的胜利信心。至此，武宿机场全部为我控制。

打开东山大门 攻占石嘴子阵地

我纵奉命打开东山大门，攻占石嘴子阵地，歼灭罕山之敌；而后，向四要点之一的淖马要塞阵地进攻。纵队决以四十五旅为主攻，占石嘴子后协同七纵围歼罕山之敌。石嘴子是太原东山阎军防线南侧之要害（城东南十二公里），有主碉四个，小碉十六，分四大阵地。周围伸出许多暗碉，外壕宽五公尺，深八公尺，为太原东山南侧最高点。守敌为保安第八团、十五团。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晚，我一三三团附山炮四门、迫击炮六门，由黄土坡向小西沟敌阵地进攻。七日四时，发起攻击，六时半占领小西沟、田家窑等敌四个野战阵地，守敌逃窜，一三三团即向石嘴子推进，八日攻占石嘴子以东高地，以浓密的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敌阵地，该团以二百公斤黄色炸药，连续爆破胜利攻占石嘴子第一阵地。接着该团第三连攻击敌第二阵地时，山炮协同不周，部队前进中炮弹打伤自己十余人，架好的梯子被自己的山炮打断，因而未能成功。十日该团重新组织攻击才占领第二阵地。至十一日的二十时，我一三三团攻占石嘴子全部阵地。这时我亲到石嘴子设纵队指挥所。观察太原城外，但见碉堡林立，并可望见太原城。

十月十二日，敌乘我军立足未稳，即以四十师、八总队各一个团和奋斗团连续向我反击，均被我短促火力击退。我一三三团二连乘胜攻占敌指挥碉。敌八总队二个团在炮火掩护下突然向我二连反扑，因我火力支援不上，又被敌重占。十三日的五点半，我一三三团二、三营连续攻击三次未夺回指挥碉，十时，敌

四十师三团，八总队二团，奋斗十三、十五团共分四路向我石嘴子既得的阵地进攻，连续向我冲击四次均被我击退。十六日，我以一三三团一营攻敌指挥碉，二营攻敌二号碉，守敌大部逃窜，我仅俘敌十余名。至此，石嘴子敌阵地，均被我夺占；阎锡山东山的坚固防线已被我纵突破。这主要是四十五旅一三三团的战功，纵队给该团发出了文字嘉奖。

攻占石嘴子战斗的主要经验是攻坚必须同时准备坚守。我一三三团在进攻前，从思想上、物质上对巩固既得阵地准备较好，占领阵地后，立即向正面及两侧延伸低层工事，预备队配置于阵地侧后，以不致被敌炮火杀伤，保存了有生力量。如一连三十余人固守三号碉，敌八总队两个团，在其飞机、炮火轰炸下，数次向一连阵地反冲击均被击退，巩固了已得阵地。这是坚守已得阵地很好的范例。

英勇顽强地攻 守漳马要塞

太原东山大部地区为我控制后，兵团令继续向敌内线攻击，坚决夺取牛驼寨、小窑头、漳马、山头四大要点，开辟攻城道路。我纵奉命攻占漳马要塞，配属日式榴弹炮六门、美式榴弹炮一门、三八式野炮五门、十五公分迫击炮三门、十二公分迫击炮四门，得手后，续向伞儿树方向推进。漳马位太原城东五公里处，为四要点中距城最近处，是我攻城之主要障碍。攻克漳马后，即可居高临下直逼城垣，是我攻城之重要进攻出发位置。阎军利用漳马村东卧虎山高地及南北山梁环抱该村之险和漳马深沟筑成要塞阵地，即主阵地及一至九号碉等十余个阵地。其主阵地在石儿梁和卧虎山之间，构筑了永久性的洋灰碉。以其八总队第一、三团、保安第六团、四十师一部和三十师的二十七旅八十一团（蒋介石的部队）各一部防守。

纵队决定以四十三旅全部、四十四旅两个团同时攻击漳马。四十三旅攻占漳马主阵地后，继续攻占七、八号碉，四十四旅攻占观门前土寨子后，以一部切断观门前南高地敌人的归路，并迅速向漳马攻击前进；四十五旅一三五团攻占四、五号碉，其余为纵队预备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我的位置在四十三旅指挥所。右邻七纵攻牛驼寨，八纵攻小窑头，左邻十三纵攻山头阵地。兵团令十月二十六日十六时，同时发起战斗。我四十三旅一二九团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夺取了石儿梁后，二十三日，敌以小部队向该团反扑被击退。二十五日，该团三营夺取了二〇七阵地，以保证部队攻击漳马主阵地侧翼安全。同日晚，一二八团占领主阵地东北约八百公尺敌人的警戒阵地黑疙嘴，以进行攻漳马主阵地的各项战斗准备。攻夺漳马要塞的政治动员工作，做得非常认真，说明了我军有利条件和困难，使干部、战士透彻了解到我夺取漳马要塞对攻克太原城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在攻克漳马要塞中立功，发动干部、战士细致观察地形，研究敌人。我自己亲率各旅旅长深入漳马阵地前沿勘察，并在现地确定各旅的攻击部署，定下作战方案。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十六时半，我一二八团第一、二营，分两个尖头同时向漳马二〇一、二〇二阵地发起攻击，一二九团二营攻二〇二阵地。三营为二梯队。由于一二八团第二营战前准备充分，营长亲率突击队，所有干部隐蔽接近敌阵地，详细研究进攻道路及突破口的位置，具体规定了各连队的任务，选择团指挥所前六百公尺处的小山头为进攻出发地，大大缩短了前进距离。因此，战斗一发起，攻击动作迅速突然，炮火打得准确猛烈，敌还未清醒，我突击队已到敌前沿。虽四连曾突错方向失利，但六连立即投入战斗，一举突破敌前沿，迅速占领了敌二〇二阵地。以二〇二阵地为依托，协同一营攻夺二〇一阵地。由于

该营对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足，接到攻取二〇一阵地的命令后，出乎意料临时组织参战，因而信心不足。又因一营发起攻击迟慢，二营陷于单方面作战，伤亡较大。该营虽英勇顽强攻下敌二〇一侧翼阵地，但突击队只剩下五人，又无后续部队支援，这时一二八团首长令三营加入战斗，立即发起攻击。营长亲率突击队迅速突破敌前沿向纵深发展。我一二七团一个连赶到，战斗至二十七日八时，最后攻击顺利，歼敌六百余人。至此，敌人的漳马要塞阵地，为我纵全部占领。

四十三旅的一二八团完成攻占漳马任务后，立即令一二七团坚守，巩固已占的漳马要塞。该团团长李成春，亲率第三营进入阵地，接替一二八团，旅部立即组织人员率参战民工向漳马阵地运送弹药、器材，构筑工事，准备敌人反扑。二十八日上午，敌四十一师配合八总队两千余人，乘我立足未稳，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向漳马阵地反扑。我所筑的临时工事全被敌摧毁，乃以敌尸体作掩体进行战斗。敌一天向我反扑数次均被击退。我一二七团七连正面堑壕的火力点全被摧毁，敌我反复争夺前沿战斗十分激烈。当日十四时，敌一部依托左前方小高地，从我阵地的西南角突入七、八十人，进至我一二七团三营预备阵地。在紧张的情况下，一二七团八连，主动向敌发起反冲击，将突入之敌击退。同时，我集中全纵队炮火四十余门，加上左右友邻的炮火支援，形成火海，敌后续部队遭到严重杀伤。两天战斗，敌总攻我八次，反扑十一次，均被我击退。敌死伤惨重，遗尸遍野，共计毙敌六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三十一日，一二七团以第四连袭占主阵地左侧高地及右侧的小碉，守敌溃退，为我占领。同时，我四十四旅攻占了观家峪、上庄，保证了漳马主阵地侧翼的安全并得以巩固。

从十一月一日起，敌人天天向我反击，我纵各旅均积极巩固

阵地并向前发展。直至十一日拂晓，阎军集结三十师（蒋军）及工兵营和八总队共五千余人。首先以密集炮火轰击我整个阵地。我前沿与纵深的交通壕、火力点，遭到很大破坏，敌先头以两个步兵营冲击我数次未得逞。到十时，敌又发起猛攻，从五连正面突入我阵地二百多人，一股沿交通壕接近我纵深的阵地。我一二七团与敌激战，发扬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敌白刃格斗。“重伤不坐担架，轻伤不下火线”，战士到处都喊起“人在阵地在”的响亮口号。当阵地失去一半，情况非常危急时，我一二七团、一二九团各两个连投入反冲击，配合坚守阵地的部队将敌歼灭在阵地内，剩余残敌狼狈逃窜。这时，阵地内的浮土过膝，弹片满地，敌人尸首到处皆是，敌于黄昏弃八号碉逃走，当晚为我占领，四十五旅的一三三团接替防守该阵地。

漳马战斗防御中，我一二七团英勇顽强，坚守与反冲锋相结合以较小兵力击溃数倍于我的敌人，大量歼敌于阵地前沿和阵地上，巩固了既得的阵地。由于该团攻得勇猛，守得顽强，旅党委慰问，纵队党委嘉奖，并荣获兵团首长的通令嘉奖。

攻、守漳马要塞的战斗，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到十一月十二日十八天的战斗，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夺取漳马主阵地为主。第二个阶段我一二七团接防坚守已夺得的漳马要塞阵地。另一路我一三一团肃清漳马左侧的敌人并占领观前峪寨子，一三三、一三五团于当夜首先夺取一号、三号阵地，一三五团反复争夺于十一月二日晚九时，攻占四号阵地。一三三团攻占二号阵地，一三五团接着又攻占五号阵地。三日下午，一三三团攻占最后一个六号阵地，连续作战三昼夜并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最后巩固了阵地。第三阶段从十一月十日开始，我一二七团向漳马西岭上敌炮碉阵地发起猛攻，激战五小时占领敌炮碉。十一日敌倾其全力自早至晚向我阵地连续数次反扑，均被我粉碎。此次战斗

我部队坚守二十四小时，毙敌一千余人。十一日夜，我争取敌八总队长赵瑞反正，乘敌混乱之际，我一二七团采取奇袭手段，夺得了八号阵地。根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天的战斗中消灭阎锡山的八总队、干训大队、第二总队、四十师一团二营、三团三营、六十九师五连、七十一师炮连、蒋介石的三十师八十团大部、八十一团全部，被打垮的敌人不计其数。

淖马要塞是夺取太原必争之地，是攻克太原城的重要踏脚石。这个要塞为我纵夺取，对解放太原城起着主要作用，兵团首长对我纵有很大的鼓励，这是我十五纵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七、编为六十二军 参加攻克太原

临汾、晋中战役及太原初、中期作战，使部队得到了很大锻炼，攻、守淖马要塞以后，纵队又整顿了组织，整饬纪律，进行了军事、政治练兵等一系列的部队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我们乘战争空隙集训了干部，提高了干部的战术水平，又有大批翻身农民及解放战士补入部队，武器装备加强了，战斗力空前提高。

正式命名为第六十二军

为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发出“统一人民解放军番号”的命令。我纵光荣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序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隶属于十八兵团建制。我为军长兼军党委书记、袁子钦为政治委员、方升普为副军长、熊奎为参谋长、高德西为军政治部主任、车敏樵为副主任。四十三旅改为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先梁文英、后张希庸。该师辖五五〇团、五一一团、五五二团；四十四旅改为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庆彪，该师辖五五三团、五五四团、五五

五团，四十五旅改为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胡立声，辖五六六团、五五七团、五五八团。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在榆次的聂店镇隆重地举行了命名典礼大会。我全军指战员列入人民解放军正规序列，感到无尚的光荣，誓在党和上级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打下太原，为解放全中国取得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参加攻克太原 全歼蒋匪军

在太原的外围作战中，阎军遭到我沉重的打击，实力大为削弱，又经我军长期围困，其官兵失去守太原的信心，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阎锡山逃离太原，内部更为混乱。但匪首王靖国、孙楚等仍顽固拒绝我劝降，妄图作垂死的挣扎。此时，蒋、阎共六个军，十七个师，总兵力约有七万二千人，分布于城周围三至十五公里的地区，主要兵力在城内，其外围共分五个防守区，城内为固守的中心区。我人民解放军参加攻打太原城的作战部队，有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一野的第七军和四野的炮一师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前线指挥部决定六十一军、六十二军为十八兵团的左集团，由刘忠、韦杰两军长统一指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我前线发起总攻。军奉命向红营房、郝家沟、马庄攻击，歼灭该敌后，迫近城垣，而后由大东门以南登城。军正面之敌为四十九师、七十师、神勇师一个团共四千余人。正面宽四公里，纵深至城垣三至六公里。并有城东南角的双塔寺，大东门之敌的炮兵，有榴弹炮、野炮、加农炮、山炮共五十余门支援。淖马以西至城垣，多为起伏的地形，敌以三层的水泥碉为骨干，构成据点式的堑壕防御体系，并筑有侧防的火力点，以消灭死角和进行周围的防御。四月十九日二十四时三十分，我一八五师五五三团迅速突破敌前沿阵地直插到马庄村、北大

庙，以该地为依托，扩张战果；五五五团亦迅速突破敌前沿，插到新桥，将马庄之敌的归路完全切断；敌援兵曾数次向我插入的部队反扑，均被我击退，迫使马庄与黑驼之敌向我投降。是日二十三时，阎家坟之敌向王家峪逃走，该地区为我占领。这时，阎军自知城外工事难守，大部撤入城内。至二十二日，我即扫清了登城障碍，积极进行登城突破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我军发起攻击的同时，我十九兵团由南，二十兵团由北，分头发起总攻。

我军配属榴弹炮六门、野炮七门，奉命在大东门第三至第四突出部间，与六十一军并肩登城，突进城后，经柳巷、鼓楼街向伪绥靖公署进攻。我军以一八五师五五三团为该师第一梯队，五五四团、五五五团为该师第二梯队，如突破口破坏宽大，攀登容易，登城顺利时，则以五六六团在五五三团右翼并肩登城。一八四师为军第二梯队，一八六师（欠一个团）为军的预备队。四月二十四日五时三十分，我太原前线一千三百门火炮，从四面对太原城开始火力轰击，声震山岳，浓烟弥漫，太原上空天昏地黑。猛烈的炮火轰击，持续一小时半之久。七时许，我军突破当面城墙缺口。在强大的机枪、迫击炮火力掩护下，我五五三团一举登城，第二梯队各团接着先后进城，分头攻歼城内之敌。五五三团三营，发展到桥头街时，被敌三十四军军部以数十挺机枪火力所阻，该团团长吴寿康命令九连绕道前进，爆破手薛培珍身负重伤还一连爆破三座院子，使部队迅速穿房而进。到八点二十分即抢占了城内制高点——钟鼓楼。五五三团二营九连，直插到阎锡山的绥靖公署，该营四连猛冲到绥署办公处，敌还在顽抗，该团工作员许义保，战士陈勇夫把敌军赶进地下室。他二人持枪大胆冲到该地下室的进出口，大声喊道：“不要乱动，缴枪宽大，谁要抵抗就加倍惩办。”许义保命令阎军把枪放下，人往外走。这时，敌军的参谋长赵世钤露了头，向许义保敬了一个礼说：“我们副

主任、司令都在这里。”许义保说：“在这里就好，我就是来抓他们的。”这时，战犯孙楚、王靖国钻出来了，他一看见解放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又害怕起来。许义保命令他赶快出来。这时，四连赶到，战犯们都乖乖地举起手，低着头一个一个地出来了。十点二十分，我率军指挥所到伪绥靖公署，许义保同志向我报告说：“军长，我们抓住了敌首孙楚、王靖国。”攻战太原城，我们活捉孙楚、王靖国等敌首及将级军官以下七百余名。战况发展非常迅速，我南、北攻城部队，亦先后突破城墙，纷纷向纵深发展，历时四小时，山西省会太原城宣告解放。

太原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发起，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打了六个月零十九天。我们军在整个战役中，完成了攻防战斗任务，歼灭了大量敌人。计俘虏战犯孙楚、王靖国以下蒋、阎官兵一万八千余人，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各种炮八十余门，各种枪枝九千余支。这是由于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兵团对战役指挥英明正确，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大力的支援，友军和炮兵部队的密切配合，我军党委和各级党委发挥了集体领导作用，政治工作及后勤工作给予了有力的保障，我全军指战员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而取得的辉煌成果。

八、六十二军参加解放大西北

南渡黄河 挺进西安

太原战役结束，华北全境即告解放。我军奉命进军西北，配合第一野战军消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部队，解放大西北。军党委遵照兵团关于作好“向前进”的准备工作的决定，于一九四九年五

月四日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认真地传达、讨论兵团首长指示，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作了周密的工作安排。各师集训了各级干部，军、师首长下到部队亲自领导检查。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命令，响亮地提出“参加解放西安去，解放大西北去，解放全中国去”的口号，响应兵团“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的号召，普遍订了保证计划，提出：“哪里有敌人打到哪里去，消灭蒋胡军，解放全中国，为人民立功！”五月二十五日，全军在榆次的聂店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这时，中央军委命令调袁子钦到六十军任政委，鲁瑞林任六十二军政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全军依一八五师、一八四师、军直属队、一八六师的顺序沿同蒲路南下，向西安前进。

我军的官兵大多生长在山西的太岳、晋中、晋南地区，广大人民对子弟兵的光荣出征，感到无限的骄傲，并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以最大的支援。每到一村都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公路两旁挖了防空掩体隐蔽敌机。许多战士指着防空掩体说：“人民和我们真是血肉相连呀！”这进一步坚定了全军指战员勇往直前的战斗决心。不少的干部战士在沿途的墙上写着：“坚决打出去，消灭蒋胡军，解放全中国，为人民立功”等标语，在自己的决心书上写下：“千里流水归大海，革命成功再回家”，“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等誓言。我军奉兵团命令兼程行进，但同蒲铁路没有完全恢复通车，因此，部队只能断续乘坐火车，断续的徒步行进。我或乘火车或骑马随部队行进，有时也坐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其他参谋人员和警卫、通讯部队坐大卡车。汽车驾驶员是打仗抓来的国民党汽车兵，做他的思想工作很重要，也必须提高警惕。有一次因公路不好，汽车的跳动把我的头碰破了，又有一次下坡，刹车坏了翻车，我跳出来了，但两个警卫员均跌伤，真是危险极了。保卫部怀疑俘虏来的汽车兵不可靠，

于是建议我以后行军不要乘坐汽车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我随先头部队一八五师到达潼关对面的风陵渡，后面的部队相继集结于黄河北岸赵村一带。六月十五日，先后渡过黄河到潼关，尔后即乘陇海路的火车西进至西安以东的坝桥、临潼一线集结待命。至此，我军胜利地完成了横渡黄河、挺进西安附近的长途行军及准备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任务。

通过西安、咸阳 参加扶郿战役

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总兵力三十万六千人，分布于陕、甘、宁、青四省境内。其中胡宗南十七万四千人，马步芳四万余人，马洪逵六万四千余人，在甘肃境内还有蒋介石嫡系三个军九个师，二万七千余人。兵力虽多，但派系复杂，除胡宗南部外，名义上统归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指挥，实际上根本不能统一。六月中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已陆续全部集结于西安附近地区。六月十六日，两马的主力即开始后撤至邠县及其东南。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胡宗南的陇南兵团，位于武功至扶风一线，其主力与窜据永寿县、邠县地区之两马军形成犄角之势，谋图待我军出击，吸引我主力与其对战于武功、扶风、凤翔地区，而以两马军队袭我军侧背。我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决心乘敌人移动，歼灭胡宗南部于武功、邠县、宝鸡地区，组织扶郿战役。六月二十七日，兵团命令我军附炮兵团于二十八日由西安附近出发，通过咸阳集结兴平地区，担负对防守武功及其附近之敌二四四师的正面攻击的任务，而后经咸阳、凤翔公路两侧向西攻击前进。我们立即进行侦察敌情、地形，研究打骑兵的战法，并根据兵团提出的“打好进军西北的第一仗，争取关中会战的模范单位”的号召，各师、团纷纷订出了单位与个人的立功计划，部队的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晚，全军由兴平附近出发，向该城西北的长宁镇地区隐蔽集结，决定于十二日拂晓发起攻击。十一日黄昏后，各师由现地出发，向攻击目标秘密开进。一八五师附山炮四门，分两路前进，一路经马家寨、王家堡插入新寨，另一路经白羊寨、南营向华家堡南插，共同围歼华家堡敌二四四师师部及七三〇团。一八四师附野炮一个营、山炮两门亦分两路经张寨渡过漆水河插入新堡子、新寨，协同一八五师歼灭武功及其附近地区之敌。一八六师为军的预备队，第一步歼灭韩店的敌骑兵团。军指挥所相继进至武功东南的海家坡。一八四师于十二日一时半，到达马家寨向武功发起进攻，并占领武功东关的漆水河桥，于三时发展到武功西关，俘敌一部，敌主力向西南逃窜。该师追击退敌，于十九时，进至牛井镇一带，歼灭由扶风方向逃来之敌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六门。一八五师五五三团于十二日一时，渡过漆水河，歼敌一个连，五五五团于四时攻占华家堡，歼敌七〇三团七连后，与五五三团会合，继续向前发展，敌动摇大部逃窜，仅歼敌一个排。该师于八时，集结在杏林镇与友邻部队一八〇师会合。一八六师于十一日二十三时，到达韩店，守敌已于十三时全部西逃，该师即追击前进，俘敌几十名。至十二日十三时，进至烽帐车站附近集结，于十三日二时，继续向罗局镇进发。

我全军至扶风西南罗局镇地区后，渭河南岸之敌已被我友邻部队大部歼灭，同时宝鸡已告解放，遂奉命停止前进。我军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全部集结于宝鸡以东地区，军的指挥机关位于十里铺。至此，扶郿战役即告胜利结束，共歼敌四万余人。胡匪二十四师及十八兵团残部，沿川陕公路南逃，退守秦岭，两马军队分头回窜甘肃、青海。此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坚实基础。

追歼两马军队 向甘肃、青海挺进

扶郿战役后，兵团主力位于西安、宝鸡线，担任警备任务。我军在宝鸡附近经十余日的短期休整后，奉命为第一野战军的总预备队，归彭总直接指挥，追歼两马军队向甘肃、青海挺进。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宝鸡附近出发，二十六日集结于黄里镇、赵家原、胡家寨地区，担任对高岩镇、麻天镇之侦察警戒。八月初，我一野主力先后解放平凉、固原、天水等十四座县城，突破敌陇山、六盘山防线，两马军队即分向兰州、宁夏溃退。我军进驻陇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八月五日，奉命由陇县开赴天水，十二日，接到彭总电令归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指挥，参加解放兰州战役。我军沿甘谷、武山、临洮向兰州前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我军奉一兵团王震司令员命令于二十八日进到临夏地区。一八六师奉命留驻临夏归鲁瑞林政委领导指挥，协助开展地方工作。我率军主力向西宁挺进，于九月六日北渡黄河。当我军主力进至青海之民和、乐都地区时，西宁已告解放。九月十三日，我军主力奉命停在该地区待命。十九日，接彭总电令我军归还十八兵团建制，并令我乘吉普车赶到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彭总面示：“六十二军迅速集中在岷县地区休整，负责改编周祥初岷县起义部队，待命进川，参加解放大西南”。我军于九月二十三日奉命南下，经临洮、会川，十月五日进到陇南之岷县。

进军甘肃、青海参加解放大西北，历时七十余天，行程三千余里，路经千山万水，饱受炎热之苦。当部队经过陇县、清水间高达二十余里之关山时，连日下雨，道路泥泞难走，有马不能乘，我军、师领导干部均带头徒步攀登关山。当时敌骑兵十四旅在此地被我歼灭，路旁的死尸、死马成堆臭不可闻。翻过关山后，气

候突然冷起来，此地人烟稀少，部队即在野外露营。同时进入新区，粮食供应经常发生困难，部队每人除带两天干粮外，还要背四天的生粮。因随时都要准备投入战斗，而所携带的械弹亦不能减少，每个战士均要负背五十斤以上的重量。我军通过宁河时，河水暴涨，不少战士被冲入河中，幸赖于水手的抢救，才幸免于难。从临夏向西宁进军时，我部队均乘木筏、牛皮包北渡黄河。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指战员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想尽办法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追歼马步芳部挺进甘肃、青海的任务。在追歼敌人的艰难进军途中，我军认真执行新区政策，连队组织了民运工作检查小组，建立纪律检查的值班制，负责检查纪律并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很多，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军政治部订了一个“三不进”、“四不走”的章程，即不进未腾出的房内，不进有妇女的家，不进群众的厕所，不打扫干净房子不走，不掩盖好挖的厕所不走，不清理好群众的手续不走，人民群众种了庄稼的地不走。由于我军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非常拥护。我军向西宁进军北渡黄河时，当地的回族人民同胞曾以大批的木筏、牛皮包自动支援我军并积极帮助我们划木筏牛皮包船，使我部队安全而及时的渡过黄河向西宁前进。我军参加解放大西北，仗打得不多，但苦头吃得不少。

岷县军政整训 改编起义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我军奉命集结陇南地区休整，改编周祥初、陈淑林起义部队，进行入川的各项准备工作。十月十日到达岷县后，先后投入军事、政治训练。为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战斗意志，进一步树立“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的荣誉感，为从草地进军四川、解放大西南打下思想基础，全军连以上干部，

学习了刘少奇同志《论群众路线》等文件，并联系自己检查进军西北以来的爱民观点和领导作风，排以上干部和战士进行了评斗志、评阶级觉悟、评干部作风的活动，并组织了小型的诉苦，在广大战士中采用忆苦、比苦、算细账和典型示范等方法，进行了诉苦教育，初步明确了阶级观点，划清了敌我界线。刚从西北解放参军的新战士明确了过去当国民党的兵，是为胡、马卖命，是压迫人民群众的，现当上了人民解放军，是打倒国民党军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起，全军部队转入以适应入川作战为重点的军事练兵。我军走三国时期邓艾入川的道路进军四川。因此，这次练兵要有针对性。在战术上以班、排、连山地进攻作战指挥的战斗动作为主；在技术上以各种武器的俯射、仰射和超越射击为重点。各团、营在这次练兵中首先抓紧解决班的战斗动作，而后组织排、连的综合演习；各级机关派遣干部深入连队了解具体情况，进行指导和帮助，发现典型经验介绍全军，针对我军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动作生疏，特别是草地气候变化多端，部队运动呼吸困难，没有路可走而要攀登等情况，各师、团采取了大家出主意的办法，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在实地演习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峭壁的高低不等，以练习人梯、顶竿、吊绳攀登方法，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好的练兵成绩。例如：我五五〇团机枪连三排十九人，带炮四门，攀登二丈多高的悬崖峭壁，仅用二分钟的时间，即全部爬上去了。此次练兵达到了预定的效果，为入川作战打下了良好的战术、技术基础。

在我军解放兰州、西宁歼灭两马军队的同时，溃退于岷县之伪甘肃省保安司令周祥初与胡宗南的一三七师师长陈漱鉢，率他们全体官兵四千三百九十四人，于九月十一日在岷县起义，待命

改编。我军十月五日到达岷县后，周祥初、陈淑钵等人欢迎我军派员整编其部队。我军抽调团级干部五人，营级干部八人，连、排干部九十四人组成工作团。经短期学习后，由一八六师政治部副主任袁逸田率领前往该部进行改编工作。首先作清理审查，尔后建立政治机关和我军各种制度。经过四十余天对人民军队本质的基本教育，其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开始有了阶级觉悟。在这基础上进行了整编。如保安司令部机关部分人员编到我军部机关，其余机关人员与一三七师合并，伪保安第四团与我警卫营合并，一三七师师部及其第一、二团，改编为西北独立第一师，并将原师管区的第三团和独立营合并为该师第三团。原国民党一三七师师长陈淑钵任师长，袁逸田为西北独立第一师政委。该师归我军指挥。改编工作于十一月底结束，并报彭总备案。编后，部队情绪很好，全师指战员积极要求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为人民立新功。

九、 参加解放大西南

扫清陇南残敌 开辟入川道路

十一月上旬，陇南蒋、胡残余军队，见其退路有被我切断的危险，即沿川陕、川甘公路两侧作战略性的转移，企图集结主力于大巴山以南、绵阳以北的丘陵地带作退守成都的准备。其一一九军和一四四师位于武都、碧口、汶县一带；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分布凤县以东地区担任掩护，阻我前进。我军奉命扫清陇南残敌，开辟入川道路，为配合主力解放四川，决以一八五师、一八六师消灭盘踞武都之敌一一九军，以一八四师消灭西固、汶县之敌一四四师，而后翻越摩天岭直取江油、中坝。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军由漳县、盐井镇地区出发，经

西和、望子关等地，于九日进至都东南的甘泉、杨家坝，控制了由武都入川的主要交通要点及嵩子店的铁索桥。一八四师同日由岷县出发，七日进至西固东南梁家坝一带。该地区的守敌一四四师的七三九团二百余人惧歼南逃，该师当日进占西固。南逃之敌沿途破坏桥梁、道路，妄图阻止我军前进，我一八四师不顾一切疲劳，忍饥受冻，不分昼夜地跟踪追击，翻过终年积雪、云雾弥漫、海拔三千五百多公尺的安紫岭，于十日在番民区第二坎附近追上该敌，将敌歼灭。十一月继续向汶县进击，该县伪县长亲率自卫队百余人出城欢迎我一八四师进城，汶县即告解放。一八五师于四日由岷县的白龙镇出发直逼武都，守敌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事先曾与我取得联系准备起义，但犹豫不决，此时得知西固解放，嵩子店铁索桥的退路被我切断，乃于九日率领二四四师、二四七师宣布起义。我军继续南下，即将该起义部队交给第七军接受改编。至此，陇南残敌已被我军肃清，开辟了入川的进军道路。

摩天岭被冰雪封固 玉垒关架桥误了时间

为配合我第二野战军主力，聚歼成都周围守敌，兵团命令我军兼程前进，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赶到绵阳、安县地区，参加成都会战。我先头部队进至汶县后，摩天岭之道路已为冰封固不能通行。我当即决定以一八四师、一八五师改道经碧口、青川向绵阳前进。一八六师沿桥庄坝、重华堰直插中坝，军直机关部队和独立一师随一八五师前进。十二月十三日，一八四师由汶县出发，沿崎岖山道攀拔荆棘，向东南直下。十五日上午，该师的五五〇团突然出现在碧口，敌一四四师四三〇团一个营，正在集结企图阻止我军，被我五五〇团一举歼灭。一八五师于十一日，由武都出发沿白龙江南下，十三日相继进到玉垒关。玉垒关是由陇南

入川的要道，汶河与白龙江汇合之地，周围群山峡谷，悬岩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敌为阻我军追击，于十二日晚将铁索桥炸毁，使我军无法通行。因此，一八五师一面组织部队做木筏子日夜抢渡，一面组织工兵架桥。但因水流湍急，架设点选择不当，连架四次均未成功。该师全部人员在狭小的山谷中，露营五天五夜，所带的粮食全部吃光，只好“人吃马料，马吃野草”。我工兵指战员冒着艰险，不怕严冬风寒，不怕冰水刺骨，赤身下水安桩打桩，与洪水搏斗。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成，最后将架设点改选在上游河面较宽处，水流较缓才打稳桥桩架成。十七日部队顺利通过浮桥，十八日进到碧口，军直和独一师接着通过。我一八六师十二日由望子关地区出发，十三日进至临江、狗头坝一带，得知玉垒关桥未架成，当即绕道汶县，亦于十八日进到碧口。

一八四师十五日在碧口歼敌后，继续向南追击，由方升普副军长直接指挥该师行动。途中连续突破大刀岭、青岩关、黄土梁等要隘，先后歼敌百余。十八日进至青川，守敌逃窜即跟踪尾追，于二十日拂晓，五五〇团追敌至南坝，守敌已将渡口之船只全部烧毁，怆惶南逃。方副军长亲自指挥，一面组织工兵架桥，开辟前进道路，一面另找轻便船只由高庄坝渡河兼程前进。二十日解放江油、中坝，并向青连场进击。由于我军进展迅速突然，逃敌骑兵第三旅八十余人在此破坏船只，为我一八四师全部歼灭。是日，该师全部到达江油，下午有从剑阁溃退下来敌骑兵第二旅和新六军各一部，妄图经江油逃窜成都。该师的五一一团随即渡过涪江发起追击，敌人疲于奔命，不敢应战，为我五一一团歼灭，俘敌四百余人，缴战马二十余匹。五五〇团、五一一团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进占绵竹，该守敌一二二师宣布起义。与此同时，我二野及兵团主力，已先后进至简阳、南江、三台、青神、崇州等地。蒋军数十万人完全被我军包围压缩于成都地区，走投无

路，纷纷起义投降。这时，我一八四师已向广汉前进中。我和鲁瑞林政委率军指挥所进到青川，发生了争执。鲁提出：我军连夜急进抢占成都。我说：上级无命令不能抢占。鲁执意要令部队急进坚决抢占成都。我说：坚决不同意，我是军长，在军事行动上有最后决定权，我是党委书记，你是副书记，二人开不成会，但书记负主要责任。弄得鲁瑞林同志气冲冲的很不高兴。我最后说：瑞林同志，这是原则问题，上级既没有命令，又会违犯城市政策，因而我不能同意。

军直属队、一八五师、一八六师和独立一师于十二月十八日，由碧口出发齐头并进。军直、一八五师、独立一师经青川、江油、德阳于二十七日进至广汉。一八六师出碧口，经桥庄坝、重华堰小道向牛坝前进，沿途均是深山密林，又是雨雪纷飞，实在不易通行，但该师战胜了这种困难，也准时到达广汉地区。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一八四师进驻灌县，一八五师随军直机关驻广汉。一八六师驻郫县，独立一师进驻新繁，待命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我军奉命入川行军、作战，将近一个月的长途奔袭行程二千五百华里，歼敌四千五百八十余人。敌向我投诚起义的一万余人，解放县城八座，胜利完成了扫清陇南残敌，奋勇进军四川，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任务。

溶编起义部队 担任川西剿匪

一九五〇年元月中旬，我军奉命改造溶编蒋介石之第九军、四十四军、宪兵学校等二十个番号的起义部队。共计二万二千余人。这些部队成分极为复杂，封建会道门、袍哥、惯匪、流氓等为数甚大。如：伪二、三纵队实权均为袍哥掌握，保四团指挥官邹珊，是伪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我军用了很大的力量进行这种工作。军党委决定军直及各师先后抽调各级、各类干部七百余

名，经过两周的学习，于二月初正式派往被溶编的各部队工作。一般的旧军官与我派去的工作队接触，起初表示自己如何进步，表面上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协助工作队做工作，但实际上是对他的部队编散，想保留原编制，考虑他的前途，采取观望的态度。还有少数坏分子在暗地里搞阴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个别的仍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国民党军广大士兵对我军政策还不了解，普遍存在着对我工作队的各种怀疑和顾虑。

经过我工作队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我军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广大士兵和部分初下级军官通过诉苦的教育运动，觉悟有所提高，普遍的反映：“我们过去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在才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决心好好学习军事、政治，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战士。”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者，纷纷声明退党、退团、退会道门，要求工作队赶快改编，要求发给他们人民解放军领章、帽徽。一九五〇年二月下旬，开始溶编工作。编入我军的士兵共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七名。三月中旬，工作队顺利完成溶编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川西地区全境解放，广大人民欢欣鼓舞。我军正在改造溶编国民党军的起义部队和积极准备进军西藏时，敌特务乘我各地政权尚未建立，群众还没有普遍的发动起来，提出：“抗粮、保粮，专打北方人，不打四川人，专打解放军，不打起义军，反对禁用白洋，反对使用人民币”等反动口号。他们威胁部分人民群众，勾结投机商人，制造物价暴涨，扰乱金融市场，并施设所谓“反共救国军”、“四川民主联军”、“人民自卫军”等番号。还制定了“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图”，妄图利用游击战争的形式与我军作长期的周旋。敌人在成都解放前夕曾有计划的组织、训练了大批特务。所谓“游击班”潜伏各地，利用封建势力，勾结惯匪、散兵游勇，伺机进行反革命复辟。一九

五〇年二月五日，敌人在石板滩、龙潭寺举行叛乱之后，各地先后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武装叛乱，不断杀害我军的零星人员，到处抢劫，破坏交通，袭击、围攻我驻地。造成城、乡隔绝，气焰极为嚣张。当时在川西地区百人以上的股匪，计有一百零六股，共有四、五万人。

我军党委根据西南军区和兵团首长的指示，本着“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方针，决定以一八四师、一八六师和独立一师担任川西剿匪的任务；一八五师为进军西康的先头师，作进军西康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为剿匪的第二线部队。各师对于土匪活动，立即进行侦察，了解其活动规律，随时给予打击消灭。一八四师之五五〇团于二月二十五日由崇义铺出发，二十六日拂晓，以一个营将止水场包围，因匪逃跑，该营继向吴家场前进，另一个营进攻三元场，俘匪一部。该两营二十六日七时，以突然动作将吴家场包围，当即发起攻击，突入村内后，匪仓惶应战，连续向我数次反扑均未得逞，九时许被我全歼，击毙郫、温、灌三县正副指挥陈利石、黄成柱以下百余人，生俘匪参谋长陈大周以下四百余人，缴获电台一部，长短枪一百二十余支，重机枪一挺。一八六师五五七团于二十六日由郫县出发，沿郫、灌公路经竹筏铺、安德铺搜索前进，二十八日拂晓，采取多路合围的战术，从南、北、西三面将盘踞在新场之匪全部包围，因敌构筑有工事，我乃组织炮火先将工事摧毁，步兵发起冲锋，于十时解决战斗，歼匪夏斗枢指挥部二百余人。独立一师在该地区以北担任堵击，亦俘匪三十余人。

由于我军各师作了周密的侦察，严密组织了作战部署，在战斗中采用多路合围的战法，给叛乱之匪以歼灭性的打击，这对开展地方工作十分有利。盘踞川西南部的大股土匪基本上歼灭了。我军为彻底肃清残匪，根除人民群众的祸害，决定以一八六

师二个团、独一师一个营及温江分区一个营，分别驻剿花园场、太平场、马街及金马场、许家场等地之匪。我驻剿部队以政治争取瓦解为主，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大力发动群众，使广大人民向我靠拢，主动协助我军进行剿匪工作。各部队在驻剿中，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及匪属座谈会等方式，揭发匪特叛乱阴谋和罪恶活动，对自首之匪根据情节的轻重在大会上释放和处理。这种做法收效很大。在此基础上，以乡、保为单位成立自安委员会和防匪的自卫小组。经过了这一连串的工作，不少匪属主动叫回自己的丈夫、儿子，向我登记、悔过，并交出武器。仅一八六师，在两个半月中，即争取匪首钟体本以下一千余人，收缴各种枪枝三百余支。从而有效地打击了封建势力，镇压了土匪叛乱。在两个多月的剿匪战斗中，我各部队在军党委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剿匪的各项政策，依靠人民群众有力的支援，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改进了剿匪战术，获得了辉煌战果。全军总计歼灭土匪部队一万九千余人，基本上稳定了社会秩序，给各项工作开展打下了一个基础。

十、进军西康 解放西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兵团在宝鸡开党委会，就决定了三个军进川的分布。如六十军在川西，六十一军在川北，六十二军进西康。我是兵团党委委员，因在青海未参加会，但根本没有告知我。后有一个同志非正式的，也是无意的告知了我。解放成都的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兵团党委书记周士第同志为此又召开会，提出三个军地区分配问题。他说六十二军进西康，叫我表态。我问：是命令，还是开党委会？他说，是开党委会讨论。我说：是党委会我就表个态。我军是随着彭总解放兰州到青海，进军四川

是沿邓艾走的路上翻过来的。现在又叫六十二军进草地，我这个军长该为指战员说句公道话，希望兵团党委会讨论。周说：怎么办？六十军、六十一军工作已展开了，中央决定刘忠同志兼西康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常委。这个会没有结果就散了。周士第同志当即报告贺老总。第二天上午，贺龙老总把我叫去了说：刘忠！你为什么违抗命令？我说：昨天兵团开党委会，分配三个军进驻地区，我是党委委员，总可以发言吧！贺老总说，六十二军进军西康，兵团党委去年十一月在宝鸡就决定了的。我说，既然党委决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昨天还开兵团党委会讨论三个军的地区分配呢？贺老总说，那是他们不对。我说，那就不该责备我呀！贺总这才冷静下来说：三个军长你是最老的一个，中央命你兼西康军区司令员并参加区常委会都公布了，那两个军的工作都展开了，你还是要去。我说，老总，我不是不去，对兵团这种做法我是不满意的，今天我向贺老总表明，我坚决执行进军西康的命令。解放西康，歼灭西康国民党残匪，完成建设西康的任务。贺总说，这就对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广汉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我传达了兵团首长命令。六十二军的战斗任务是：“进军西康，解放西康”。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亲临出席指示，西康省区党委书记兼西康军区政委廖志高同志讲话，对西康情况作了介绍，并对六十二军作了很大的鼓励。通过这次党委扩大会议，领导上明确了进军西康的光荣，是上级的信任，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但也估计到困难，克服某些同志不愿进西康的思想情绪。我表决心坚决完成解放西康、建设西康的光荣任务。

兵团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召开了我军营以上干部会议，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和兵团周士第司令，给予亲切的指示，预祝六十二军胜利完成解放西康，建设西康的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赠给我军“历史壮举，无尚光荣”、“以无比坚忍、顽强，创造历史奇迹”、“光芒万丈的红军史上你们又增加了新的光荣”等锦旗十三面，给到会的干部以极大的鼓舞。随后，各师、团分别进行党内外干部、战士的政治动员工作，对当前形势及六十二军的光荣历史传统，以及解放西康，建设西康的重大意义作了普遍的深入的教育，初步解决了只想住城市，不愿进山区，以及不愿地方化等不正确的思想。正如我五五五团给兵团首长的决心书中所说：“我们一定奋勇前进，解放西康人民，并从事建设西康，巩固胜利，保卫国防，坚决完成任务”。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廖志高政委率领一八五师的五五五团、军直属队一部由广汉、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名山于二月一日进到雅安——西康省会。继而军直整个机关、一八五师、一八六师、军骑兵团，分别由成都地区出发，均沿川康公路开进，于二月十三日，先后到达雅安，接着就解放了芦山、天全、荥经等县，解除了西康省会雅安国民党保安团武装，因为他名为起义，实际上勾结土匪向我军骚扰。三月十九日，我一八六师五六团向康定进军，二十二日，遂占泸定，并控制了泸定桥，俘敌一部。该团当日除留一个营守备泸定桥外，继续前进。二十四日，解放康定。我一八四师与云南兄弟部队配合参加西昌战役。该师于三月十二日由温江出发，沿乐西公路疾进，二十日进至峨嵋山边之金口河与敌三三五师警戒部队接触，将敌击退，二十三日攻占富林镇，二十四日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强渡大渡河。敌不敢应战，望风而逃，该师即跟踪追击。三月二十七日解放西昌。在西昌战役中，我一八四师共歼敌西南长官公署、六十九军、二十七军、三三五师、冕宁、雅安的联防部队等七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八二迫击炮十一门，火箭筒两具，重机枪二十八挺，长短枪二千四百一十一支。至此，西康全境宣告解放。我军

工作中心转向清剿土匪，镇压叛乱，协同地方工作人员开展建设西康的工作。

十一、改编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部队

国民党二十四军的军长刘文辉，在我各路大军奋勇前进，并向成都逼近时，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宣布起义。在我军粉碎蒋介石残匪流窜西康的斗争中，他起了些作用。国民党的二十四军，具有三十年的反动历史，是四川的军阀部队之一。军官全是从刘文辉的亲友、师生、叔侄关系中培植起来的，是当地的地主封建势力，其领导人物就是封建势力的头子。因而带来了改造溶编该起义军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九五〇年二月，我军大部入康，特将该起义部队由雅安地区调至川西的大邑一带进行改造溶编。为了执行政协的“共同纲领”，完成彻底改造教育一切原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任务，遵照“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彻底混编”的方针，我军抽调了三百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工作团到达该部队后，即公开宣布取消国民党的政工、特工组织以及其他党派、帮会的活动，建立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而后从政治、思想、制度、作风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的改造。

现将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我在二十四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关于整编二十四军的动员讲话的内容抄录如下：

同志们！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见面话。有许多同志我们在雅安见过面，有的还没有见过面，还有的我们见过几次面了。但今天见面和二月一日在雅安见面不同了。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形势不同了，西南形势也不同了，二十四军也不同了，即进步了。海南岛、舟山群岛已经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在海上作战也是一支不可

战胜的力量。全国物价也普遍稳定了，人民生活逐渐走上安定。

在西南也最后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胡宗南匪部基本上被消灭，特务、土匪的捣乱受到了严重打击，截至四月底被我歼灭十三万人以上，加上五月份的两万多，共歼匪十五万余人。这些土匪是政治土匪，是蒋、胡匪帮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动武装，他们是企图继续维持其反动的封建统治，挽救其死亡的命运。并不是象一些人说的土匪是“征粮、禁用银元，……”等造成的。我们提出“首恶必办”，他们就提出“首恶不办”，又提出“抗粮，使用银币”等口号，与土匪的口号是一致的，土匪的番号是统一的。如在雅安俘虏的李麟是“全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各地土匪多是“反共救国军”的番号，并有其土匪游击根据地。在我剿匪缴获文件中，土匪有游击战术材料，王匪陵基早就作了“游击”准备，创办了五期“游干班”分布于各地，赵老女匪直接受台湾指挥，事实完全说明这些人是政治土匪，是反动封建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制造的土匪，进行反人民的破坏与捣乱。经过四个月的清剿驻剿和发动群众，大股土匪基本消灭了。小股的、分散的、隐蔽的土匪还不少，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企图再起。我们还要继续清剿。剿匪是反封建斗争，是一件长期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必须认真的坚决彻底把土匪歼灭干净。

二十四军在刘文辉先生领导起义后，调转枪头打反动军队，这就对了。你们到川西的三个月，在刘代军长、杨参谋长、刘兼师长、伍师长及我军事代表团领导下，对全体官兵努力进行了民主教育，部队内打骂现象也少多了，参加了剿匪战斗，也有成绩，还惩办了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刘树茶（四〇八团二连连长），反对了部队过去的不良行为，参加了劳动，有的还帮助群众生产，这都有成绩有进步。这就是开始转变过来了，由过去反人民的军队开始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听同志们说，部队学习情绪

高，文化娱乐工作活跃，群众纪律也有进步，战士们要求戴“八一”帽花，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要求正式参加人民解放军等，这就是说，今天见面比过去见面不同了，是进步了。

但是，进步是否够了呢？我说还不够，只是刚开始，亦可说不够得很，尤其是干部同志不够，听说你们背上了几个包袱，背得很重，阻碍着你们的进步，是些什么包袱呢？

（一）起义反蒋的包袱，功臣自居盲目自满。我们认为起义是一件好事，对人民有利的事。但若以这点而满足成为思想包袱，就会影响进步，这就不对了。

（二）军龄长资格老的包袱，留恋过去的历史、名誉地位。我们要从本质上认识这个问题，部队的历史是“老”的，但这“老”是为反动统治阶级，为四大家族服务的老历史，是不值得留恋的，而今天起义才变成了人民的军队。这样看才能解决你们背上的这个包袱，才能打消名誉地位的思想。

（三）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的包袱。有同志顾虑领导上相信不相信，能不能保持实权？年老能否转业？地主成份的干部不愿出公粮、买公债是否要斗争等问题。此外，还有家属、爱人、孩子等问题。刘文辉先生是遵照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政策的先决条件下起义的，这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与要求。而买公债、缴公粮又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我们更应模范的执行。地主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就要放弃地主立场为劳动人民服务，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的利益。革命有前途，个人一定有前途。

第二个问题是整编问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西南军区首长贺司令员、邓政治委员，命令二十四军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双重的光荣。起义光荣，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光荣。在这里还要说明下面二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整编。这不单是二十四军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一）减轻人民负担。由于多年来的战争，人民太穷苦了，今天全国基本上解放了，整编军队是减少国家开支，达到收支平衡，金融走上稳定，减轻人民负担，加强生产建设的根本办法之一，所以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整编军队。

（二）整理国防部队。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取得全国胜利了，但必须认清帝国主义是仇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残余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解放台湾。但是战争危险比过去减少了，我们八万万和平民主力量是强大的，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是不可能了，帝国主义的袭击或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也更减少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放松警惕，我们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坚强国防军队。

（三）就二十四军本身来看，也急需整编。二十四军的历史很长，但都是旧军队的历史，是反动统治者领导的反人民历史；起义是反对反动统治者的开始，也是走向革命阵营的开始。在今天说，二十四军的番号，一切军事制度与作风仍然是旧的。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二十四军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并须在努力学习、继续进步的条件下，建成为国防军。这是真正的光荣，这就加重了二十四军每个同志的任务。有些人说：“过去二十四军整了多少次，这次又要整”。留恋过去，这是错误的，他不了解今天本质上变了，过去为少数人的私有军队，今天要变成人民的军队。有些战士说得对：“不当私人兵，不当糊涂兵！”这是觉悟，这是进步。因此，为了二十四军本身前进，为了大家更快进步，亦必须整编。

二是怎样整编的问题。上级决定二十四军与六十二军及军事

代表团一起合并整编。西南军区首长决定下列人员组成整编委员会，该会为整编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二十四军刘代军长、杨参谋长、刘兼师长、五师长、军事代表团黄团长、安副团长，六十二军刘军长、车主任、蒲师长、胡政委、王部长、陈师长、袁政委等十三人组成。以六十二军刘忠军长为整编委员会主任，二十四军刘元煊代军长为副主任。

两个军按各级单位合并，一三六师与独一师合并，一三七师与一八六师合并，二十四军军直及其所直辖之团营等部，分别与一三六师或一三七师及六十二军军直合并。

整编中干部问题。有人顾虑“是否有工作干”，有的想退休是否允许？有的想改行转业，这些都是从个人方面着想。我回答这个问题是“用”。但因为是两个部队合并，有正的副的，还有目前用不了的就要学习，先学后用。人民的事业和建设事业用人处多得很。“用”，一定是量才使用，各得其所，适当安置，但有一个基本要求，一定为人民服务到底，在个人进步的基础上使用，而不分彼此，一视同仁。

整编的动员问题，向大家说不说？一定要好好说，一定要说通，我相信一定说得通，说了以后要讨论。有怀疑、有不明白、有不同意见的，都可提出来，怕的是有意见不提。希望到会干部要以身作则，只要你们通，下面一定通。

第三个问题是编后的问题。这就要大家进一步了解人民军队的本质、作风与传统。努力学习，提高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服务的忠实战士。人民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她具有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作为这样的人民军队的一个指战员，我们的基本要求是：

（一）坚定意志，明确立场，学会新的斗争知识，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兄弟，谁是我们的朋友。

(二) 爱人民，爱国家，爱学习，爱劳动。

(三) 统一编制、统一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军事管理制度)服从组织，听从指挥，自觉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互助，学习进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才能完成他应负的历史任务。

最后说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下，二十多年的长期艰苦斗争，经过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和近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援助下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推翻了反动统治，到今天基本上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但我们一点不骄傲，我们不表功劳，并时刻切记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忠诚的执行党给我们的任务：巩固胜利，巩固我们国防。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永远是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我就讲这些，希同志们认真讨论，有不妥之处请提出来更正。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起义部队国民党二十四军，正式合并给我六十二军。由于西南军区首长的明确指示，在军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起义部队的政策，并接受了改造溶编蒋匪四十四军等部队的经验，及时发动了群众，提高了起义部队的士兵及下级军官的觉悟，利用起义军官作了不少工作，因而使整个整编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六十二军这支年轻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在和日本帝国主义与蒋、阎军队的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游击队到正规军，而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了太岳区的游击战争，给日寇以严重打击；解放战争参加攻克临汾，晋中战役后，成为华北野战军第十五纵队，太原战役中间，正式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攻克太原后，参加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解放西康，克服了种种困难，草地入川，行程万里，歼灭蒋军七万余人，获得了辉煌战果。我军的历史是战斗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

十二、调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调我任川西军区司令员。整编完二十四军后，我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旬到职。川西军区机关驻成都北教场，李井泉同志为川西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祖谅为副司令、袁子钦为副政委。我调川西军区主要是参加抗美援朝问题。当我到职后，即进行紧张的练兵，待命率六十二军去朝鲜与美帝国主义作战。十月中旬西南军区在重庆召开各军区司令员、政会会议时，我一到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给我一份电报，内容是：“令调刘忠为陆大校务部长，立即到职”。我看后，当时思想不通，就去找了贺老总要求去朝鲜作战。贺老总说：“你去问问邓政委看能否变动，不过中央军委的命令是不好讲价钱的。”我又到邓政委那里要求。邓政委说：中央军委筹办陆大是个大事情，刘伯承主席已到南京了，你赶快到职去。我说，我当不了这个校务部长，再次要求去朝鲜作战。邓政委又说：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不能变动，你自己去讲吧。聂总长是你的老政委，干部部罗部长是你的老主任，看他们能否答复你的要求。

遵照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面示，我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上旬，离开四川成都，直到北京。到京后，先见军训部长萧克同志。萧部长说：你不要去找聂总长、罗部长了，要很快到南京去参加筹备陆大工作，刘伯承主席正在积极筹备，军委决定明年

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陆军大学并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苏联顾问已到，赶快去南京到职吧。我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报到。以后，学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我刘伯承元帅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筹建工作。

后记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调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我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京向刘伯承元帅报到。刘帅一见面，很热情地同我握手说：“刘忠同志，到了好，就差你这一脚了。”本来我想讲价钱，但刘帅这样一说，就讲不出口了。思想虽不通，组织上要服从，工作还要做。这时，苏联几十名顾问也到了南京，刘帅面示我去见首席顾问，他向我提出：第一个要做的工作是学校的组织体制问题。首先确定学校的名称。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陆、海、空军合成军队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叫陆军大学不确切，而建议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院长、政委领导下，设三大部，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在现有条件下，先设两个系，一是高级速成系，学制一年；二是基本系，学制两年半。与首席顾问会谈后，我即向刘帅作了汇报。刘帅决定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报告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一九五一年一月，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军委命令刘帅任院长兼政委、陈士榘任训练部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刘忠任院务部长兼政委。一九五四年，我升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长。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军委确定高等军事学院负责全军战役、战略训练任务，选调陆、海、空军正师以上的干部进行培训。陆军副师、团、营干部在南京军事学校受训；原南京军事学院海、

空、装甲、炮兵等系分别创办各军、兵种专门学院。军委确定高等军事学院设在北京，地址选在红山口。红山口位于北京西郊，盛产著名的京西稻。

高等军事学院是由南京军事学院分出来的。原南京军事学院七人常委中除钟期光副政委留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外，其余六人均调到高等军事学院任职。刘帅任院长、陈伯钧任副院长、唐延杰任教育长、解方任副教育长、林浩任政治部主任、刘忠任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长、政委。后因刘帅身体不好，中央军委、毛主席任命叶剑英元帅兼任院长。

一九五五年五月，为创建高等军事学院摸索经验，中央军委令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战役系，并调我去学习。战役系共有学员五十二名，都是兵团级和军级干部。学习时间为二年半。一九五七年十月战役系结业后，该系全套机构和所有人员及车辆、教材、教具和生活用具等全部搬到北京，作为高等军事学院的基础之一。我分管高等军事学院的行政建设和物质保障工作。一九六一年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长。

从一九五〇年十月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起，至一九七九年二月，总政通知我离职休养止的二十九年时间中，我一直从事军事院校工作。在我一生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有三十多年是在军事院校中渡过的。其中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我从事院校工作的时间较长，特别是对行政与教学保障工作比较熟悉，考虑到院校工作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准备专门写一篇有关我军院校行政与教学保障工作方面的文章。因此，在这篇回忆录中对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准备多谈了。从闽西到京西的回忆就写到这里。

跋

离休以后，我开始撰写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写的主要是我参加革命的经历。由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时间相隔太久，记忆较为模糊，需要反复推敲，因此，本书整整写了一年时间。书中涉及的有些事件，可能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或不要之处，恳切地希望过去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老战友给予指正。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曾经得到杨成武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并为本书写了序言；同时还得到中共龙岩地委林开钦、郑霖、黄小晶、邱炳皓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会、龙岩地区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和谢济堂、廖国伟、邓汉征、邱惠珍等同志帮助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经历和水平，本书粗疏误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忠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跋

离休以后，我开始撰写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写的主要是我参加革命的经历。由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时间相隔太久，记忆较为模糊，需要反复推敲，因此，本书整整写了一年时间。书中涉及的有些事件，可能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或不要之处，恳切地希望过去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老战友给予指正。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曾经得到杨成武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并为本书写了序言；同时还得到中共龙岩地委林开钦、郑霖、黄小晶、邱炳皓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会、龙岩地区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和谢济堂、廖国伟、邓汉征、邱惠珍等同志帮助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经历和水平，本书粗疏误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忠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